

教学参考

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

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

(内部材料 不得翻印)

上 辑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编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编 者 话

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主持下于1980年10月6日至11月6日在我校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三百余人。到会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多年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会上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党史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并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功绩和失误作了初步的探讨，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一些问题也作了讨论。

根据代表的要求和党史教学的需要，我们将会上十九篇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成上、下两辑，刊载在我校《教学参考》上，供大家研究党史时参考。由于时间紧迫和我们的水平所限，特别是有一部分材料是根据录音整理的，难免有不妥之处，希同志们批评指正。

这份汇编的印刷，承滁县地委《滁州报》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同志们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

1010.1/1

目 录

- 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廖盖隆(1)
-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马齐彬(46)
- ※
- 建国后十七年党史概况·····张 弓(70)
- 关于从中国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
·····李葵元(85)
- 关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问题·····陈诗惠(95)
-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李葵元(107)
- 农业合作化历史几个问题的研究·····许永杰(119)
- 关于党的“八大”的几个问题·····张 弓(128)
- “大跃进”的失误及其经验教训·····孙 梁(137)
- 关于庐山会议的几个问题·····陈诗惠(162)
- 八字方针的贯彻和党的“十中”全会·····滑 隆(173)
-

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

廖盖隆同志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1980年10月25日

同志们：

我要讲的题目叫做《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我讲的还是老话，基本上是7月22日在中央党校讲的内容。但是，做了些补充。我准备做一些解释。特别是，对于今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行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问题，作一些说明。

我讲错的地方，请同志们不客气地指出、批评。首先讲一个问题，就是建国三十一年以来的党史的轮廓。

一、建国三十一年以来党史的轮廓

我们认为，建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党史的分期，不是任意要这样分那样分都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其中有些时期合起来，但是，合起来，我看还是两个时期。比方说，1949年到1956年，这中间实际上是分成两个时期的，1949年到1952年，这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1953年到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这是建国以来的头七年，在这七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可以这样来分。但实际上这是两个时期。56年以后，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算是一个什么时期呢？大概可以说是曲折前进的十年。在曲折中间前进的十年，也可以说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严重的失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十年，大概可以分为三段，一段是正确的，路线正确的，一段是犯了错误，还有一段是改正错误。那么，这是第三段了。第四段，“文化大革命”，要打引号，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十年动乱。第五个时期，就是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

现在我就分别来讲一讲，这五个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一些问题。我来讲话以前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讲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因为这个决议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还不能讲。我只是就我个人理解的一些问题来讲一讲，所以说这不能称作什么传达。

现在讲第一个时期。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1949年到1952年，三年。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因为这个时候，无产阶级民主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了，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相当于原来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在我们中国的表现形式，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相当于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但是，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这里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概念，是不是很完善呢？看起来不是很完善的。因为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人民，不只是无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还有农民等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本身，不能包括这个其他部分的人民也参加这个统治，参与这个政治统治。特别是，这个专政是什么样的专政，也没有说明白。毛泽东同志提出来一个名词，叫做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这个范围是很广泛的，他接着下个定义：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是采取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这么个方法来进行统治的，所以叫做人民民主专政。那么这个概念，是更科学、更完善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代替马克思原来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指出这么一点，就是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上胜利了。作为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49年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这是不是奇谈怪论？我觉得不是。因为列宁讲过，反复地讲过，革命的基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建立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那么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了吗？在我们这样说的时侯，我们会想到毛泽东同志曾经批判过的一种观点，就是批判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这里毛泽东同志批判的，是指在历史上认为革命不要分阶段的那种错误观点。就是说，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就去执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一般地去打击资产阶级的政策，他批判的是那个观点。但是，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到了1945年以后，了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发生了个变化，这就是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革命任务，增加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没收官僚资本，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民主革命，另外一方面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另外，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在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专政，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我这里可以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论述。一个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他是这样说的：“1949年开始，我们就没收全部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二十多亿，官僚资本总有二百多亿。”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插话：“连帝国主义的是二百多亿。”这是连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资本了。毛泽东同志继续说：“这一部分帝国主义资本同官僚资本拿到工人阶级的政权手里头，这是什么革命呢？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因为是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资本的性质就变了。变成是社会主义的了。所以，我们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为什么市场能够稳定，国家能够控制呢？你看十个指头占了八个半，这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呀，十个指头占了八个半，也就是百分之八十五，占了

这么多，这是讲工业。至于农业那个时候还是私人的，到后头合作化了，成了集体的。土地改革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我们不停止在这上面，七年之内合作化就基本上完成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自己就肯定1949年没收官僚资本，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国家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了，这是社会主义的了。这是一个材料。另外在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关于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面直接讲到了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他的那个谈话，记录里头是这样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话，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它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毛泽东同志讲过去那个混淆是不对的，但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这怎么理解呢？恐怕应该这样来理解，在提出反官僚资本以后，就解放战争那个时期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是完成了民主革命；另外一方面，作为政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完成了。这不就是毕其功于一役了吗？所以在这个时候讲是可以的，恐怕是应该这样来理解。毛泽东同志讲：“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这是大概的数目，刚才讲是八点五比一点五，这里是讲八比二。“我们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所以我们看1949年革命胜利和胜利后不久，不仅是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把中国的主要的资本主义都消灭了，经济革命也开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把官僚资本、把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把它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又说：“帝国主义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以后，这部分已经被我们没收了，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把它征用了，实际上已经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政治革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1949年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作为社会革命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还只是社会经济革命的开始，象刚才所讲的把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也开始了。后来，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所以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49年开始的，1956年基本完成。为什么说1949年的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把这个道理说了一下。那么，我们说在这一段啊，使用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这就可以把这个时期的剿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的斗争，党的整顿和建设，没收官僚资本，并且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把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内了，因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包括了这些任务。如果我们只讲恢复国民经济呢，就很难包括这些斗争或者工作。在这些斗争和工作里面，土地改革是属于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其他各项都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包括抗美援朝，这也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

如果我们把中国1949年革命的胜利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比较一下，那就更清楚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苏联的工农社会主义政权，可是它的政权是很不巩固的。它是城市起义以后建立起来的全国政权，刚一建立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后来经过三年内战，才战胜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乱和十四个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才巩固下来。打个比方吧，我们的解放战争是进行在前面，但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是在后面进行的，建立政权以后又打了三年解放战争。我们是先打了三年，取得了胜利。所以我们革命一胜利，我们建立的政权是巩固的。而苏联呢？因为还没打过仗，刚刚起义取得胜利，它是建立政权以后再打三年解放战争，然后巩固自己的政权，这是一点。我们中国的1949年的革命胜利不是比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还要大一点，还要巩固一点吗？

另外一方面，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他就宣布把全部私人工商业都没收，结果在共产党方面一点准备也没有，实际上管不了那么多的私营工商业，号召工人起来接管，结果把国民经济搞乱了，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后来不能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而我们只是没收大官僚资本，官僚资本的大企业，有多少呢？有二千七百多家。而我们在解放区长期进行了建设，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经济的干部，虽然不很多，但管理二千多个企业还是管得过来的，所以有条不紊地接管了这些大官僚资本企业。另外，又收回了一部分外国垄断资本企业，数量有限，这个接收工作很顺利，改造的工作也很顺利。而对于大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它们一共有几百万家之多，虽然总资本占的分量很少，但是企业数量很大，其中大部分是个体的工商业，一点也没动，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样做国民经济秩序不发生紊乱，人民生活也没有遭到损失。所以，我们的政治秩序是好的，避免了经济上的混乱和破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的革命由于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接受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由于毛泽东同志长期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我们1949年的革命是非常成功的，是非常伟大的。

这一段有一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什么？在北京有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到现在还提出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认为这个时期（1949年到1953年）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改革在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完成，大约在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土地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既然土地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他们认为也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就是说，革命性质还是民主革命的。这个对不对呢？这个看法有部分道理，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那里的主要社会矛盾，的确还是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那里在1949年到52年要解决的还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呢，就不是这样，从全国范围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了，在政治革命方面已经胜利了，经济革命也开始了，没收官僚资本，把它改造成国营经济，这个很严重的步骤已经采取了。所以在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社会矛盾，已经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很明显的。这是非常明显的。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只是部分的新解放区的农村的情况。新解放区的城市，也不是这

个样子，全国范围也不是这样。新解放区的城市也要没收官僚资本，在那里也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怎么能说还是民主和封建的矛盾呢？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主要的矛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即到1956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应该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里头，这七年里头还可以分两段来看。头一段就是恢复时期，1949年到1952年。这三年主要的社会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大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的矛盾。因为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可以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这两个范畴。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工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尖锐的对抗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年解放战争，一方面是我们解决中国人民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是民主革命。另外方面，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有两重性，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革命带有两重性。那么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非常对抗性的矛盾，已经因为工人的胜利而基本解决。但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残余势力的矛盾，这还是对抗性的矛盾。在1949年到1952年这个时期，这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它可以说是残余势力，但这个残余的力量也不小。国民党的残余的武装力量当时在大陆上有一百多万，反革命分子呢，包括他们留下的特务，以及历史反革命，一共有几百万，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被我们镇压的就有七、八十万，在镇反运动中间，关起来的、管制的还不算，总数目大约有几百万。所以，在当时剿匪反霸的斗争，当时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追击战，当时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两项运动，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主要的表现形式，主要的斗争形式。到1952年，这个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力量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反革命分子，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的力量、主要的部分也被消灭了。1953年到1956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认为可以说是主要表现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和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人民政府要限制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右翼分子的反对限制反对改造之间的斗争，也就是限制、改造与反限制、改造之间的斗争，这就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斗争的形式。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说法，“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法，可以看出来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这个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就是可以在经济上用和平的赎买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用给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以出路，就是给予选举权，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给予改造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消灭资产阶级，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头

说的一句话了。根据后来历史情况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我们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是头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年到1956年四年。这个阶段的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就是按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因此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原来在1949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到这个时候又在我国建立了完全的或比较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了。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当然,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它的初期发展阶段,还是发展中的、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说是发展中的、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呢?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的生产力还很落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它应该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大生产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国家,生产力还很落后,我们的大部分的经济部门还是使用手工劳动,没有使用机器。所以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国家很落后,在中国出现的社会主义,相当大一部分还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这样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资本主义,它也有手工业的时期呀,如工厂手工业时期,有机器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那末我们社会主义不也可以有手工业时期吗?我们现在的手工业,以及用手工操作的农业,的确它又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个体私有的。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是落后的,生产力很落后。不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而是大部分还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工农之间的本质差别还存在,当然别的差别,例如城乡的基本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很大的差别都还存在,因此,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作为残余形态还存在。1956年以后,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残余,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残余。由于剥削阶级的残余存在,所以阶级斗争的残余也就存在。我们使用这个概念,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的残余,是为了区别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情况,因为1956年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它只剩下一个残余形态,主要的矛盾已经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在我看就是转到人民内部矛盾了。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那个时候发表的讲话本来讲的意思也是这样。说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就是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吗!主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所以,什么叫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呢?就是生产力还很落后,就是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阶级斗争的残余。不管怎样,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的意义的重大,可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相比较,相比拟。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是很成功的,基本上是很成功的。实践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有些同志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我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不承认我们党这样做

是正确的。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太早了。不承认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不承认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认为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我国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成绩没有缺点，作为第二位的问题缺点和错误还是存在的。

主要的缺点，一个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期，主要是从1955年开始，出现了比较急躁，工作中比较粗糙的现象。所谓急躁，就是说，不照顾到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群众觉悟的情况，千篇一律一下子就实行高级合作化。比较粗糙，就是采取了简单划一的办法，留下了不少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一年一个高潮，无论在农村在城市在改造中间都遗留了一些问题。拿城市来说，象陈云同志讲的，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把一些不应该取消的小东西取消了。拿现在来说，可以说我们把城市里流动的商业服务业小工业网点，商业服务业的网点缩小了，过分地缩小了。举北京来做例子，1956年全市有五万多个商业服务业网点，改造以后，一直到现在只有一万多个商业服务网点，就是差不多去掉了四分之三吧，大大减少了服务业的网点。这样子，老百姓的生活就很不方便。把一些小的修理这个那个的或者是制造些小工业品的小东西的这么些工业取消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1954年出现了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急躁冒进的倾向，被纠正了。1956年又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基本建设的开支超过了我们国家的能够提供的资金，大概超过了三十亿左右，三十亿人民币。这个时候领导国务院工作的以及领导财经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发现了、提出了并且实行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毛泽东同志批判反冒进是错误的。既然是冒进就应该纠正，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把它纠正。

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邓子恢同志提出过要注意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把邓子恢同志称右倾机会主义者，称为小脚女人，是不对的。他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小脚女人。

第二个缺点，当时已经存在一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就包含了这种因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因素。很明显的，现在平反的冤假错案里头有些案件就是属于那个时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我党历史上的历次的运动包括建国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都带有左的倾向，都带有左的偏向。这些运动都是从反右倾开始，往往是主观地确定打击的比例，还有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不恰当的说法，因此扩大了打击面。这种运动中的左的现象，因为在领导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党所采取的有些方针偏左而产生的。我们知道在苏区的时候就存在着肃反扩大化，在延安整风审干的时候，也有部分的扩大化，后来在土改整党中间，三查三整运动也有这种问题。建国初期，无论是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镇反，后来的肃反，特别是肃反，反胡风这些都带有这些毛病，都带有这些左的倾向。反胡风是搞错了。整个胡风案已经搞错了。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不久以后还要登报。人家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他有一些错误，但是他不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集团，应该给人家平反。历来搞的各项运动都带有左的偏向，是这么个情况。建国初期以来，同样带有左的偏向。

第三个缺点，就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党的领导人就开始有一种过分估计生产发展的高速度，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政治作用的因素。这个反映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序言和按语里面，都有这个倾向。这反映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党的领导人开始骄傲了、不谨慎了，开始陷入了急于求成的空想。所谓大跃进的错误，这个时候已经在萌芽，在发育了。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跃进”这么个思想呢？大概是在1955年，大家可以去看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到处都表示这个，都表现了这个思想，急于求成的思想。

第四个缺点，就是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党的领导人从1956年开始，就感觉到这样做是不对头的，所以有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其它的著作。还有陈云同志的八大发言。不过在这方面还来不及加以改正，以后实际上也没有改变。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计划体制差不多完全是照搬苏联的，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没改变过来。有一些问题我们虽然没有照搬苏联的，但是它的意义也差不多，比方一长制的问题，我们不叫做厂长负责制，我们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我们实行的实际上是党委书记说了算的制度，他和一长制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实际上没有多大差别。

总而言之，我们在大略的考察，概括的考察里头，这个阶段党的路线和工作是取得了很大胜利和成就的，但是仔细地去分析，仔细去考察，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成绩中间还有不少缺点。

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必要的，斗争的方针方法也是正确的。因为高岗、饶漱石他们确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反对刘少奇同志，反对周恩来同志，企图做党的副主席，并且要当国务院总理。他们进行了很多活动，挑拨离间。因此，反对他们分裂党的活动的斗争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斗争的方针、方法也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是不能翻案的。这个斗争对于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和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对于保证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说这个斗争对于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有重要的作用呢？因为高岗是得到苏联支持的，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斯大林把高岗看作是中国现代的张作霖，是个地方军阀。因为当时张作霖一方面依附于日本，另一方面也依附于俄国。他把他看成是地方割据的一个首脑人物。如果说有什么人里通外国的话，那么高岗就是一个，彭德怀倒不是的。高岗是里通外国的。因此，我们粉碎高岗、饶漱石的分裂党的活动阴谋，对于抵制苏联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56年9月举行的八大，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八大对于阶级关系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那么这就是八大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阶级关系的分析。那么，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在这种变化了的国内形势下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八大提出的任务实际上是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任务，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以前的任务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这还占很大的成分，到这个时候呢？主要任务是

发展生产力，不是进行阶级斗争，不是改变生产关系，而是发展生产力。八大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同志们听说都做了很详细的讨论。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这方面的情况，因此，后来作为残余形态表现出来的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面前，又发生过夸大它的严重性的情况，以至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陷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些问题。

第三个时期，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或者叫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的严重失误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时期，1957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将近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曲折地前进的。它包括了路线正确、错误、正确的过程。党的路线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开头的一段还是正确的，特别是1957年1月到5月的这一段，如果从八大结束时算起，自1956年10月到1957年5月。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毛泽东同志在八大以后，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社会矛盾的变化作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发展。这个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正确的。然而，接着从1957年5月到12月，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这样讲不是要肯定反右派的斗争，恰恰相反，我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当时对于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对广大的群众进行教育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这样做也是必要的，现在也还有一些右派分子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发动一场全国范围的划右派分子的群众运动是错误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反右派斗争这个运动的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扩大化到什么一个情况，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据统计全国的右派分子大概有55万人，一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呀，什么等等，或者没有名称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这55万人到现在为止清查的结果，有98%都搞错了的，都改正了，只有2%现在没有改正。在没有改正的人里头，有些他的确是犯了算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的，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标准了。但有些，他是因为说了些不正确的话，但有的历史上又有些问题，历史上比方说是历史反革命，这些人就不给他改正。所以这2%里头，还包含了一些老帐新帐一起算的问题。可能有一些还不够这个右派分子的这个标准的。再说，这些右派分子是不是一定要划，一定要戴帽子？完全可以不划，大家知道他有这个错误就行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很有名的梁漱溟，他是经常要批评共产党甚至反对、攻击性的言论也有。我们党对他进行了批评，批判他的错误言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给他戴帽子。什么时候给梁漱溟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呀？没有，到现在没戴。不但没有戴，而且他还是政协委员，最近他还被提升做政协常务委员了。那么留他在那里做样子让大家看，我看也没有什么害处。所以戴右派分子帽子这事啊，是不必要的。反右派斗争本身就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过从当时整个党的工作来看这个错误还是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还没影响到党的全部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1957年从5月中旬以后到12月恐怕还不能说党的路线是错误的，基本上

还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因为这一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从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来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因为反右派斗争中间采取了一个所谓“四大”的方法，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用“大字报”来围攻这么个办法。有的时候也叫做鸣放辩论的方法，这是一种强制的方法，是一种强制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所以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反右派斗争中的这种方法后来就运用到所谓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间去。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都是反右派运动的错误发展和进一步的扩大。这是一段。1957年这一段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958、1959、1960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并且是全局性的，影响了和包括了党的全部工作的错误。所谓“大跃进”的错误，“大跃进”，我们现在是把它打上个引号，因为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大跃进。“大跃进”的错误是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批判反冒进就是要冒进，就要号召在全国实现个大冒进。这一年的3月，1958年的3月，党中央在一个文件里头正式号召“大跃进”，打了引号的“大跃进”。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同志甚至这样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写在历史上应该说是很滑稽的。冒进就是冒险盲目地向前冲，叫做冒进嘛！冒险地前进嘛！冒险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冒险倒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就是从文字上来说，也是违反逻辑的。可是他老人家居然地说得出这种话来。批判反冒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批判周恩来同志，也批判陈云同志。所以，批判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的反冒进开始了一个大冒进，这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过高的指标，而且终于拍板定案，到了7月8日就定了下来，在这一年钢要翻一番，粮食也要翻一番，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完全不可能的。按照现在我们知道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管在哪个制度下，一年翻一番，根本没有这可能，现在还没有过这样的奇迹，但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是要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个高指标下，号召“大跃进”。在确定钢铁翻番、粮食翻番的高指标下，还加上个人民公社运动。刚建立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没有巩固下来，又不让它巩固了，马上就翻上去再提高一级。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很多穷富不等的队，把它合并在一起，统一核算，这不是穷富拉平了吗？这不是共产风吗？其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完全拿来充公，这不是共农民的产吗？共富队的产，共农民的产。这股共产风是党中央确定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就包含着的因素，必然要这样，必然要刮共产风，因为它本身规定的就是剥夺农民的办法，要把穷富不等的、好多个高级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要取消自留地，就是这么一个办法。所以不能说刮共产风是基层干部在那里刮的。不是的，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要实行人民公社本身就包含了刮共产风。这就是一个剥夺农民的错误的办法。现在人民公社这个牌子还在挂，但是实际上原来人民公社的内容已经不存在了，什么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统一好领导，这个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现在还叫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两个运动，就是全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的工作，都是用群众性的鸣放辩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来强制推行的。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党的领导人又陷入了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倾的空想，或者象彭德怀同志所讲的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是说到要点上去了。当然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党中央的其他的领导同志对这个错误也有责任，对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当时也有责任，因为他们的头脑也发热了，以为可以快一点过渡到共产主义，所以表示赞成。但是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错误要负主要的责任。毛泽东同志首先提了所谓“一大二公”的公社理想的这种先验的模式，北戴河决议里头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的宣告，宣告了这样一个论点，很快地就可以过渡共产主义去了。还有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的讲话，1958年七、八月在北戴河发表的一个讲话，主张废除工资制度而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党的领导人的思想里头有一个相当成系统的“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共产主义或者这个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是空想的，是代表农民的那种平均主义的偏见的。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58年底发现了工作中间有“左”的错误以后，开始采取措施来限制这种“左”的错误的发展，并想加以改正。1959年上半年继续做纠“左”的工作，但是纠“左”是在肯定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正确以至于完全正确，所谓伟大成就这个前提下来进行的。所以理所当然地遇到了阻力。底下执行了这个“左”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个“左”的错误路线的各个省委书记以及各级干部也想不通，你说我执行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又批评我工作中间有“左”的错误，他就不承认有“左”的错误。很多人都不承认，这样子所谓纠“左”就遇到了阻力。在“左”的错误还没有根本纠正的情况下，或者说基本上还没有纠正的情况下，1959年下半年又错误地批判了提出正确意见的彭德怀同志，错误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就使得“左”的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更加不可收拾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下半年。所以全局性的错误大概持续了两年多到三年。我个人是这样看的。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说1958年到60年的“左”的错误，只是局部性的错误而不是全局性的错误，我认为是不通的。我认为应该干脆地指出，明确地指出，1958年到1960年毛泽东同志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现在有很多同志也是这样讲的。我赞成这个意见。

党的领导的错误是造成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的主要因素。这三年困难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使得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志们都知道，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意思，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是什么意思，饿死了多少人？比方在你们安徽饿死了多少人？党的领导工作中间的错误是造成1960年到1962年三年困难的主要因素，加重这个困难的是另外两个因素，就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对于苏联压服中国和控制中国的狂妄企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这个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很大的历史功绩的。毛泽东同志敏锐地观察到苏联已经变修了，变质了，并且做出了一些正确地分析。比方他在关于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头指出，苏联的宪法，以及苏联的经济学

教科书空谈苏联劳动者有这个权那个权，比方说有受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唯独不承认他们有管理国家和管理文化教育这个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这个分析我认为是对的。又比如他指出苏联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东方西方的学者都指出，苏联特权阶层是在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赫鲁晓夫把这些都继续下去了。我认为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当然，毛泽东同志和那个时候的党中央对于苏联的变修也做了些错误的解释。比方把按劳分配、奖金、利润等等都说成是修正主义，这就不对了。“九评”里头包含了一些错误的解释。但是我认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本质上还是正确的。

因为发现情况严重，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了彻底纠正“五风”的紧急指示，这个时候起开始认真地改正“左”倾路线的错误。12月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1961年、1962年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经济，很快就收到了成效。1961年到1966年，是党为纠正错误而斗争的六年，这六年党实际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所谓基本正确，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的错误是由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同意之下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纠正“左”的错误当时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哪些同志呢？毛泽东同志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可以说是起了主导的作用。他主持制订了十二条以及后来的六十条。在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纠正“左”的错误那是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起了主导的作用。也不能说毛泽东同志自己没有做纠正错误的工作，但是大量的工作是其他同志来做的，大概是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他就是纠正“左”的错误，也没有指出他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他是不承认的。反右倾的错误大部分纠正了，大部分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同志，给摘掉了。但是纠正得不彻底。庐山会议的错误的决议没有撤销，彭德怀同志、黄克诚同志、张闻天同志、周小舟同志，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到平反。反右派斗争中间扩大化的错误虽然已经提出来了，但是没有纠正，他拒绝纠正，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因此一句话下去，也就纠正不了。总起来说，对于“左”的错误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没有加以清算。谁都不能够说这是一个“左”的错误路线，不能说这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这样说。就是1962年这个总结历史经验的七千人大会，也是很不得底的，是在肯定所谓党的路线的正确底下来总结经验的，这个就不是实事求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路线的错误，这是很明白的。1958年的总路线到底对不对，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过去我们一直说1958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对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认为，这个路线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这是主观主义的总路线，因为它只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去建设社会主义，至于采取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方针，怎样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这里是没有反映的。这个总路线开头只有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要求快快快，要大干快上，就是这个，这就很难说是正确的路线。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也可以暂时不作结论。但是实际的工作，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它所推行的是高指标和共产风，这个当时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对于这个当时没有清算。没有分析这个错误

从那里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的错误。因为彭德怀的事发生以后谁也不敢讲这个问题了。彭德怀讲得很正确,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彭德怀同志,当时也没有说是路线错误。这个更不敢说了。他说路线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工作中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个左的错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纠左比纠右反右还要难,要很重视这个纠“左”的工作。他作了这个发言以后,他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也没有提出这个错误的性质问题,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更没有清算它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所以我们在上面讲,基本上是把那个错误纠正过来了,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过来了,但思想上没有纠正。思想上甚至没指出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左”倾的路线错误。由于“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没有清算,因此就不可能彻底纠正,更不可能避免重犯。所以,1958年的错误同后来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有内在联系的,是不能割断的。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左”倾路线错误,是1958年到1960年的那个“左”倾路线的进一步的登峰造极的发展。

由于对“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没有加以清算,因此就不可能彻底改正而避免重犯,相反地“左”的错误思潮还在继续发展。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斗争,要年年、月月、天天讲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这就出来了一个新的因素,在反右派斗争中,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段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上面不是讲了嘛,八大讲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1956年基本解决,但是反右派斗争中和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讲话,我们党中央的文件里头,反映出来的是轻率地把这个估计推翻了,认为主要矛盾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个特别清楚地反映在1958年5、6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间。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就把这个主要矛盾的时间更延长了,延长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就在这时候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把这个错误的论断延长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四清运动,也就是在这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下发生的一个错误。虽然这还是局部性的错误,因为全国农村三分之一进行了四清,还有三分之二还没有进行四清。当时党的整个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从大的方面来说,基本上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成绩还是主要的。

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对纠正四清中间的“左”的错误尽管起了一定的作用,解放了一些基层干部,但是,更重要的是“二十三条”在三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一个就是认为中国无论在城市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个形势估计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个是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认为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就是提出了一个不科学的“走资派”的概念。这些就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严重更加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从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为止,有将近十年半时间。

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左”倾路线错误,

事实上已经作了结论。四中全会通过的去年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从形势估计到斗争的方针方法都是错误的。五中全会的公报说，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令人痛心的错误。事实上这些提法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全局性错误，是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左”倾路线错误。

毛泽东同志是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要对这个错误负主要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同志可以说要对这个错误负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这个运动是他发动的，特别是有很多的同志被打倒以后，靠边站以后，他们就不能负责了。

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继续工作的那些同志是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幸亏有周恩来同志的努力，才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同志始终反对派性，反对打倒一切，反对全面内战，始终坚持团结、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继续进行生产，维护和恢复工农业生产。因此，周恩来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对党的事业作出了特殊的杰出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所以成为浩劫，成为悲剧，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左”倾路线错误，并且把它推向极端，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反革命大破坏。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是有联系的，因为毛泽东同志除了提出“文化大革命”这条“左”倾路线错误能够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以外，还重用了林彪、“四人帮”。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差别。因为毛泽东同志的问题还是共产党员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的问题，还是属于好人犯错误，他的主观愿望还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前面所说的是“左”倾的空想。但是林彪、“四人帮”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他们的问题是属于反革命进行破坏的问题，他们从事的是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勾当。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主要方面，是错误，是灾难，是浩劫，是黑暗。但是这十年中间也有光明的一面。在这十年中，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主张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对外政策中，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和平的外交路线。这当然不是说，在对外政策、路线方面，就没有一点缺点了，比方有些过“左”的东西，也影响了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但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和平的外交路线，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相当严重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作为离开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但是他又没有完全离开，因为他始终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还对他们有批评，并且解放了不少的老干部。这些就使得我们党后来比较容易地粉碎了“四人帮”。

在这期间，广大的群众，广大的干部，特别是老一辈的革命家，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和“八大”以前的正确的路线，对于“左”倾的错误路线进行抵制，特别是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用各种方式进行了反抗和斗争。这就证明，在十年动乱中，我们的党还是存在的，党的事业没有中断。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已经改变了性质的看法是不对的。党的事业没有中断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遇

到了广大干部、广大群众的抵制的所谓“阻力”。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崇高的威望，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长期以来进行的反修防修的这种宣传的影响，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的确亿万群众是拥护这个大革命运动的，亿万群众是参加了这个运动的。但是，很快没有几个月，很多的群众，广大的干部，党团员多数，特别是老工人、老农民就看清楚了，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这到底对不对？把所有的党委都打成黑党委到底对不对？所以多数的同志对于这样作，表示不同意、表示怀疑、表示反对。所以，多数的党团员，多数的干部和群众，很快被打成所谓的“保守派”、“保皇派”。这就是所谓的各级领导，各级的党委，很多的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遇到的“阻力”。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得不到多数人拥护的，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是有抵制的，有看法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实是，1967年2月，就在中央领导机构内部，发生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的所谓“二月逆流”，这本来是正确的，因为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这样作不对嘛！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间的多数，相当多的同志，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结果呢？他们被打成了所谓的“二月逆流”，所谓“最大的反党事件”，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三个事实，特别是到了1976年4月，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错误再也不能忍受了，因此千百万人走上街头去悼念周恩来同志和反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同时抗议错误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都是党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革命力量所进行的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的英勇斗争。特别是1976年4月5日前后的规模空前的革命群众运动，或者叫作“丙辰清明”运动，是中国人民的新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它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可见，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是交错着正确与错误、革命和反革命的复杂的斗争的。并不是那个十年，只有黑暗，没有光明，并不是漆黑的一团。这是第四个时期。

第五个时期，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过去四年了，但是还没有结束。

这个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本来从1957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的严重失误，发生了两个曲折，使全国工作着重点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间，耽误了将近二十年之久。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说这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发展的道路还是曲折的。有的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中间“左”倾路线，继续坚持这个左的路线，提出了两个“凡是”，因此就妨碍了党中央重新确立党的“八大”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是到了三中全会，经过两年的曲折的斗争，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才重新确立了和发展了党的“八大”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段，可以说，是党的路线最正确的一段时期。而且党的正确路线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上大见成效，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党的事业的发展 and 进步。

那么，对三十一年来党的工作的基本评价是怎么样的呢？总起来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三十一年来是作了英勇的伟大的斗争。尽管发生过两次全局性的左的错误，但是在三十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此我们取得了四个方面的伟

大成就：

（一）打倒了反动派，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虽然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不完善，党和国家民主生活和法制还不健全，但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定能够改正过去的错误，我们一定能够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二）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我们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消灭了剥削。

（三）我们发展了经济和文化，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即消灭贫困、落后，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们毕竟是为四个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四）维护和巩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先后进行了英勇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和英勇的伟大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坚持了国际主义，尽自己力所能及甚至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去支援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这就使我们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并且终于争取到了，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三中全会以后，终于争取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前有利的国际条件。现在我们的国际条件是很有利的。

总之，我们做到了消灭剥削，但是还没有做到消灭贫困落后，这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三十一年党史的基本总结。

我们犯了两次大错误，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是挫折和失败终于教育了我们党，使我们开始比较深刻地认识了继续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规律，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建国三十一年来党史的轮廓。

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对于一个郑重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仅仅指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以及什么人对错误负主要责任，这是远远不够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里头说得很对：“一个政党对于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

那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会犯这个令人痛心的错误？这是有待于我们，包括在座的同志们去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以下只是说一些初步的大概的想法：

第一、“文化大革命”直接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的产物。我们的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更是长时期地站在这个阶级斗

争的漩涡的中心。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形成了我们党的、首先是毛泽东同志的把阶级斗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甚至于过分估计阶级斗争的意义的观点。尽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度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这个正确的估计，但是只要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重新出现，而且阶级斗争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阶级斗争残余的形态，只要这种现象重新出现，我们就很容易认为阶级斗争仍然是严重的存在，认为抓阶级斗争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认为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一切，对待一切。现在有些同志还坚持这个，对什么问题都要作阶级分析。1957年5月中旬以后，由于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表了一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其次是全党，又重新转到强调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去，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陷入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应该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的残余是仍然存在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存在，对这个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的残余，我们不应该忽视。那么，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这样严重的估计。下面我们分为五点来说：

（一）认为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1956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认为在我们的城市和农村，还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不但从前的剥削阶级总是人还在心不死，这是毛泽东同志喜欢说的一句话，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而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集体的农业仍然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列宁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里头搬来的一句话，就是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讲的是没有合作化以前的农村，讲的是小生产者的农村。而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搬到我们已经完成了合作化的情况中来，这个情况是根本不对的。而且进一步我们问，即使在小生产者的情况下，是不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列宁那个说法是不是也有点夸大了？就是在小生产的条件底下，这个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象，可以说有一些，但是你要说大批地每日每时地产生了，这还是夸大了。就是说，我们对于列宁的那段话也可以做一种判断，他也有点夸大了。在那个时候也夸大了。在集体农业的条件下，这样说基本上是不对的，不会有这样的事，不会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会是这样的。不单是这样，毛泽东同志还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一部分，也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也产生资产阶级。他是说国营工厂工人的一部分，我们机关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一部分，也在变成资产阶级。张春桥特别讲“几个一部分”，说毛泽东同志讲了几个一部分都变成了资产阶级了。这样，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一方面老的剥削阶级总是人还在心不死，这个情况一点也没有变，那么，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毫无效果。旧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一点也不能改变，连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老老实实劳动的人，也还是人还在心不死。另外一方面，新的剥削阶级又大量地产生。从哪产生呢？就是从农民里头，从工人里头，从机关干部里头，从

共产党员里头，不断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不是越来越多了吗！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这是根本不对的。这是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这是第一个方面。

（二）认为不但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在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造之后，在他们实际上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十多年之后，几乎全部都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点也没有变化。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自己培养的、新学校培养出来的新的知识分子，据说，由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样，培养出来的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几乎是资产阶级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也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不但毫无力量，没有力量，没有能耐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过来，而且我们的工农子弟在进入学校以后，也变成资产阶级了。据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这样，在他老人家看来，资产阶级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呢？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的论断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把知识分子看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是一个社会阶层，它是由为各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般说来，在旧社会里头，可以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可以说是属于小资产阶级。但是，我们要知道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很不同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把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还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更错误的。把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统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更错误了。把他们说成就是资产阶级这就更加错误了。而且，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个概念，实际上扩大到所有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里面去了。所有出了名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然毛泽东同志没有明确地讲，所有出了名的都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保的人，不保的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他是把他们看成反动权威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我保两个人：保两个历史学家，一个是范文澜同志，一个是郭沫若同志。保这两个人，我保他们，不要把他们打成反动权威。那就是告诉人们，除了此两老以外都是反动权威。所以，知识分子就倒了霉了！只要是出了点名的，有点代表性的，有点成就的，全部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都在批判打倒之列，这是第二。

（三）不但党外产生着资产阶级，而且党内、军内、政府内，也产生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最后还说，在1976年四号文件里头是这样载着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段话已经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了，据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当时最新的指示，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庆祝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上，吴德同志的讲话，引用了这段话。所以这段话是很有名的，而且是肯定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

资派还在走。根据这个，“四人帮”就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而且，据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部资产阶级的主体，提出了这个论点，你说他有根据吗？我看有点根据，因为毛泽东同志明明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嘛！这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你说这是“四人帮”歪曲了毛泽东同志的论点吗？没有歪曲。毛泽东同志讲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主要的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因此，主要的革命战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战场，现在是在共产党内。这就叫做“共产党整共产党，一整就往死里整”。有个话剧里头一个老工人不是讲吗，“怎么老是共产党整共产党，一整就往死里整。”这是有一个理论根据的。这就是说，有一个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要在党内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党内去反对资产阶级，这是第三。

（四）认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所谓“我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同志这样讲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放在那个造反派的一面了。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也只能是专政或独裁的关系，决不能是别的什么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对我们党内各级的领导人，就是所谓的走资派，对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旧社会过来已经长期为社会主义服务了的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和平共处，不能对他们讲平等，而要对他们实行专政、独裁。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第四个组成部分。

（五）认为这个阶级斗争会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会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问问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呢？根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呢？他老人家是没有说明的，他也不能说明。这是武断的，他只是断定是这样而已。他讲不出什么理由来。开始的时候是说要用阶级斗争，用政治来统帅一切，开始他还没有否定还要从事生产，还要进行科学实验，而且他还说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样的话。但是接着，他实际上认为只要抓阶级斗争就行了，因为他在1963年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说，只要抓了阶级斗争就行了，其他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并且他还默认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认为谁要抓生产就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这是列宁一再说的，而且这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甚至连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来。他只是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不能消灭阶级，阶级都要存在，这就否定了列宁所讲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这个论断，也就是说离开了列宁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这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结束以后，阶级斗争是不是会消灭？和为什么会消灭？也没有说明。我们假定，毛泽东同志讲的是对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走资派还在走，一直走到比方说今天早晨是共产主义，昨天晚上12点钟还是社会主义吧，一直走到那个时候一点也没停。但是它怎么到了零点零一秒钟就停了？走资派就不走了呢？走资派就变成无产阶级了呢？这是很神秘的，不可能的。如果他一

直都在走,走到昨天晚上12点,那么我可以肯定零点零一秒钟他还是走资派,他一点也不会停下来。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不能消灭的,因为走资派老要走嘛!那么现在我们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讲的阶级斗争是什么呢?什么是阶级斗争呢?就是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夺他们的权、清洗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据说,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这就很神秘。过去我们知道的阶级斗争是奴隶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那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斗争,这很容易理解,一看就清楚。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不是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少数人,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多数人的斗争,就是所谓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打倒反动权威的斗争,夺他们的权。而且在他们中间互相夺权,还有反对保守派。“保守派”、“保皇派”大多数都是革命的对象,据说这就是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斗争要每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据说这是命定的,因为,牛鬼蛇神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一定要跳出来,所以我们就每七、八年进行一次。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刚好七、八年进行一次,而不是七、八个月才进行一次,也不是七、八十年才进行一次,那么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因为这是非常神秘的,是不能说明理由的。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来,那肯定在那个时候要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因为他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要七、八年进行一次,不是七、八个月,也不是七、八十年。这纯粹是一种武断,是一种臆断,是一种历史唯心论。这个看起来情况是非常阴暗了,因为虽然每七、八年进行一次,但是阶级斗争依然没有变化,事情毫无进展,结果只好不停地每七、八年进行一次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观点。竟然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就说明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已经没有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分析的能力,丧失掉这个能力了。认为天下大治必然变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又必然达到天下大治,一治一乱循环无已,这已经完全回复到历史唯心论里头去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那个旧小说里头,一开头就是,话说天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这是一定之理。那么毛泽东同志重新陷于历史唯心论的这个循环论去了。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直接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思想的产物,他是根据这个来行动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又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左”倾空想的产物。或者是“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在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论述的社会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1957年以后,他就逐渐产生了“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脱离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认为只要不停地进行阶级斗争,不断地随心所欲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能够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而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社会差别的社会平等的理想。所以我们说,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左”倾的。所以说是“左”倾的,一个是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另外一个急于求成,就是一下子就跳到共产主义去,所以是“左”倾的、空想的。在发展的速度上是急于求成的。早在1955年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里面,就表现出了在短时期内就能够成倍地或者几十倍地发展生产力的空想。为了实现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1958年11月就批判反冒进,1958年初进一步批判反冒进;1958年

中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主观的先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模式，1958年7、8月间提出了要在一年内实现钢的翻番、粮食翻番，在讲话中提出了对粮食吃不完的深深忧虑。晚上他讲，我昨天睡不着，有些话要对大家说，过去谁想过一亩地能够生产几万斤粮食呢？我是没有梦想过。怎么办呢？他提出解决的办法，恐怕这样下去，我们的十五亿亩地呀太多了，种三分之一，种五亿亩就可以了，另外三分之一拿来种草，还有三分之一就休耕，全国都搞成个大公园。他讲要实行吃饭不要钱，他提出了这个理想。而且在这个讲话里头，他大力抨击工资制度，说本来进城以后是不应该实行工资制度的，还是原来的供给制好嘛！我这样主张有些人说我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现在证明我是对的嘛！就应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等等。1966年，作了所谓“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提出了一个人同时学文、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说什么也不要学，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学不成、做不成。工人也不要做工，农民也不要种地，学生也不要学习，主要地是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什么思想呢？我看这就是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我认为这好象是一种意味着同“穷过渡”，“穷拉平”并列的“白拉平”的思想。把大家没有文化都拉平，大家都不要学了，不要文化。1974年12月的理论问题指示，更加把他老人家要消灭商品、货币、工资这几样东西的意图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说，我们中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还存在着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这些都和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所有制变更了。对这一段话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因为都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八级工资制，所不同的呢只是所有制变更了。就是大的相同只有小的不同，只有个小小的不同，就是所有制变更了。由此可见，这个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都是很不好的，要尽量地快点把它消灭掉。但是，由于这些空想是不能实现的，因此，这种空想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财政部也算了，想实行供给制，但是，算来算去觉得非常复杂，而且财政开支还要增加，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而且是个无底洞。你如果生子女就要给钱，补贴的话，这是不行的。总之，行不通。大家既然算来算去行不通就只好告诉他老人家这样做不成，不能实行供给制。因此老人家不高兴，认为大多数人是反对自己的，认为党政机构自己都控制不了了。这是他对斯诺的谈话，说在1966年我对党政机构已经控制不了了，等等。那么这大多数人，为什么不听话了呢？据说都是“官作大了”，这根据1976年4月四号文件上讲的，都是官作大了，有既得利益要保护，都成了走资派了，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甚至是成了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怎么办呢？据说，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去搞，都不解决问题了，于是就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全面地公开地揭露所谓我们的黑暗面，于是他就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方、各部门的代理人，夺他们的权，清洗他们，如此等等。那末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发生了。为了实现他那个空想的目标，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第二。

第三、毛泽东同志所以陷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是由于在1956年后，在国内国外取得一系列巨大胜利、赢得巨大威望的情况下，他老人

家开始骄傲了，不谨慎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也脱离党中央的集体了。脱离到什么程度呢，脱离到这种程度，就是不和大家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只是听汇报，只是必要的时候出来讲话。他话讲出来也不能变更的，变成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可以随便今天指责这个同志，明天指责那个同志，似乎人家都不对，只有他一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别人都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评得又很严重，实际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最大的实际是什么？就是全国广大的人民要求消灭贫困、落后，改善物质和文化生活；要求安居乐业，不要再折腾了。解放以来，我们进行的运动太多了，一年一个，运动不断。这个时候人民要求安居乐业，不要再折腾了，一个要求消灭贫困落后，一个要求安居乐业，这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实际。但是，这些被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置于脑后，而且越来越置之不顾了。1958、1959年以后党内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康生、陈伯达之流，大肆宣扬个人崇拜，把党和人民的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同志个人，把个人神化，把毛泽东同志塑造成为一个神，更把毛泽东同志推向更大的错误的境地。所以，为什么犯这个错误，那是因为他骄傲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了，就是这么个理由。

第四、发生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是在于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的国家，一言堂、家长制的流毒影响到各个阶级，影响到各个社会生活领域。这是讲历史根源。另外一方面，讲社会根源。我国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个体生产者的保守的农民象汪洋大海一样地包围着我们的党。他们崇拜权威，又用他们的绝对平均主义即农民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影响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当毛泽东同志保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风格，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的时候，那时他是搞五湖四海的，因此他就能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很好地代表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就能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就能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反过来，当他骄傲，不谦虚谨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时，他就搞家长制、一言堂，他就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理想，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农民的“左”倾空想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了。所以，讲到关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思想，是代表什么阶级，有什么社会根源的时候，我觉得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代表农民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的人说，毛泽东同志主要是封建思想，我看不对，恐怕主要是代表农民，而不是代表封建，当然也不能说他没有封建的东西，搞家长制、一言堂，就带有封建的成分。他的社会理想，他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思想代表的阶级是代表农民的。在1935年到1957年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是发扬民主的，是搞五湖四海的，是听群众意见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党的制度也是有不民主的毛病的。《党史研究》第二期第77页上，有一个材料讲：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这样的决定，就是决定毛泽东同志担任政治局的主席，同时会议规定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规定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一个人说了算，写到了决议上，应该说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怎么一个人能有最后决定权

呢？居然写到了决议上去了。这一段历史还发扬民主，但是，毛泽东同志他有那个权，有最后决定权。另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80页上说，在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有个批示，那个批示说，今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还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中央决议是大家通过，并经过毛泽东同志同意的，但是没有经过他最后核准仍然不算数，没有经过他最后批准，还是不算数，发出了就是破坏纪律。所以，党的制度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使家长制、一言堂成为合法的那种陈腐落后的东西。这两个事实，都说明所谓最后的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嘛！

第五、“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所以发生，还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健全的政治理论和建党理论的影响这种因素。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首先是经过列宁、斯大林介绍的。列宁是个很好的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作风民主，非常尊重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的革命家。但是他也不是毫无错误的。他在沙皇专制统治下形成的建党思想，首先反映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这两本书里面的建党思想，过分强调集中而忽视党内民主，这在当时诚然是必要的，但在俄共成为执政党以后他也没有把党组织放在民主的基础上，甚至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也采用集中制原则，高度的集中啊，实际上就是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听共产国际也就是听俄国人的指挥。俄国共产党领导各国的党，指挥各国党的行动，这显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样，列宁的政治理论也是过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镇压方面而忽视了民主方面。强调到这个程度，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铁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束缚的，也就是说，包括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律也管不着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法无天，不要任何法律。这就是过分强调了暴力的作用，强调了所谓不受任何束缚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党和政府的权力都过于集中，就是集中于共产党中央，最后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领袖人物的现象。苏联就是这样的。因此长期以来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好象社会主义就是集权，高度的集权，集中于一个党中央，然后集中于领袖，这就是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要变成少数人的专制和个人独裁，就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甚至当列宁发现斯大林权力太大，并滥用权力，想制止他不让他当总书记时，他也无力加以改变，也改变不了斯大林这个滥用权力的现象，因为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建党理论就是那样的。而且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已经掌握了党的机器，列宁要纠正他也为时太晚了。这是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某些不足之处。我这样讲当然有些同志会听不惯的，怎么列宁是革命的圣人你还说他有错误，你这不是大逆不道吗？我看，不要那么去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没有错误的，没有什么圣人，他比我们伟大的地方，不过是比我们看得更多、更高、更远，很多是正确的，错误少一些，如此而已。错误只有多少的不同，不会没有错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活动，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可以理解。至于我刚才讲的这些错误，算不算错误，大家可以研究。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左派”幼稚病》这本书里头讲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那一段话讲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经常被人家引用的那一段话说：群众通常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有政党来代表的，这个政党呢通常是由最有经验的领袖们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里

头他强调了什么，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领袖是少不了的，他强调的是这个，他强调的是领袖的作用，而不是群众的作用。那么在科学上列宁的这段话，对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应当说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因为他针对“左派”攻击党的领袖来说的，所以他强调领袖的作用，那么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领袖从哪里来的，领袖如果不代表群众，难道群众没有理由把他抛弃掉吗？所以列宁的这个《“左派”幼稚病》这一本书里头关于政党、领袖和群众的这个关系在科学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前进一步。列宁还有其它的问题，我就讲这个权力过于集中，我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从哪里来的？从老祖宗那儿来的，我们追根追到列宁那儿去，岂不是对他老人家有点不尊敬？我们大家可以研究，我现在是这样看的，大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党是学习俄共的，学习列宁、斯大林的，尽管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干涉（这种干涉都是错误的了），作了坚决的斗争，因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又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捍卫住了中国的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立下了很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另外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学习和继承了苏联的党和国家都由个人集权的制度和斯大林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方法。这就势必造成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不正常，造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的被破坏，因而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的话，如果我们不把国际的因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消极的传统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里头的缺陷也拿来分析的话，那就是不完全的。我们就还是走不出斯大林把我们引进的那条死胡同去，就是个人专断，一个人说了算，那种权力过于集中的错误制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这种教训是什么呢？也就是叶剑英同志去年的国庆讲话第二部分里头已经讲了的四条教训，现在重新简单地重述一下，可以这样说：

（1）在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建立和巩固以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必须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一定要实现这个重点的转移。“八大”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抛弃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否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解决，说这个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又转回去了，不是重点又转移了，还是搞阶级斗争啊。四中全会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除非遇到大规模的外敌的入侵，在那种情况底下当然还要进行各种必要的经济建设，除非是发生了这种意外情况，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都不要动摇全国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这是第一；

（2）要正确地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阶级形势，严格区别两类社会矛盾，经过法律程序来处理作为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和其他严重犯罪事件，保持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长期的社会政治安定，这是对于阶级斗争问题要正确的理解。刚才有一位同志问我，1956年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怎样看，我个人认为，在党的文献上边也是清楚的。这个在56年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了。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它有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围绕着要不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经

济的现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要不要这样做，怎么做法？围绕着这个问题，要不要实行四个现代化以及政治民主化而展开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主要矛盾。比方说我们同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矛盾，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说是阶级斗争，我看可以不必，而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不过是相当严重的人民内部矛盾。他坚持“左”倾错误路线，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个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要我们搞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我们要搞，这就有很激烈的斗争。它也可以说，这个矛盾反映到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同自然的矛盾上头去。我们要主张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同志讲的就是向地球开战。今后的重点在这里，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的是向地球开战。也就是改变我们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同人民要求迅速克服贫穷落后，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之间的矛盾。总而言之，我觉得把这个矛盾概括成人民内部矛盾，好象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讲的就是社会间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斗争问题。阶级斗争结束以后，人和人中间也还有斗争的，还有团结的。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通常不是对抗性的。用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时候还存在的敌我矛盾，阶级斗争的因素，就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什么地方发现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就用法律的办法来处理，用不着在全国发动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家都来讨论都来找阶级敌人。以后再不要这样折腾了。这是第二。

(3) 实现党的民主化和国家的民主化，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必须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实现从下至上的全面的民主选举制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有效监督；必须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制。

(4) 要正确处理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坚决实行集体领导和集体交班、集体接班制度，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集权和专断，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和个人交班、个人接班的制度。用一切办法来保障群众充分发挥历史首创精神，用一切办法来保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执行群众的意志，保证他们始终做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员，防止他们从人民的勤务员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要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这里面就牵涉到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生产关系，改革和完善我们党的制度，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我们的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苏联变修变质的惨痛的教训，以及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的经验，的确使得我们对什么是专政、什么是民主，以及怎样建党、怎样建政等等许多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觉悟。使得我们懂得必须从斯大林引入的社会主义的死胡同里边走出来，那条死胡同使得社会主义变质变修，而寻找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道路。

在讲第三个问题前，先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五七年以后党内是不是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是代表哪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有没有一条正确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是代表哪些人？这些问题怎么看呢？在这个期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是这样：是有一条正确路线，这条正确路线就是“八大”和“八大”以前形成的党的路线，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另外的正确路线呢？我看没有。“八大”和“八大”以前的正确路线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形

成的，他是这条正确路线的代表，或者说是集中的代表。后来他离开了这条正确路线，另外提出了“左”倾的路线，这就造成了一种复杂的情况。另外有一些同志在不同程度上还坚持原来的正确路线，认为应该按照党原来形成的路线办事，因此发生了矛盾。凡是提出这个意见的同志都在不同程度上代表或者坚持党和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路线。比如彭德怀同志，他提出的意见书，就是坚持党原来的正确路线，认为那样做不行。你说他另外提出一条什么路线吗？没有。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某些时候看得很明显，一是“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些同志包括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他们批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如打击老干部，不要党的领导等等，认为这是违反了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路线的。可见他们还是站在原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上，来批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路线。所以，没有另外一条正确路线。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周恩来同志取得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就着手恢复党的固有传统，解放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大成绩。毛泽东同志开始是允许他这样做的，后来就不高兴了，因为他恢复了原来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就批了右倾回潮，后来又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斗争，反对周恩来同志，可见周恩来同志是坚持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的路线，“八大”的正确路线。再一个例子，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他提出要整顿各项工作。怎么整顿呢？按照“八大”的正确路线来整顿。当邓小平同志着手恢复党的正确的路线，即“八大”的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不高兴了，就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把他搞下去了。所以，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都是代表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提出的正确路线。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呢？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背离了的“八大”的路线。当然，的确不但恢复了，而且向前发展了这个路线。关于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能象历史上那样，象同王明路线斗争那样，一面有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一面有王明路线。而现在的情况大体是，毛泽东同志原来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同志后来的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不过，后来毛泽东同志支持了错误的路线，另外的人还坚持他原来的正确路线。

第二个问题，右派不叫“平反”，叫做“改正”，“改正”与“平反”有什么区别？回答：没有区别，是一个意思。起草文件时大概是考虑到毛泽东同志原来说过，反右派斗争没有平反的问题。好，你不叫“平反”就叫“改正”，反正是一样。

第三个问题，五六年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已经讲过了，我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人民内部矛盾围绕着要不要搞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展开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主张这样搞的，那就是人民内部的先进的思想，革新的思想；反对这样做的，是落后的思想，守旧的思想。他们之间的矛盾，每天都可以看得见。有些人不愿前进，还想回到过去那种错误的路线上去，因此就同其他同志发生了矛盾。这个人民内部矛盾，集中反映在人民要求迅速发展生产力，为此目的就要实现高度的民主化，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人民的要求，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吧。可是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不主张这样做，还是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宁可穷一点，却要搞得纯洁，一定要坚持毛主席那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继续革命。现在

有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怎么放弃了阶级分析呢？就是反映这种看法的。

还有一个问题：说《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市某人民银行贷款，搞缝纫业，引起很大的争论，问是否现阶段允许剥削的存在？由于雇工使他收入比原来有很大增加。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能答复。即使他请了一两个帮手，有一点剥削，大概也不够叫做资本家，也不能看作是剥削分子。当然剥削分子我们是要反对的，特别是党内的蜕化变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所有这些都是非法行为，是我们禁止的。至于外国资本家拿钱来办点企业，即使有点剥削，也是允许的。

下面回到我们的正题，还有两个部分：

三、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这部分马齐彬同志已经在这个会上作了详细的讨论，讲了三个半天，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讲一讲或许可以帮助同志们进一步了解问题的一些意见。

今年六月十三日，胡耀邦同志在回答南斯拉夫记者关于“毛泽东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是否要负责”的问题时说：“我看应该。我们党中央一直这么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中国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同时，在晚年犯有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一生的正确评价。对他的功绩不抹杀，对他的错误也不隐瞒。

他在六月十六日的一个内部讲话中又说：在毛泽东同志处于中央领导地位以后，“一九三五年以后，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是不搞一言堂的，是搞五湖四海的，是听群众意见的。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作出了伟大贡献。对于这一点，我们永远不会抹杀的，也不应抹杀。抹杀了就是违背历史，就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后期，在晚年，的确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许多不幸，功是功，过是过，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站得住脚，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子孙。”

确实，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已经写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作出了重要贡献。那时他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农民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他和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陈延年等许多同志一起同陈独秀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他总结全党的斗争经验，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后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策略，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创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军队，经过许多曲折，战胜了错误路线，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遵义会议以后，他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接着，又领导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出了一个新局面，空前地壮大了革命人民的力

量，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不顾斯大林的反，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又领导我们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胜利地建立、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迅速恢复了遭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期间，他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许多新东西。

总起来说，从1921年到57年的三十六年间，尤其是从1927年到57年的三十余年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极其光辉的。但是在后期，在1957年到1976年他逝世前的二十年间，毛泽东同志犯了1958年到60年和1966年到76年两次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许多损失。不过在后期，他在领导我们同苏联霸权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和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的后期这段时间，他的错误很大，但还是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国际方面。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无疑是功大于过的。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样说，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能够接受。至于错误的百分比占多少，那就不必去争论了。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总结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建立和发展了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马齐彬同志说过了，我就不多讲了。

我这里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指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实际的那些科学的原理和结论的总和，而不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作过的每一个决定。那个东西不构成毛泽东思想。我们讲的是科学体系，是正确的东西，我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离开了马列主义，不是这种正确的结合，而且经过实践检验是错了的，那当然就不包括在内。还有，我们讲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它要成为一个体系，那是一个什么体系呢？讲的就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中国革命是有一套理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逐渐在形成一套理论，社会主义改造是有一套理论的。这是不是一个体系？恐怕是一个体系，我们看《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在阐述一个观点，阐明中国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体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理论，那是很完备的，无可否认的。也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我们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理论也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比较完整的。我想是在五七年以前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也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思想，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法，这些都是正确的思想。再如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一系列的思想。我讲是正确的部分，错误的当然应该排除。正因为这样，我们给毛泽东思想下的定义，我们要坚持的，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他的科学的东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东西，是他的科学体系，所以当然要把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以后断续地提出的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都排除在外。有些同志对这一点想不明白，认为毛泽东同志就他的思想，他的言

论来讲,包括了正确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为什么你要把他的错误部分排除在外呢?我看是这样讲,我们所讲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是对他下过定义的,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思想,那样我们就没法坚持,那我们就把错误的东西也加以坚持了,那我们干脆就别坚持了。相反地,如果我们因为毛泽东同志言论里面有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就提出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丢了,他原来提出的科学的东西也不要了,这对不对呢?我看也不对。所以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分开,很明显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分开,我们如果要囫圇吞枣,那末我们只能制造我们自己的混乱,或者是坚持他的错误东西,继续搞“两个凡是”;或者是否定一切,把毛泽东同志总结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这个宝贵的财富,也把它放弃掉。这个我认为都是不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好好研究清楚。一定要分开。之所以要分开,不仅是我们斗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原则是坚持什么?难道不是坚持它的正确的科学的原理吗?是不是把马克思列宁那些错误的东西我们也要坚持呢?比方说马克思对形势的估计有的时候也是错误的,我们是不是坚持那些个别的结论、错误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要坚持列宁的那些主张个人集权的错误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这样提出问题,那些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的,那些我们是要把它抛弃掉的。但是我们还是承认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列宁主义,同样还是有一个毛泽东思想。不能因为它包括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就不坚持了,不能这样。

那么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到底能不能举出一些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的贡献,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和一些同志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项:

第一,他创立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第二,他创立了关于从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独创性的学说。

第三,他创立了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科学理论和战略战术。

第四,他创立了关于统一战线,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都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学说。

第五,关于建党思想,他提出了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工人占人口的少数的落后的东方大国里,怎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政党的学说。他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并且提出了整风的方法作为实现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办法。

第六,他创立了用逐步过渡的方法去改造中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用赎买的办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当然,马克思没有试验的机会,列宁也是在没收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但在苏联也没有成为事实。只有中国才这样做了,采用了一系列逐步过渡的办法,而且做得很成功。

第七,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和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独创性的贡献。这个理论的提出影响很深远。列宁有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呢?从内容来说他是有的。我们看到他论工会工作的文章,讲到可能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要同管理国营企业的经理人员和国家机关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了。工会的任务就是要用工会所能采取的办法,同国营经济来谈判并

对工人进行说服，来解决这个矛盾。解决矛盾的方针，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实现工人那些合理的又能办得到的要求，纠正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不符合规定的做法。另外一方面，又使得这种解决无损于其他部分的工人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这种发展才是工人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而且工会还应该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你看这不是列宁关于工会在处理社会主义企业中间工人同国家的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吗？当然，他没有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直到毛泽东同志才正式提出这个名词。这是影响很深远的理论。当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是不是已经完全解决了呢？那也不一定。比方说，毛泽东同志喜欢说“团结——批评——团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光靠“团结——批评——团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处理不了。如果是利害的冲突就不能光靠这个原则。比方说，工资长期没有增加，农产品价格太低等等一些问题，用“团结——批评——团结”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还得有些别的一些原则。如实现高度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按劳分配、统筹兼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双百方针等等原则。毛泽东同志没有把这些原则归到处理内部矛盾的原则中去，虽然这些方针也是他提出的。

第八，他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面，提出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着重以农业为基础，要探索中国自己工业化的道路等等。

第九，他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运用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也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贡献。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理论贡献说明，毛泽东思想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理论表现，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存在，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的存在。因为我们党，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都在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做的，甚至我们很多的语言，例如正确处理人民矛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走群众路线，这些都在实践中按毛泽东思想来做的，这不是现实的存在吗？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干部，现在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到底有没有毛泽东思想，我看不必争论了。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也是一个历史的存在。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论述有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比方说不能讲是什么第三个里程碑，诸如此类。但是毛泽东思想确实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做出了新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也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教条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在困难的条件下，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那么革命事业就不能这样顺利迅速地取得胜利，或者是会使革命的胜利推迟。

在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有三个根本的原则，或者说三个根本的出发点。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这三个根本原则，马齐彬同志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对于这三个原则应该怎样理解呢？我还想做一点说明：

（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思想原则或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说得详细一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经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一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路线。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凡是我們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就能够按客观规律办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胜利。凡是违背这条思想路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就会在行动中违反客观规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失败。毛泽东同志自己后期所以犯错误，归根到底也是由于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这条思想路线。这就证明，这条思想路线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否则，就会犯错误，就会失败。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我们为了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所必须遵循的。

（二）群众路线的原则。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我们根本的立场和根本的出发点。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是我們力量的源泉，而且是我们的智慧，也就是正确思想的源泉。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和人民群众密切的联系，任何时候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这是一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历史的经验证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是由于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而取得的；反过来，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失败，都是由于脱离群众，违反了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自己后期所以犯错误，归根到底，也是由于脱离群众，违反了群众路线。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路线是科学，是胜利的保证，是我们为了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所必须遵循的。

（三）毛泽东思想在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出发点或者根本原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简单地说，就是自力更生的原则。这是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依靠人民必然得出的结论。它们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实际，当然主要靠自己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才能认识；我们只有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干革命，搞建设，都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学习外国一切好的经验。采取慈禧太后的那种排外的态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决不依赖外援，我们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很简单，我们是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国家，我们要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能依靠人家的一点贷款吗？得根据我们的条件，吸收一点外国的资金和学习外国的技术，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世界上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时期内，只有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才能维护我国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又是同坚持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在几十年间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各方面实践经验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工作六个方面一系列的科学原理和基本政策，都是有长期重要的指导意义的。我就不多说了。

列宁说得对：“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才能起先进战士的作用。”“而正确的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密切联系真正群众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才能最终形成。”所以有的同志说，今后是不是可以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光用马克思主义就行了，我看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成果，我们是不能放弃的。再说，如果光是把马克思主义搬进来就可以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岂不是太简单了，那王明也可以当领袖了。思想的成果，不管是谁

首先总结出来的，都是我们的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财富，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是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要求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确实是这样。拿俄国来说，俄国革命所以取得了胜利，就是由于有了按照俄国的条件具体化了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个理论，列宁把它叫做布尔什维克主义，说它是1903年开始形成的；后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把它叫做列宁主义。不管叫做什么名字，这个理论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同样地，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由于有了按照中国的条件具体化了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个理论是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形成起来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从1945年党的“七大”以来，这个理论是以毛泽东思想命名的。不管我们把这个理论叫做什么，这个理论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这个理论以毛泽东思想来命名对不对呢？是对的，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时提议使用这个名词是正确的。因为尽管这个理论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总结。尽管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各自在许多方面作了重要贡献，为我们党的理论这部机器制造了不少部件和零件，但是大家都承认，对于这个理论，贡献最多最大的还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机器的总工程师或总装配工人。因此，用毛泽东思想来作为我们党的理论的名字是正确的。

中国革命违反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意志，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世界革命史上了不起的大事，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发展。象这样历史上空前广阔、深刻的革命变革，怎么能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向前推进呢？反映了从1921年到1976年五十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反映了1927年到1957年三十多年光辉历史的规律性变化过程，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丰富传统的我们党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崇高的历史地位，怎么能够不承认，怎么能加以抹煞呢？

我们要反对在中国的革命经验、革命传统和革命理论方面的虚无主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革命经验、革命传统和革命理论，继续高举中国革命理论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包括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幸的那些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有的人问，毛泽东同志错误的理论是什么呢？主要的就是他的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的理论，就象我们前面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所谓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看法，以及他的“左倾”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所有这些，我们要把它排除掉。这些错误的东西，概括起来，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左倾”空想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这两点大概可以把这些东西基本上包括进去。我们要纠正，要抛弃这些东西。反过来说，我们只有纠正毛泽东

同志晚年的归根到底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那些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才能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才能维护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我们在一切问题上，也包括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四、沿着党所选择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

这里讲的就是根据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两个曲折的丰富的正反经验的认识，今后发展的道路是什么？这是讲我们今后发展的道路问题。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中央真正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真正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真正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去年的国庆讲话中所指出的，他说：“我们党中央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这里所讲的就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些错误理论观点等作了改变，今后也不能这么提了，也不那么做了。另外一方面，他指出在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上。这里举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第二个是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第三个叫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论断、新决策。作出这样新论断、新决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我们的党现在选择了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这么说，就是充分依靠人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从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过程中，从反复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所制定的党和国家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可以这样来概括，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党的这条总路线和总任务，规定了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采取的基本政治方针。

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规定和58年的总路线不同了，那个总路线只是笼统地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规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国庆讲话的提法比较，也改进了，因为去年国庆讲话只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没有提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和文化上的高度文明这两项重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现代化”就是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这是对经济、国防和科技建设的要求。现代化的基础和中心是经济的现代化。高度民主，就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得多的、能够确实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他们行使管理国

家和管理企业事业的权利，并且保证全体人民每个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确保这种高度民主制度的贯彻实施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这就叫做高度的民主。这是对政治的改革和建设的要求。这个政治制度上的高度民主化，是为了保障经济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生活的实现，同时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和广泛的自由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里头不是讲吗？民主看起来是目的，实际上是手段，因为政治是上层建筑的，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我们现在看来，这个提法，不太正确。民主又是手段，又是目的，它是我们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同时它本身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的一部分。试问，我们人民难道光要生活富裕就行了吗？我们还要自由，还要广泛的自由，还要有高度的民主。这样，我们才能心情舒畅，我们大家都心情舒畅了，才能够生动活泼。所以高度民主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我们的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部分。

“高度文明”，就是比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水平更高的精神的文明，它不仅在科学文化方面是比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水平更高，而且是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能有的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以及在这种道德理想引导下的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我们讲的高度文明就是说，一个高度的科学文化的水平，一个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一个健康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是对文化的改革和建设的要求。高度文明是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和政治上的高度民主服务的，同时高度精神文明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极其崇高伟大的。为了达到这个崇高伟大的目标，党的总路线规定的基本政治方针，就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这么三句话。这个规定，是1958年总路线所没有的，同去年的国庆讲话的提法是相同的。

这个规定是什么意思？首先就是说，我们是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我们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用什么办法，就是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这同时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依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来达到的。我们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的经验，但是我们首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次这就是说，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的和敌我之间的这两类社会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把它归纳一下，把毛泽东思想，把我们党中央现在的方针政策归纳一下就是这样：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上、思想上就要实行人民民主的原则（人民民主我们把它规定成为头一个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在经济上，就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对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以及各部分人民、各民族的人民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经济上是两个：一个是按劳分配原则，一个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对谁实行的？是对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以及各部分人民、各民族的人民来实行，就是说要调节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文化上，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里我们讲了四个方面，

六个原则，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达到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的。

为了达到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的，党的总路线规定的基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针，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和文化”。这个规定，和1958年的总路线不同，也和去年国庆讲话的提法不同，因为1958年和1979年的提法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十二个字。现在的提法删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种鼓动性的词句，而增加了“有计划、按比例”这样反映社会主义重要经济规律的词句。这是重要的经济规律，而且是首要的经济规律。经过这样的修改之后，就变成了“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这十个字的方针。我们基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方针，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十个字。

这个规定，首先就是要求我们遵循有计划、按比例这个社会主义首要经济规律，我们过去因为没有遵循这个规律，吃了很大的苦头，犯了1958年到1960年以及1966年到1976年两次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遭到了两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这两次都是由于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的首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犯了急于求成和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破坏了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就是积累太多了，积累率高达30%几、40%几，又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这同时也是由于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而随心所欲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穷拉平的错误所造成的。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和文化，现在党中央就决定要调整和改革经济，把积累率降到25%左右，认真地大力地发展农业，发展轻工业，坚决地缩短基本建设路线；在重工业方面，着重地发展能源、交通和建筑业。这个规定首先就是这个意思，要有计划、按比例。

其次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就是要实行一系列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实践证明，只有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的前提下实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方针，才能真正做到多快好省。否则，如果违反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规律，主观上虽然要多快好省，结果仍然只能是多快好省的反面——少慢差费。

根据这个总路线和总任务，党中央制定了通过调整和改革经济来达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生产力的方针，制定了同迅速发展生产力要求相适应，有步骤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上层建筑的方针，同时坚持和推进党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对外政策总方针。为了实现这一切基本任务，我们还要调整和建设我们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把党放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并通过党的民主化，达到恢复和发展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正在通过修改党章、修改宪法和制定长期的经济建设计划，来制定详细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纲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军事建设纲领、外交政策纲领和党的建设纲领。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充分依靠群众和走群众路线，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经验才能完成。党中央已经决定在今年年底，召集六中全会来讨论和通过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明年上半年召开党的“十二大”，讨论和通过新的党章，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草案，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草案，并且按照新的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关。在明年下半年召开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和通过新的宪法，以及讨论和通过长期经济建设计划。

根据今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后举行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讨论决定，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已开始实行。今年是1980年，中国的农历叫庚申年（猴年），我认为这个改革可以称作“八〇改革”或“庚申改革”。我想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很可能要高度评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一年开始实行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就是庚申改革。庚申改革的纲领，就是邓小平同志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现在这个讲话中央已通知在全国非党职工中传达了。华国锋同志9月7日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对于这个提纲也作了重要的说明。

关于所谓庚申改革，就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是什么？我想稍微多说几句话。庚申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化。用这一句话就可以把它说完。邓小平同志8月18日的讲话，已经指明了这个改革的正确方向。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一个是党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修改宪法，以便确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民主的制度呢？要在新宪法中体现出来。胡耀邦同志在9月间举行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宪法要大改”。我们的宪法只有1954年通过的第一个宪法好一点，以后，在“九大”以后、“十大”以后、“十一大”以后都修改过，按照耀邦同志的话来说是越改越不好了。我认为耀邦同志这个评价很对。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已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成立了修改宪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原则，小平同志在8月18日讲话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鲜明、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各民族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进行改善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这是小平同志讲的一段话。

这里我想说说如何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尽一切的努力使各级人民代表会及其常设机构，迅速地健全起来，使它们成为有权威的人民代表的权力机关，这是我们的目的。在保证必要的中央集权的同时，要实行恰当的地方分权，使地方人民代表会有更多的权力处理地方性问题。尤其要采取有效的步骤，切实加强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自治权利和加强民族的团结。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现在民族矛盾是比较尖锐的，特别是在西藏和新疆。我们要正确地贯彻我们的民族自治政策，来解决这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说，可以这样设想：现在全国人民代表有三千四、五百人，开会只有北京这么大的会场才能坐得下，开起会来是非常困难的，要在大会上发言呀，除非是宣读宣言，实际上是不能进行讨论的，于是只得进行小组讨论。所以这么多人的代表大会呀，要举行或要多举行，或者是要举行得长一点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可以考虑把人数缩小，也不能缩得太小，比如说缩小到一千人。从三千四、五百人缩小到一千人。这样缩小便于扩大民主，人数虽

少了，民主却扩大了。这样人数还是太多。另外还可以考虑把人民代表大会分成两个院，象很多国家分成上下院一样。苏联也分成了民族院和联盟院，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叫区域院，代表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代表地方的；一个叫社会院，代表各个阶层和各个职业的利益。区域院人数可以少一点，三百人，这是区域院或第一院。第二院即社会院，人数多一点，比方说七百人。这两个院共同行使创制和立法的权力，同时监督政府工作，共同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的人代会和它的两个院，互相制约，就是不能够一个机构说了算，这个机构如果作了错误的决定，另一个机构还可以纠正。这也便于一方面照顾各个区域各个地方包括各个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便于处理各部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各个职业、各个阶层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两个院共同的职责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便于及时地制定国家的预算和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及时总结执行计划和预算的状况和经验，恐怕今后会议要多一点，比方说一年开两次。会议应比现在长一点，现在开会一次个把星期、十天左右，实际上就是举手通过我们党政机关预先制定的一些法律。这样人家说我们人代会是“橡皮图章”，恐怕也差不多。苏联的苏维埃也是这样，党的机构把完全准备好的文件，到时候大家举手通过。当然光是开两次会还不够，还应加强它的常设机构，两个院都要有常设机构，而且应该精干，应该是强有力的。那么人数就要缩小。现在两三百人的常委会，也是不便于开会的，因此人数可以缩小到五十到七十个人，这样常委会就便于召集。现在的成员呀，大都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走路也走不动，两个人扶住，甚至会也不能参加。我们将来的常委会应当都是年富力强，能够坚持八小时工作的，他们应该是有经验、有一定水平，而且是年富力强的，并且是专职的，只做这个事，别的事都不做。部长不能兼任人大常委会的职务。常委会应是精干的，整年在那里干这样的工作，除了下去调查，就是开会研究问题，那么他从事这个国家的立法工作，各方面的方案，拿古今中外的作法加以比较，来保证实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正象资产阶级的议会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我们是保证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两个院都要设各种专门委员会，比如经济、财政、劳动等等。专门委员会应该聘请有关学者、专家作顾问，组成各种智囊团，这样就能够把全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及时地集中起来，那样我国的国家权力机构就能成为有权威的有效的人民代表的权力机关。它就作这个工作，经常的立法工作，监督政府的工作。

就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说，我们党必须同全国人民一起使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逐步完善起来，并且一定要通过百折不挠的斗争，使它们成为不可破坏的力量，形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而且形成以后，不许任何人加以损害。我们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可以说这样的法制原则有三条：

第一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和权力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不允许任何人有逃避法律义务和法律处分的护符。

第二条就是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的公民权力要受到法律的保护。非法侵犯者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这个好呀，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随时都可以把你抓起来，随时都可以抄家，可以刑讯逼供，今后不能这样了。非法侵犯者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随便抄家抓人，我们公安机关就把他抓起来，从法律上追究他的责任。

第三条法制原则，就是司法人员审判时，只尊重事实，只尊重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司法人员的独立工作。一句话是司法独立，党委也不能干涉，法院作出判决无需送党委审查。党委没有这权力，党委只管政治领导，不管判决，不能干预司法的工作，这样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

所有这些法制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成为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家喻户晓，人人遵循的常识和准则，要到处通行无阻。

第二，就是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实行党政分工。党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舆论机关等等的关系，也是实行党政分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都是用来实行个人专断、个人独裁的庇护所，都是破坏国家政治生活中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怎么改革这种弊病？拿党政分工来说，邓小平同志八月十八日的讲话指出了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这就是说，今后政府的工作，都由政府独立负责地去办，而不是由党委或党委书记越俎代庖。党委应当管党委自己的事，制定和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党的纪律工作。党也要从政治上领导政府工作，通过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是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党尤其是不应当干预政府工作的日常事务。只有这样，才能既加强政府工作，又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否则，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结果，这就只会既削弱政府工作，因为政府失去了独立负责工作的可能性，又削弱党的领导，因为那样党就陷入政府工作的事务中，不可避免要犯官僚主义、事务主义，从而削弱党的政治领导，削弱党委本身的组织、宣传工作。不是讲党不管党吗？因为党去管了政府的事，不可能把党管好，这就是不务正业。同样地，党应该保证各种财政经济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群众团体和舆论机关，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领导下，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正确，势必就不能领导，独立负责地和有效率地、互相协调地进行工作，并且为他们代表的群众的利益而竭尽全力。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发生一些意见分歧是正常的，党和国家应当防止他们变成对抗，应当指导他们按照民主的方式求得合理的解决。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才是生动活泼的，而又尽量不发生分裂和混乱。

我们现在有工、青、妇、科、文的群众团体。工是工会，青是青年团，妇是妇联，科是科协，文是文联。过去也存在党包办代替群众团体事务的现象，因此使得群众团体成了党化的、官办的而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的所谓的群众团体，也不能起党联系群众，并且通过他们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比如工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却不让工人去选举，而由党组织随便委派和调动，这样它就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仍然一定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他说：当着某一部分工人的利益同管理国营企业的经济人员，同国家机关发生冲突的时候，工会要通过同企业行政，国家机关进行协商或者谈判、或说服工人的方法来使冲突获得迅速完满的解决。一方面使工会所代表的工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

同时要无损于其他人民和国家以及整个经济建设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特别是要进行关于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以及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教育。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当着担任工会领导工作的李立三同志和赖若愚同志要这样做的时候，要维护工人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专横无理地被判定为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帽子都来了。李立三同志是在1951年受到这样不公正的批判的，赖若愚同志是在1958年受到了同样的这样四项帽子的批判（李立三还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赖若愚呢，加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他们受到相当专横无理的指责。这样只能使党和工会都丧失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使党和工会都脱离工人群众。这种左倾错误作法的本身就孕育着波兰危险。同志们都知道波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如不改弦更张，我们也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因此我们的工会和群众团体一定要实行民主改革，让工人群众来自由地、民主地选举自己工会的领导人 和 领导机关，从而建立工人群众自己的工会。他们一定要作为工人群众自己的忠实代言人，来独立地做好社会主义工会的工作。工、青、妇、科、文的群众团体都要做好社会主义群众团体的工作。党应该从政治上来领导群众团体，就是通过群众团体工作的党员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不能干预他们的日常事务，也不能随便任免群众团体的领导人。

现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建立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团体，就是还没有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的农会。现在有的外国朋友就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建立农会？我认为这个意见很有道理。因为如果不建立农会的话，就不利于维护农民的利益，不利于加强工农联盟。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分为区域院和社会院两个院，而社会院是由各阶层各职业的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的。我看建立独立的农会——中华全国农民联合会或者是中华全国总农会，以及各级地方农会恐怕是势在必行。过去有的人说不要农会了，因为全国人代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都是代表农民的。其实，人民代表大会不是代表农民的，它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农民还是应该有他的独立的团体才对，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长期那样低，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有时还扩大了，农民的利益不能维护，种稻米现在还不能收回成本，所有这些现象如果有了农会就可以避免了。

是不是让各单位各团体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下，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并且建立全国和地方各级的农会，就会制造和扩大人民内部矛盾呢？我认为不会是这样的。恰恰相反，这是真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切实的步骤。

还有，就是党组织和各个舆论机关的关系，也是这样。党现已决定实行在原则上把一切情况告诉人民的方针，象万里同志在人大发言中所讲的，我们决定把一切情况告诉人民，包括财政赤字，去年财政赤字170多亿都公布了，不对人民保密了。我认为，为了使舆论机关能迅速有效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及时地把一切重要情况除了少量的关系国防外交的机密以外，都告诉人民，以及为了及时地反映人民对党和国家机关的批评建议，应该允许、要求和鼓励舆论机关和新闻记者、评论工作者独立负责地报道新闻、发表群众来信和发表评论。我认为这种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下的广泛的新闻自由和言论、出

版自由,对党和国家的民主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成为促进党和国家民主化的一把钥匙,一个关键性的步骤。当然,舆论机关、新闻和评论工作者自己必须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他们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他们应当受到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的追究。

第三,就是改革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制度。小平同志8月18日的讲话中指出,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也考虑同样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改革呢?因为过去实行的那种企业、事业的领导制度,名为党委领导,实际只是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而且这些党委书记大部分对于所领导的企业、事业,差不多都是外行,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和党委书记不可避免地要违背党的领导应当是政治领导的原则,而陷入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企业、事业的事务中间,这样既削弱了甚至放弃了党的政治领导的责任,又削弱和妨碍了企、事业本身的行政领导和管理。而且这种实际上是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所谓党委领导制度,又是同企、事业的管理民主化直接矛盾的。应该是群众管理,不是由党来管理。人民是企业的主人。如果党来管,是上头委派的,那么群众就会把这个工厂当成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这样作也是妨碍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不民主的制度,很不利于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也非常不利于企、事业管理的民主化。反过来说,在企、事业实行党政分工的原则,就能使企、事业行政管理人员独立负责地作好企、事业的管理工作,同时使企、事业的党委摆脱本来不应当由他们管的日常事务,集中力量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而作好这些工作,本来就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他们的正业。当然这个改革事关重大,在新的制度条例制定出来以前,仍然按原来制度执行,不要搞乱。不过就是按原来制度执行,也一定要克服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毛病。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走群众路线。

第四,就是实现企、事业单位管理的民主化和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的直接的民主。在经济改革中一定要把企业的自主权的扩大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结合起来。这里讲的企业包括农村的社队在内,只有把企业的自主权的扩大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结合起来,这样自主权的扩大才不是那种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的扩大,而是群众的民主权利的扩大。小平同志在8月18日的讲话中说:在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这个话是因为职工代表大会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试行过了,后来就中断了,现在是要推广和完善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不称职的领导人员,并且可以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领导人。显然,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将要选举产生民主管理本企业、事业的事务的工作的领导机关,就是由企业事业的行政领导人参加在内的企业事业管理委员会,从而使职工群众真正成为各个企业事业的主人。

关于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新的宪法将规定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基层的政权和基层的社会生活中,要充分实现各个居住地区的直接民主,使得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实际上参与讨论和决定同他们的生活和利益直接有关的种种公共事务。这就是直接民主。企业

事业管理的民主化和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是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坚实的基础。采取这个重大的措施,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党是完全信任人民和依靠人民的,我们党是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的。一切西方国家和一切名为“现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都不敢实行的。这一条是他们都不敢实行的,苏联现在知道他那个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自称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他们是不敢实行群众管理企业和直接民主这一条的。他们害怕得很,从来不讲。但是我们就敢于这样做,而且一定要这样做。

以上就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几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这样来做,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讲的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轮廓是怎么样的。

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小平同志在八月十八日的讲话中,除了提出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总原则以外,还提出了以下两项具体的改革:

第一个,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改革。新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不再是选举产生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一个中央委员会,而是选举三个平行的、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委员会,就是三个都是中央的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在八月十八日的讲话中说,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也许不叫这个名称了,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国务院也要考虑设立相应的机构。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行年轻化。

我认为,采取这个措施,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样做有利于克服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这样做本身就是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实行适当的分权,使三个中央机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以便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共同正确地行使党的最高领导权。我们看,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分成两个院,国务院也准备设立监督顾问的机构,或者叫做咨询委员会,或者叫做顾问委员会。国家司法机关原来就分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他们也是互相制约的。这些都是同样的,是适当的分权,互相制约,以防止滥用权力的正确措施,防止任何一个机关滥用权力的正确措施。民主就是多样化的协调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多样化的协调统一的机构,将形成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防止社会主义发生变质、发生对抗和意外事件的“自动调节系统”。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自动调节系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自动调节系统”,和防止、纠正错误的“自动调节系统”。反过来说,党和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实际上只能是机械的形式上的统一,和压制人民的多样性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形式上是统一,非常集中而实际上是个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实际上这也是软弱无力的。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根本对立的,是格格不入的,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

有些同志认为,这三个中央机构应当根据他们的不同职能,分别的给它另外取一个名字,比方说原来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改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用过的名字,它的职责就是执行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以叫

执行,是个执行机关,相当于政府系统的国务院,是个执行委员会。第二个委员会,原来邓小平同志说是否叫顾问委员会,当然也可以改别的名字。我们建议称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因为它的职责主要是建议、监察、检查、督促,起这么个作用,是个监督机构,监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是由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经验丰富的还能够工作但是身体已经比较弱的老同志组成的,他们每一个人好比说都有一个龙头拐杖,像佘太君那样,一百岁了,组成为中央监察机构。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有错误,他敲他那个龙头拐杖,说不行不行,这个是错的,这个要纠正,让他起这个作用,让他敲警钟,纠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要设立一个常委会,可以不再设政治局了。政治局,过去列宁设立的时候是跟组织局对称的,所以有个政治局这个名称。后来组织局都没有了,怎么还叫政治局,这是不通的,叫常委会就行了。常委会里头也不需要再设什么小常委会了,由中执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一个常委会,还有一个中央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与此相应,中监会也选举产生他自己的常委会,这个常委会他的权力也相当于中执会常委会,还设立他自己的秘书处,由比较年富力强的老同志担任经常的工作。第三个机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职责就是搞好党纪,整顿好党风,监督和检查纠正那种违反纪律的现象,它的任务是很明确的。这三个机构共同都是对全国党代表大会负责。它们如果发生了争论怎么办呢?他们意见不一致,可以开联席会议,如果开联席会议又解决不了,就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因为全国党代表大会是常任制,随时都可以召集,由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权威机关来作出决定。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党的领导,政治领导不会犯大的错误。有重大问题还可以提交全党来讨论。

在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就是在于这样可以使一些年老的经验丰富的同志能更好地发挥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就是发挥他的长处,又不至于过于劳累。年老体弱了,这是他的短处,再要他整天在办公室坚持八小时工作,那就不行了。因此设立中监会可以扬长避短,可以起这个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班子更精干,更有效率,并且逐步实行年轻化,避免使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班子老化和降低效率。现在越来越老,老得不得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还在那儿主持工作,这是不行的。

第二个,是各级党委以及各个领导机关真正实行民主原则,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所谓真正实行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主要的关键就是要实行表决制,民主的表决制,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制。邓小平同志说,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的时候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力,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就要分工去办,各负其责,绝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

为了实现党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党中央已经决定,对党的五中全会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要作进一步的修改。新的党章除了要反映以上所讲的两项改革以外,还要确立以下的重要原则:

(一)必须明确规定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共产党来

领导，领导应当有一定的权威，为此就要求领导的正确。任何领导总难免会犯一些错误，但是为了减少错误，并且为了防止错误严重化，应当使任何权威都有一定的界限，不能是绝对的权威。党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这不意味着党的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不能那样，而只要是这种约束是恰当的，它就能既不妨碍党的正确有效的领导，又能够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加以节制。首先，从党中央到党的基层组织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自己和人民一起制订的宪法和法律，要在宪法和法律的限度内进行活动。否则，一定的国家机关和人民就有权予以抵制。任何党的组织和任何党的领导人如果违反了法律，就有权抵制他，反对他。这是一个原则，他们的权力不应该是无限的，它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它应该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违犯，人民有权反对。

（二）必须加强党和其他党派和非党群众的互相团结、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继续贯彻执行。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应当同党员一样，有职有权有责，党应当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工作条件。我们党要继续主动地邀请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重大问题，邀请他们列席党的一定的会议，由党的组织和他们共同商量解决国家生活中的问题，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三）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包括坚决贯彻党中央已经决定的防止任何领导者个人的权力过于集中，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少宣传个人等项原则。还要规定党的上下级之间的正确关系，下级只是在工作上服从上级，在其他方面，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没有什么上级的党员和下级的党员，他们应该是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不允许任何人享有党章、国法和各项制度规定以外的特权，等等。如果有些制度规定不合理，制度本身还要加以修改。此外，党的上级组织要监督下级，下级也要监督上级，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广大党员和下级组织有权对上级组织和任何一级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我们要在党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方面继续努力，采取加强监督的措施来防止各级党组织发生违反党纲党章的情况，一旦发生，能够比较及时地得到发现和纠正。

以上我们讲了庚申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人担心这个改革是不是会流产，或者是怀疑它能否得到成功。有的人甚至把庚申改革拿来同1898年的“戊戌维新”相类比。他们说，现在守旧的力量太大，阻力太大了，如果改革的步子太快了的话，有可能要象“戊戌维新”那样，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杀害，维新事业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这是对我们这个改革的前途不抱乐观，我认为这种类比是不正确的。发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依靠的是当时并不掌握实权，而是被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所掌握的可怜的年轻皇帝光绪，因此，掌握清朝廷的全部实力的守旧顽固派就能够轻而易举的把维新事业淹没在血泊中。难道1980年的情况同1898年相同，或者说类似吗？

实行改革的阻力是有的，今后还会有。马克思早在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里头，就预见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复兴事业，“将因为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而被阻挠、被延缓”，所以这个改造和建设事业一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可以想得到嘛。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也仍然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

抗,确实是这样。代表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就是汪东兴一类的人物,他们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出来工作,阻挠出版《周恩来选集》,阻挠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他们坚持“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的左倾错误路线,继续推行现代迷信,大肆神化已经去世的和还活着的领导人,大肆宣扬个人交班、个人接班的错误作法,提出“两个凡是”,不允许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的指示、错误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做出的两个决定,就是直接违反毛泽东同志关于要火化,不要出全集的遗愿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写过关于火葬的建议,就是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写的建议。这个建议最后两句话是这样讲的:“后死者一定要保证执行,实现先死者的志愿。”就是要火化,不许违反。在这个建议上毛泽东同志是头一个签名的,而且这个建议是他写的。为什么要违反这个?你既然要“凡是”,为什么要违反这个呢?还有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不要出全集,说他写的东西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为什么要出全集呢?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但是恰恰作出了要出全集的决定。所以我们看,所谓“两个凡是”,他们自己是最不“凡是”的。他们所谓的“两个凡是”,不过是欺人之谈。他们为了镇压广大群众在丙辰清明运动中就开始表现出来的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潮流,竟然把群众的改革要求,作为反革命的谣言来追查。1977年的5号文件不就是这样东西么?特别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就是史云峰等革命志士没有死在“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而死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使他们永抱终天之恨。是谁做这样的事呢?同时,不是偶然的,这个时期又一次出现了大冒进的企图和尝试,搞了一个所谓洋冒进,1978年搞了个洋冒进。这都是讲的阻力,我们碰到的阻力。但是结果怎么样呢?邓小平、陈云同志还不是先后出来工作了吗?天安门事件还不是平反了吗?《周恩来选集》上卷(民主革命时期著作的选集)还不是很快就要出版了吗?(年底以前大概可以出版)自以为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声势赫赫的汪东兴,以及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还不是下台了吗?事实证明,站在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方面、“两个凡是”方面反对改革的那些人和当年的慈禧太后很不同,因为他们违背全党、全军、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是非常孤立的。同他们相反,现在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的人们,因为他们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是为着人民和依靠人民的,他们的事业决不会失败,不会流产,一定会逐步取得完全的胜利的。

庚申改革之所以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因为它是彻底的、是能说服人的。马克思在他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里说过这么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当然要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要能够说服人,它就必须是彻底的,它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九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不是孤立的,乃是社会的人,这就是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庚申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是来自人民,为着人民,依靠人民的,因此它是能够克服重重的阻力而取得成功的。

上面我们讲了今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

什么内容，有什么意义，这些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党中央在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现在主要抓三件事：一个是抓经济建设，一个是抓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一个是抓选拔大批坚决拥护党的路线、具有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和年富力强的干部。邓小平同志在8月18日讲话中说，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为了实现以上两个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小平同志说，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这个目的。

实践已经证明，今后还将进一步证明，党中央抓这三个关键问题是完全正确的。粉碎“四人帮”四年以来的形势发展，使我们能够确信，我们党中央所选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正在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攀登从来没有人到达过的新高峰。我们将要用实践、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我们近十亿的中国人将对人类作出应有的新的贡献。

同志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党中央所选择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奋勇前进！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马齐彬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毛泽东思想问题，是当前我们党必须阐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作科学的阐述，现在决议还在讨论修改之中，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大家作参考。决议出来以后，以决议为准，我讲错了就修改过来。因为我们第一个专题发言，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今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宣传工作任务第一条，就是大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文件中说：对于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坚持，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应当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些问题，现在是全党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明确解答的问题。

必须解决两种错误倾向问题

十几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问题被搞得很混乱。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就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完全错误的。持这种错误态度的同志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逾越的真理，都要句句照办。他们实际上，不是真正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而是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坚持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的错误原则和结论。如果按照这种错误态度去办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走上歧途，我们党和国家就可能重新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所以，用“两个凡是”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是完全错误的，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这是一种错误倾向。还有另一种错误倾向，就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怀疑或者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持这种错误态度的人认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以为现在毛泽东思想不灵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有的人甚至还想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就是废弃了我们党

一贯坚持的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这样，我们党就会失去正确的行动指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就会由于失去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所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说，有一些同志想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种看法是不妥的。为了搞清楚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批判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我们大家在这次会议上来共同研究毛泽东思想，共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下面我就讲这个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題

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它的萌芽时期，有它的形成时期，有它的发展到成熟时期。这个过程，如果从1919年算起，那么已经有六十一年历史了。如果从党成立起，到明年就是六十年。六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为六个阶段来考虑：党的初创阶段到1927年，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大革命失败以后到党的遵义会议，就是1935年1月，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时期；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完整形成时期，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极大丰富时期；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到党的“八大”，即1956年，是毛泽东思想光辉发展的时期，达到一个高峰；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变化的一个曲折过程，走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后，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时期。六十年大体上分为这么几个阶段来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如果能够把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搞清楚，那么，就有可能深刻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来的、怎样发生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必然现象。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在中国革命长期、艰难、曲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逐步成熟的。但它形成以后，又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不断发展的。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比较系统地认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比较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比较完整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同时，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正确的分清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以及他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所以，我们首先就要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下面我就分六段来阐明这个形成、发展情况。

第一个阶段，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从1921年到1927年大约六年时间。在这一段，我们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在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思想只是处在一个萌芽状态。为什么？因为党在幼年时期，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或者弱点。可以说幼年党有三个不足，也就是说有三个弱点：

（一）理论准备不足，对马列主义了解不多。我们党自成立开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党，我们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后来又是在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的。所以，我们党没有欧洲第二国际那种影响，这是我们建立的一个特出优点。但是，从1921年党成立，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只有二、三年时间。开始传播是1918年，十月革命以后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两三年时间，党成立了。那个时候，翻译过来的马列著作，例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等，也不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由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观》一文中作了简要介绍，但学习研究也不够。我们党在成立之后，同志们就立即投入了革命的环境中，虽然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指导形势进行斗争，但是局限性很大。我讲这一条，就是说，我们党马列主义的理论准备，跟俄国党不同，跟列宁不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之前，将近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说，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较充分。我们党不行，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两三年时间，接着就投入了革命的实际斗争，投入了大革命，进行北伐战争，因而理论准备不足，这是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的一个弱点。这是第一条。

（二）幼年的党缺乏经验，经验不足，这是很自然的。党刚刚成立才六年，一建立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中，对于中国社会的调查，对于各种斗争的经验都很少很少，例如讲如何领导阶级斗争？怎样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国社会有些什么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是怎么样？党都在开始摸索，党认识的很少很少，也没有经验。1923年二·七惨案就是一例。同志们，现在来研究二·七惨案，同我们党缺乏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党对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的运用，还缺乏经验。如果没有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中国革命规律的了解，革命实践经验的综合，是不可能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这是第二条。

（三）幼年时期的党，运用马列主义的自觉性不足。当时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革命热情很高，精神可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总的方向是对的，开始朝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但是，怎么样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当时还缺乏这种自觉性，所以，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政策一般地说是照抄共产国际的，按列宁、斯大林指示办的。例如，关于国共合作，是按照共产国际决议办的；关于北伐战争的计划制定，也不是我们党制定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等重大问题，当时还是听共产国际的。由于我们党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经常对我们党发号施令，当时我们党对这个发号施令，不管是错误的还是对的，也不善于辨别，错误的东西也没有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也有一定的责任。当然，主要的是陈独秀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这种情况说明，这个时期，还不可能形成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在党的幼年时期，党刚刚成立才六年，还不可能形成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了。如同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的多，丰富的多了。这一段话是《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文章里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那么，这一个时期，这个结合就开始了。从哪几个方面说明它是萌芽呢？我想，党成立以后，立即投

入到领导革命群众这个斗争当中，碰到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实际问题，积累了一些斗争的经验，在这里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来考虑问题了。例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接着开展统一战线活动，统一战线建立后，就是深入到农民当中去。同志们，这一些实践活动，给我们党取得了经验，构成了党的初期一批文件和著作，这一些文件和著作，体现了我们党开始朝着这个结合的方向前进。具体来说，这个萌芽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概括说明：第一，我们党正确的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决定。这些文件，初步地运用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开始进行分析，我是讲开始啊！党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纲领，这是正确的，它表明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开始。第二，我们党对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情况，开始了独立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这也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一个表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革命议决案。“四大”的这个议决案，提出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是我们党一大进步。在“四大”的前后，毛泽东、蔡和森、邓仲夏、恽代英、瞿秋白、李大钊、周恩来、彭湃等同志，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评了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各阶级分析的错误观点，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作出了独立的探讨和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比较完善的，具有代表性的。所以，这个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表明了我们党掌握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第三，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我们党对于工农运动的发动，特别是对于发展农民运动的研究，有了我们自己的特色。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这一个特色，表现在李大钊到毛泽东、瞿秋白等等同志的文章中。说明了我们党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和考察，开始探索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段对于农民运动的调查、研究和农民斗争的经验，为我们党后来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提供了基础，开始创造了基础。第四，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对于武装斗争开始注意了，但是对重要性认识不足。把这一个过程综合起来说，我们党在这一个时期对于各种斗争的领导，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各阶级的考察，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地探索了我们自己革命理论和路线政策。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时期，我们党在领导各个革命运动上面，考察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取得了各种斗争的实际经验，初步的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索制定我们党理论、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杰出领导者一起，在这个时期，是比较注意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都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指出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是这个萌芽的比较集中的表现。同志们，党的幼年我把它归纳了一下，大概就是这个状况。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党开了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决议，也发表了宣言，从1922年起，党中央创办了机关刊物《响导》，所有这些决议和重要文章，在列宁、斯大林一些论文启示下，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对于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萌芽是很重要的。在大革命的后期，我们党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作了斗争，这也是萌芽的一个表现。从1921年党成立到1926年12月前，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1927年的春天，

特别是1927年的上半年四·一二前后，党犯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党是犯了这个错误，但是在我们党内是有斗争的。代表我们党进行这个斗争的有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陈延年等同志。陈延年就是陈独秀的大儿子，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党内对陈独秀的错误是有抵制和斗争的，这也表明了我们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总之，从上述情况看，我们党开始用马列主义来观察我们党的路线政策问题，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状态。虽然是萌芽时期，但是从这整个六年来讲，我们还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这个基本状况没有改变，重大问题都是经过共产国际，党还不能够真正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阶段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基本状况。

第二个阶段，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时期。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时期是从1927年8月到1935年1月，即从大革命失败到党的遵义会议，这期间大约是八年。这八个年头，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时期。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党在这个八年当中，党所处的环境是极端艰难困苦时期，按照陈毅同志的说法，叫做“创业艰难百战多”。恰恰在这样最困难时期，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在这八年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大大地推向前进了。这个八年，所以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大大地推向前进，是因为具备了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党经过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锻炼，经过了成功和失败，取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同志们，没有这种经验，毛泽东思想不可能形成。大革命的失败，教训了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势力集中的城市里，我们与强大敌人的作战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党开始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组织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经过大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没有反正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党还难以找到这样一条革命的道路，还难以提高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觉悟。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大革命失败后，从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开始，我们党相当一大批中坚骨干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开始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党的“八·七”会议，它的历史功绩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最高的最概括的科学总结。“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战争。这就表明了我们党在失败面前，高举革命旗帜这样一个品质，英勇战斗这样一个品质。在“八·七”会议号召下，我们党开始在农村搞暴动，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接着又和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同志领导人民创建的中央苏区；湘鄂西根据地有段德昌、贺敬斋、卢东生、贺龙、周逸群等同志；鄂豫皖根据地早期创始人吴光浩、戴克明、潘忠汝。后有郭述申、许继慎。30年初有徐向前、曾中生。那天我们到金寨县访问去，据讲还有两个人，现在搞不清楚，以后再补上。创建闽、浙、赣根据地是方志敏、邵世平等；开辟闽西苏区的是罗明、郭滴人、张鼎丞、邓子恢等；开辟陕甘根据地的有刘志丹、谢子长、

唐澍等；开辟左右江根据地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于作义等；开辟琼崖根据地的是冯白驹等等。正是由于这样一大批领导同志，响应“八·七”会议的号召，到农村开展斗争，使我们党进入十年内战的新时期，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这样一大批领导同志和全党的努力，同志们，就没有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所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是根据这些经验，总结了这些经验，创造了红色政权的理论。这是第二条。这是个进步。没有这个条件，也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第三个条件，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在这个八年当中，也就是从这开始，一直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把苏联共产党作为国际的领导中心，来指挥别国共产党。同志们，这一个斗争是非常严重的，不经过这个斗争，不可能形成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在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倾向斗争中形成的，同时，又在这种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条件，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志们知道，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对于世界革命，特别是我国的革命起了伟大的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是有它正确的指示，不是完全都错了，特别是在初期，我们成立以后的幼年时期。但是，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产生了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错误，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在当时，实际上就使各国共产党从属于苏联共产党，这种用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各国革命运动的错误作法，完全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它不可避免的要给各国革命运动造成损失和失败。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大失败，例如反五次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从主观条件来说，就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国际路线所造成的恶果。这就是说，当时，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他们自己不去了解中国社会情况，不去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盲目的相信和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意见，并且利用这些意见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吓唬无实际经验和缺少理论知识的工农干部，这就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王明是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上台的，在当时这种困难下，毛泽东同志以巨大的政治毅力和理论勇气，同上述种种错误倾向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直到遵义会议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斗争，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思想。我讲几件事情，我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共产国际则要我们搞城市暴动，要我们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这种斗争就不可避免的。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创造性的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在斗争中解决了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独立自主的解决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这是对于马列主义最大的贡献。我们回想一下，马列主义发展史，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城市为中心领导工人运动，以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许多论述，但没有一句讲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这一著作中提到了，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566页）。这一个论断，它不是阐明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而是阐明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农民问题。列宁、斯大林领导俄国革命也是以城市为中心，先取城市，后占乡村。俄国革命的经验，既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

论，也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我们党成立以后，就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搞工人运动。同志们，这是照抄列宁党的做法，是照抄马、恩理论的。但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斗争，我们党就觉悟到在中国的条件下，老路走不通了。只有独立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正深入到农民里面去，紧紧依靠农民，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解决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所以，我们党上山下乡闹革命，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这是马列主义宝库中崭新的东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上山下乡闹革命，我们党带了个头，而且闹成功了，这条道路是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这条新道路产生，表明了我们党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胜利，也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当然不是唯一标志。这是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在这八年当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在这八年当中，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同王明的教条主义作斗争。首先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战胜了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就不可能有红色政权的理论和红色政权的创造。在这一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形成了我们党领导农民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领导人民大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一条政治路线，同时也形成了一条服务于这条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这个三条路线的形成，标志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这个八年，艰苦奋斗，我们党有许多新的创造。我可以给同志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新创造。乡村闹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个大的新创造。不要讲别的，就讲这个土地革命，哪一个国家搞过？我们在马克思著作中看到哪一篇文章讲到土地革命的路线？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是讲了农民的三种状况，贫农、中农、富农。马恩的《法德农民问题》讲了农民的三种状况，讲德国的地主、富农。但是，象土地革命路线，领导农民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把土地分配给农民，马克思主义里没有，是我们党的创造。就象“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八个字你在马列著作里哪里去找？党的建设、红色政权的建设、军队的建设，都有许许多多的创造，这是前无古人的。在这里，我特别讲一讲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本书，是这时期斗争在哲学上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这本书首先提出两条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强调“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和本本主义的保守路线之争，是两条思想路线之争。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真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了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所以，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这八个大字。同志们，我在这里讲这个问题，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同志的晚年恰恰违反了这一个，他犯错误恰恰是违背了这个。这本书第一次提出理论和实际结合这个著名的论断。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个话，就是教导我们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这些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共产国际斯大林斗争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所以，《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是我们党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一个代表作。它的现实意义也是很大

的。从我最近到一些地方接触的情况，越来越感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重要。没有调查就发言，那就是瞎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新论断。现在我们认识和论述这个论断的重要性，还需要做一番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八年当中的调查研究，那就是全党的模范。现在我们党需要提倡这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调查，不要瞎说。

在这八年当中，我们党在这条正确思想指引下，创造性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下面就这些重大问题，我作了一个综合：

第一条，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和中国革命特点，我们党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根据这个认识和分析，正确地制定战略和策略。在这里，希望大家看“六大”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决议案》、《反对本本主义》等等，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解决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刚才讲过了，在这里就不重复。

第三条，建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解决党和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在建党建军问题上，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有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就是在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中来进行建党建军。在建党建军的中心环节上，是思想建设问题。思想建党思想建军，这是我们建党建军中心环节。同时，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建设，构成建党建军的一个纲领。在解决建党建军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邓小平、叶剑英等等同志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是杰出代表。同时，在军事理论上的建树，我们有新的创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是对马列主义军事学说的新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学说、军事学说，或者叫军事科学包括它的用语，在马列主义著作词句里也很难找到。它确实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剖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而创造出来的人民战争的体系和战略战术。

第四条，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

这个八年当中，这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的解决，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比大革命时期大大的前进了。三条路线的形成，特别是革命道路问题，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了。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了，但是，它还没有完整地形成。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丰富的、比较完整的比较成熟的科学理论，它的思想形成，小平同志说是在延安时期。

第三个阶段，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大约是十年，从1935年到1945年十年时间，这个十年是我们党由失败、挫折转变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时期。简单地说，这个十年，是毛泽东思想大发展的十年。是从各方面得到展开而且达到成熟的十年。在这个十年间，我们的党由三、四万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的大党，我们的军队由三、四万人发展到九十多万野战军，二百二十万民兵；革命根据地，由陕北那么一小块，发展到华北、华东、华南，包括九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这个时期，我们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长征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到达陕北。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关系，

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抗日统一战线斗争的策略。这个时期，我们党独立自主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我们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完整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即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理论原理。在这个十年中，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极大的丰富发展时期，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这就是说，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更加成熟起来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更加丰富了，比较完整了。今年三月份邓小平同志说：延安这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阶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的内容，我们党的“七大”作了概括和说明。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论党》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

- 一、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
-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 三、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 and 政策；
- 四、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 五、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
- 六、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政策；
- 七、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
- 八、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 九、关于文化的理论和政策。

对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的内容概括为这九个方面，这是我们党二十四年来奋斗的经验总结，是从中国人民集体奋斗中做出来的总结，由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为什么只有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能够比较完整地形成呢？这里具备了三个条件：

第一，从党的成立到1945年，我们党已经经历了二十四年的斗争历史。已经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党经过成功、失败、再成功、再失败，走向胜利的时期。经过了这么多次的反复，各个方面的经验都丰富了，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因而，就形成了完整地、系统地我们党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我想给同志们说一下，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也是两起两落叫两个马鞍形。今天，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水平比过去是更高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政策，不但恢复了过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革命不花出代价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抗日时期，党已经立住了脚，有了家，安好了家。党中央在延安比较稳定了，敌后根据地也有很大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也大大地前进了。在延安时期，全党都在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翻译出

版了马列主义著作也多起来了，包括《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都翻译出来了。马列的各种著作大量的翻印，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特别是全党的整风学习，这是一次全党的伟大的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我们党的马列水平普遍提高了。许多老同志回忆说，在延安时期，读了马列的书，跟内战时期不一样，内战时期看报纸都困难。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为了找报纸看，还要托外面人到井冈山里面来，带那么几张报纸，如获至宝。在瑞金的时候，马列主义的书有一些，但不多，接着就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只有到了延安时期，才给了我们研究马列理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党的决议和文献，是大量的出版，现在选编《毛泽东选集》就有两卷，两卷还加第一卷的后面的三分之一。我在中央党校看到抗日时期中央文件汇编是十本。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在抗日时期的著作，也相当多。如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论党的纪律》、《人为什么会犯错误》，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的战场》等等。这个时期，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党经过了二十四年的斗争实践，跟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又跟左倾机会主义斗争，党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我们党在克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之后，又连续跟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特别是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尔后，我们党又战胜了张国焘的路线和克服了第二次王明路线。在这些斗争中，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國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就能够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比较完整地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所以，这个期间毛泽东思想能够比较完整地形成，有这么三个条件。

第四个阶段，毛泽东思想光辉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从1946年到1956年，也是十年的时间。这个十年，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假如说，前二十四年，是准备胜利的话，那么，这一个十年，就是实现胜利的时期，而且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四年的时间，打倒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又经过六年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并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的连续不断地取得这么多的伟大胜利，同志们，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三年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根本转变，也是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巨大转变。我们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进行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志们，这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是在这个十年斗争当中，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得到的胜利。在这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他们在继续遵循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给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所以，这个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光辉发展时期。在这里，我想分以下两段，来阐明它这个光辉发展的内容。

首先，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四年解放战争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

时期。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许多新的内容：

①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的新发展。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四年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大大推向前进了。我们党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且在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并明确地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予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这是《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毛选四卷，1216页）的一段话。这段话，把党在统一战线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思想向前推进了。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中战略策略的新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问题的新发展。

②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大发展。四年的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展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战略进攻是怎样进行的呢？它是突破敌人的防线，打进敌人统治区域的中心地带，而与解放区的反攻相配合，组成的战略进攻。这种战略进攻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一种独创。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时说过：我这本书只写了战略防御，没有写战略进攻，这一章等以后再写。那么什么时候写呢？解放战争时期写了。解放战争时期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战略进攻学说，它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基础的，在这个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构成了毛泽东同志战略进攻学说中心。毛泽东同志十大军事原则，是战略进攻学说的基础，三大战役为其典型，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战略进攻学说。至于我们讲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这就包括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当时的一些在战争中各方面负主要责任的彭德怀、刘伯承同志、陈毅、贺龙同志和邓小平、罗荣桓同志等等，他们在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上贡献也是很大的。四年解放战争，在军事理论上对马列主义的军事学说有了新的贡献。

③正确地制定了革命转变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基础。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光辉文献，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政策的基础。我们党对人民革命战争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及时地决定了把党的工作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并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规定了各个阶级在人民共和国国家中的地位，这就为创建新中国和向社会主义转变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同志指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我们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此外，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重大的补充，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土地革命总路线等等。

其次，在建国以后的六年时间里，包括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思想光辉发展的内容，在这个时期，我想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我们党不失时机的胜利地实现了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起，我们为革命转变问题作了系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胜利的实现了这个转变。我们这个转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十分成功的。实现这个转变基本上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各级人民政权，这是实现革命转变的根本一环。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了革命转变的标志，就是这个道理。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的时候，1949年初，蒋介石又一次提出与我们和平谈判。当时，我们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八条中最根本的两条，一条是军队，一条是政权。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坚持彻底砸烂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因为只有彻底砸烂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才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把马克思主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再一次变成现实。这样我们就把坚持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用人民民主专政不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我们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党正确的解决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立即着手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问题，同时开始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方针，采取了正确的工作步骤，使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能够正确的得到处理。一般的说，革命转变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民主革命基本结束，就是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矛盾就开始了。但是，由于我国当时还有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没有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还约有一百万国民党残余匪军、反革命分子，而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之中。因此，在这个时间，我们一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又着重抓了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所以在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总的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全国大陆，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对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同他们作斗争。但是，又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坚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不是“四面出击，全面紧张”。这样，我们就正确地进行了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所以当时的斗争说明，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已开始了。但是，还不是很突出、很激烈，当时突出表现，还是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这个矛盾比较突出。由于我们党的战略策略思想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能够胜利的实现革命的转变。

第三个问题，党在实现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坚持了以经济恢复为中心来实行各种经济结构的改造。没有这种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结构的改造，我们的革命转变就是不彻底的。旧中国的经济是畸形发展的，长期的战争，工农业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商业投机经营十分严

重。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的改革,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就提出了恢复经济,同时又改造经济结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进城那一天起,就以生产为中心,各项工作都围绕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的政权才能得到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三年,我们的各种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恢复生产、发展生产这个中心运转的。因此,我们的转变是成功的,国家是稳定的,社会是一天天的好起来。我们革命转变,所以取得了这样的胜利,我想主要的就讲这三条。我们党这些胜利都是给马列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

二,正确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实现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新贡献。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党采取了和平赎买的办法,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曾经提出过对资本家赎买的思想,但当时的客观实践还没有这种要求。俄国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列宁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列宁的设想没有实现,是因为资本家不干。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他们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要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于是就爆发了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列宁领导的党,只好采取激烈剥夺的方法,叫做剥夺剥夺者、剥夺剥削者,对资产阶级的大小工厂,一律没收归国有。所以,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的设想也没有变为现实。对剥削阶级的分子怎么办?当时只好把一大批,大约有一百万人地主、富农、资本家用火车运往边疆,叫做扫地出门,赶到苏联边境,包括赶到国外去。例如芬兰、匈牙利和我国的黑龙江一带。在我国叫做白俄,过去叫老毛子。一百多万人,赶到苏联边境或者别的国家,他们天天在那里胡作非为,搞反动广播,骂苏维埃,搞内部暴乱,破坏活动不断发生,造成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大困难。同志们,这是十月革命给我们提出来的严重历史教训。我们吸取了俄国的这个教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设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的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鉴于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经济极端落后,科学文化极不发达;鉴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统一战线的关系;鉴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同时,我们又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主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两句话是在毛选五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必经之路的那篇文章里)。并且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采取和平赎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在一定时间内给资本家以定息等办法,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为社会主义企业。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把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资本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正因为我们这样做,我国在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过程中,社会没有出现大的震动

和不安，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邓小平同志这段话是在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在这里我想给同志们讲个例子。上海有一个资本家，1956年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后，他发表了一个言论说：我进了社会主义的理发店，给你一个白围巾把你围一围，然后拿了一个剃头刀，帮你剃头，把你头剃光了还不能动，一动就要出血。这段话登在当时上海晚报上。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我们正确的政策，资产阶级有他的软弱性和他接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理论、政策和实践，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新的光辉胜利，它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不仅对于我们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争取华侨工商业有着更大的意义。而且，在今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对如何改造中小企业资本家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是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三、正确的解决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生产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大国里，把个体经济包括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通过互相合作的形式，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同时，把个体生产者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者，这是使我们能够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经济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同时进行。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国家是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我们在实行集体化的时候，农业机械化基本没有。是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进行集体化的，完成了对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这些步骤和政策，给马列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是对列宁关于合作化理论的一个发展。对于小生产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同志有一个系统的设想，概括的说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把个体经济组织起来，发展成为集体经济，这就叫做搞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我们以53年到56年这一段，就实现这个阶段的要求；

第二阶段，是实现机械化。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在国家工业化程度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巩固工农联盟；

第三阶段，是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和机械化，也就是现代化生产的发展，最后达到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现在来看，这个设想是好的。但是，在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我们产生两个缺点：一个缺点是工作步骤过急了，工作方法比较粗糙，特别是在由初级社到高级社这个过程中，另一个缺点是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一刀切的毛病，片面地强调划一，也没有注意到经济的多种多样形式。在这里要提出来说明一个问题，当时对邓子恢同志的意见研究的不够，批评他“小脚女人”走路，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对他的批评有许多不是实事求是的。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当中，有这些缺点，但是，我们党遵循合作化原则，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社会大变动当中，我国的小生产者不感到突然，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所发展，我们的国家比较稳定，这也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创举。不象苏联在集体化的时候，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总的看来，我们党采取的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成功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四、正确的解决了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我们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这几年时间内，始终坚持了以生产为中心，而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在处理发展生产和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两方面的关系上是成功的。我们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正确解决这两方面关系的一个集中体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主体和两翼的关系，主体就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两翼就是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实质是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在这一条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迅速的取得了成功，同时又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这是我们党对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学说的运用和发展。

五、正确的解决了对外关系的政策、原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对外关系上处理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确定了党的正确政策和正确原则，这里我从三个问题来说：

（1）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民族气概。在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谁也不敢惹它，而我们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敢于出兵，跨过鸭绿江，与美帝国主义对阵，并且打败了它。这就表明我们党、我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2）我们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对于争取世界和平，改善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个五项原则将长期发生作用。

（3）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支持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支援世界人民解放斗争，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经验教训。以1949年到1956年，这个期间，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原则，在处理国际上的重大事件，表明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综合起来说，以1946年到1956年这个十年间是毛泽东思想光辉发展的时期。到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1956年9月，党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此外，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也都作了重要发言。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大会正式宣布我国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剥削制度的历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大会确定了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发展生产力，把农业国改造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八大”强调了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规定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对政治民主化和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讨论不够充分。中央领导同志在“八

大”的发言和“八大”文件，以及“八大”前后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代表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高峰，都是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它生动的反映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进步，是毛泽东思想胜利发展的伟大纪录。“八大”的历史作用是十分显然的。但是从“八大”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就是我讲的第四个阶段，从1946年到1956年这个十年，是毛泽东思想光辉发展的时期。这是基本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我们对于在中国的条件下怎么样搞社会主义还缺乏经验，在这个时期里，在政治思想方面对于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注意不够；虽然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但是没有提出和完成人民共和民主化的任务；党内左倾思想已开始滋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出现急躁冒进的情况；对文化科学界的政策已有左倾的开端。

第五阶段，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曲折时期和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从1946年到1956年这个十年间，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罕见的。但胜利也使我们走向另一面，在“八大”以后，我们党、毛泽东同志开始骄傲了，不谨慎了。所以，胜利是好事，但由于胜利而骄傲，这种转化又是坏事。同志们，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个根本问题没有搞好。

“八大”以后，我们党由社会主义改造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转变没有搞好。同志们知道，我们党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我们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是艰难的、曲折的、花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首先是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这个转变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道路，一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国内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基本消灭了，虽然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党开始探索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从党的“八大”以后，直到1966年，党领导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上曲折前进，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在这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曾经离开了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犯了左倾错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三个急”，急躁冒进，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这是同我们党对社会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错误相联系的。国家经济状况1957年是好的。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造成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人民牺牲很大，直至贯彻“八字方针”才得到好转。1965年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但是，接着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令人痛心的左倾路线错误。在这个曲折前进的道路上，毛泽东思想发展也是曲折的。我们党犯的错误，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犯的严重错误，在这二十年当中，造成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那么，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发展了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还是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作出若干正确的判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在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等方面，坚持唯物论，辩证法，曾经提出许多远见卓识的主张和理论观点，所以毛泽东思想仍有部分发展。在这里我想把哪一些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展，哪一些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作这种区别究竟对不对，请同志们考虑、研究，错了就改过来。

首先，我讲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怎么样搞社会主义，搞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在世界上都没有完全解决，还是一个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它的规律。我们社会主义的历史，要从十月革命算起的话，今年才六十多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才三十一年，所以社会主义还是处于青少年时代，还有许多未被我们认识的必然王国。要探索社会主义的规律，就要付出代价。资本主义制度从确立以来，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是经过三次封建王朝复辟而后才确立起来的。要把社会主义创造的比较成功、比较完善，决不是五年、十年的事情，也不是五、六十年的事情。我们看人民历史的发展，要看它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六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苏联变修了，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党又犯了大错误，57年后曾经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又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叫十年浩劫。于是，有些同志就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信仰危机”。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历史才几十年，另一方面，苏联变成修正主义，我们国家经过了两次大马鞍形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困难时期，也教育了我们，给我们从反面取得了经验。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举国上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得来的！我们党在二十年的探索中，走了曲折的道路，但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同志们，我们回顾社会主义二十年曲折前进的历史，我们党从正确路线到错误路线，是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有正确和错误，有成功和失败，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就看到我们决不是一无是处的。在以下方面，提出的理论观点还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有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一）必须坚持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的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and 政策，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内容，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虽然，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违背了这些理论和政策，造成了损失。但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and 政策的重要性，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当继续贯彻这个理论和政策。

（二）必须坚持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大生产的基础上，但是我们中国工业是十分落后的，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鉴于苏联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的恶果，毛泽东同志提出必须解决“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并根据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应当正确地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为重工业的发展创造巩固的基础。这些正确思想，应当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的内容。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在继续摸索中。

（三）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我们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所应当坚持的一个长期性的基本方针。我们党原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后来在实际上又把把这个方针逐步地抛弃了，打倒“四人帮”之后，这个方针又获得了新的生命。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证明，这个方针是促进我们科学文化兴旺发达的正确方针。

正确贯彻这个方针，也是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问题。我们党对这个方针的提出和实践这个方针的一系列政策，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也是一种独创。

（四）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们的国家地大人多，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也不发达。所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当是大、中、小企业结合，土、洋结合，在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比较落后的生产技术还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应当不断进行技术改革和技术革新；应当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五）必须坚持保障广大劳动者真正享受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和管理企业的权利，实行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管理方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和管理，这是社会主义成败的一个关键，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顺利进行。所以，人民群众参加领导，参加管理，不仅应当体现在经济建设上，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应当贯彻这个原则。这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提出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的管理方法是正确的。怎么搞好这个三结合，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总结经验。

（六）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合理地调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正确进行综合平衡，才能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鉴于1958年“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我们党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搞好综合平衡，提出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并且，先后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和措施，恢复了国民经济，战胜了困难。在这方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是有重大贡献的。

（七）必须坚持发展商品生产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过程中，我们党曾经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能取消商品生产，不能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应当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实行等价交换，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强调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能“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指出实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是我们应当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理，这些都是正确的。

（八）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坚持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我们顶住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同苏联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巩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支援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同志们，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顶住苏联的霸权主义，现在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必

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正确执行马列主义的对外政策和策略。我们党向全世界人民宣告，坚决不搞大国沙文主义，永不称霸，是有深远意义的。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内容，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新贡献。

以上讲的是在曲折前进过程中，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上，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发展的几个主要方面。

其次，谈一谈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关于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认识，我们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策略家和战略家。他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和发展奋斗了终身。在他的一生中，是功大于过，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基本估价。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的时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完全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他的理论和实践相矛盾，主观和客观相矛盾；他的思想言论中，前期和晚期相矛盾。说个例子，57年他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接着后面又重复说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确和错误相矛盾。又如讲民主集中制，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相脱节的。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些矛盾，造成对工作指导上的多次失误，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叫左倾路线错误。这个错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从1957年及其以后二十年间的历史进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是逐步形成的，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毛泽东同志晚期错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产物，公正地说，也是我们犯的错误。但作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他负主要责任，主要是他的错误。同时，在这里还应当指出，一般地说，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同我党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又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们现在把他晚期的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扬弃，这在政治上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们今后正确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下面分三个问题来研究：

（一）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严重错误和在实践上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所谓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这个错误是脱离我国实际情况的，也是违背党的“八大”决议的。首先，对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认识错了；其次搞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批判和划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也错了。当时我们党正需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当然是错了。右派是有的，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我们进行反击那也是必要的。但是，根本不需要搞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哪有那么多的右派啊！当时他们绝大多数人，向我们党提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同志们经过1978年以来的复查结果，全国错划的右派分子，现在已经改正的约占原划总数的98%，这个

情况就说明，我们错的厉害。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矛盾提出来了。这样，既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又与57年初他的正确思想相矛盾。1959年，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运用到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把党内的是非问题，错误的说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更加严重的是他把这个右倾看成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同志们注意，从1958年批“反冒进”到庐山会议以后，我们党中央虽然也曾有几次研究纠“左”的问题，但都夭折了。总的看来，基本上是只准反右，不准反“左”了，这就为推行“左”倾政策开辟道路，造成后来的严重后果。1962年，毛泽东同志把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系统化、理论化，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有“三个存在”。他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变质”，我们党就没有清醒的马列主义路线。1963年，毛泽东同志又错误地估计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认为搞得不好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1964年，他提出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1965年，他又重申整个过渡时期有“三个存在”，并且第一次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要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96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国党、政、军内和各种文化界里，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突然号召“炮打司令部”；1967年，他支持向所谓“走资派”夺权，而把这种夺权说成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969年，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彪、康生、“四人帮”把这个理论作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广为传播，流毒全党。这种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旧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新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还在不断地产生；小生产还在每时每刻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是资产阶级的，说他们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内，他们是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是继续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好形式等等。直到1975年，他提出所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等等。毛泽东同志的所有这些阶级斗争的理论，都是错误的，他既违背了我国的客观实际，又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由于他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错误，因而他在实践上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这是合乎逻辑的。

（二）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犯了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改造胜利以后，对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不是立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是放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方面，1956年、57年由于改造的胜利，我国的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他过份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反

作用，错误地以为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就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他就决定从一种集体所有制形式过渡到更高集体所有制形式。当时他错误的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幻想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结果适得其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并不能巩固发展，还得退了下来。在这个同时，他又过份的夸大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因此，他就不重视经济基础的建设和物质利益的原则，以致发展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阶级斗争作为发展生产的直接动力，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或者使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推动生产。特别以自己所谓“反右倾”、“四大”、“大跃进”等等来推动生产。这一些，不是起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作用，而是起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作用。在经济方面，由于他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地强调“高速度”，“以钢为纲”，要求1958年钢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生产任务。结果几千万人上阵，小高炉林立，许多森林被砍光，削弱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后来周恩来等同志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这是对的。但是，毛泽东同志不强调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而是强调“气可鼓、不可泄”，批判所谓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另外，他在晚年还不适当的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当做同旧社会差不多的东西，让“四人帮”当成“资产风”加以批判。这些错误，是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它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背道而驰的，违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错误，是带有一种左倾空想色彩的。

（三）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方面，违反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错误。这里讲组织方面的错误。在民主集中制问题方面，毛泽东同志是在理论和实践相矛盾的状况下所犯的错误。在理论上，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但是在实践上他又没有做到，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于这一个矛盾，他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脱离集体，脱离实际。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所谓两个战场，同志们还记得吧，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党内这个战场从那时起，58年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联盟。这些都是破坏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典型表现。文化大革命当中，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民主生活极不正常。他重用林彪、“四人帮”，让他们上台，结果他们利用权力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毛泽东同志还欣赏个人崇拜，他在1970年12月同斯诺同志谈话时说，他主张要一点个人崇拜。毛泽东同志晚年骄傲了，听不得不同意见，逐步滋长了一个人说了算的倾向，搞一言堂。在党的历史上，曾确定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毛选》五卷当中，毛泽东同志还这样写：“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中央的文件，如果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没有看，你要发出去就没有效。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更为突出，只有毛泽东同志批示“照办”的才能算数。一言堂、家长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已经成了党中央政治局的上级。从二十多年的历史来看，如果更早一点，我们还可以说是从1955年批判“小脚女人”开始。55年的批判“小脚女人”，57年的反右派，58年批反冒进，59年反彭德怀、大反

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大斗“走资派”一系列的发展，使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遭到严重的破坏，党的生活极不正常，这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重大的错误。

以上讲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主要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三个方面来说的。他晚期的错误思想已经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是相对立的。同志们，现在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应当抱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我们要真正恢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对任何事物、任何人都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决不能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看成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又不能把我们的错误，统统归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我们根本的目的，在于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全党的借鉴。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原因是什么？

首先，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骄傲了，欣赏个人的崇拜，本来他特别强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六条，但是因为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的到来，胜利又非常伟大，在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太重了。这样，在他的思想当中，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增多了。他在主观上过份地担心中国党会出现和苏共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关系和党内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赫鲁晓夫睡在他的身旁，把复辟资本主义，当成已经是非常现实的危险。所以，他左思右想，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搞掉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样一搞起来，他自己也难以驾驭了。为什么？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外，还有康生、陈伯达的恶劣作用。另外，毛泽东同志本人正因为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直到他临终还不可能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思想主要是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

其次，从中国社会来找一找原因。社会原因，就是党中央最近说的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蚀，也造成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一个原因。中国是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连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也没有，这种情况，对毛泽东同志是有影响的。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面分析拿破仑上台跟法国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类比，但是要研究中国社会跟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关系，也不能脱离这个特点——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需要有一个救世主，需要这么一个家长制，这就跟这个社会不可分开的。毛泽东同志错误思想中有一个反映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从五七年后他就形成了一个先验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六六年他的“五七”指示仍是这个思想的继续。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和中国的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者的存在分不开的。

再次，从党的制度来看，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的跟党的制度有关系。我们党的制度，党的干部制度，允许领袖个人有最后决定权，不搞集体领导，个人说了算，领导人终身制，中央集权制。这种制度往往会把个人推向反面。

最后，我们还要讲一讲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跟共产国际影响的关系。俄国革命长期存在的一种高度集中的统一的党，党内有一个领袖，而这个领袖是有高度权威、高

度集权的。这一方面在地下斗争、战争时期，是革命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又产生了弊端，这种状况，对我们党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们党的建立，是按照列宁党的榜样建立起来的。在我们党内，这个领袖的高度权威、高度的集权是有传统的。党一成立，陈独秀就是搞一言堂、家长制、高度集权，而后又是王明等等。这个跟共产国际运动，跟苏联党对我们党的影响有密切联系。

这些都是造成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诸方面的原因之一。我们应当吸取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六阶段：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时期。这个阶段，现在还是开始。但是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极其重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我准备在下面作为一个专题，概括地作一些说明，和大家共同研究。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新时期的开始问题

我认为，我们党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我们党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时期。

为什么说是新时期的开始呢？因为，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宣布了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展了揭批林彪、江青为头子的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还没有清除毛泽东同志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路线的影响，还延续了一个暂短的时间，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战胜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同志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党中央继续领导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举国上下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就是说，我们党已经进入了开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时期。

为什么在新时期里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呢？因为这是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们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在新时期里，我们必须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必然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因为客观事物在向前发展，我们的思想理论，也必然要跟着客观事物而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党又把毛泽东思想继续向前推进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讲的一段话：“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历史在前进，情况在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新生的事物层出不穷，都需要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去回答、去总结。所以，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历史的必然，不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有发展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同志们，现在我们党的情况，毛泽东同志逝世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刘少奇同志都先后逝世了，有的同志就说，现在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多了，我们还能不能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了疑问，表示了怀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定要发展，一

定能发展。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党、我国人民革命历史的需要。因为，我们党已经有了六十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接受了三十一年来社会主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极大的基础条件。我们的挫折，使我们聪明起来，在自己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中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步总结了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训。党中央开始系统的总结建国之后三十年的历史经验，我们党在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已经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了。现在我们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正是从三十一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科学总结而得出来的，而这些又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首先，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将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去了。

第二，历史遗留的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已经进行了正确的处理，实事求是的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

第三，继续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我们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现在是真正的到来了。

第四，我们党中央现在采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

第五，党组织研制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及时地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肃清“左”倾路线对经济工作的影响。

第六，这几年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地有所改善。

这些事实说明，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真是“步履艰难，经验丰富”，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方面，做出了新的榜样，我们党的集体智慧已经显示新的光辉。因此，我们坚信，只要继续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必将继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地推向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志们，这个问题我原来讲的是四个部分，经过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班的讨论，吸取了他们的意见，又作了一次修改，尔后我才到这儿来的。现在集中讲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其余部分今天就不再讲了。希望我们到会的同志来研究，讲错了的，就修改过来，以中央决议为准。同志们讨论看，还有什么问题，再根据同志们意见，看看以后怎么办，今天就讲到这里。

建国后十七年党史概况

张 弓

(根据录音整理)

(一) 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再到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只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也只有半个世纪。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短暂的时刻，它还是一个新事物。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指出：“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社会主义尚处在实践探索阶段，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苏联斯大林的模式问题不少。我们自己的事情也不那么如意。社会主义各国都在自己的实践中探索道路，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总的说来，这个必然王国，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得很清楚。

我国的社会主义三十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我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成就。也遭到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误。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使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回顾党走过的这段历程，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

恩格斯讲：“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恩选集》第4卷458页）今天党的路线来之不易，是经历了两次大的折腾，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取得的。应该十分珍视这个付出了重大代价而取得的伟大成果。我们要系统地回顾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加深人们对今天党中央路线的认识，以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党的行动，步调一致地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就是我们研究和学习社会主义三十年党史的目的和出发点。

建国后的三十年，大家都是过来人，各人都有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现在大家都在思考问题。可以说目前是一个沉思阶段，反省、总结经验的阶段。各方面议论纷纷，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逐步趋于一致。还有许多问题认识并不一致，这是好现象，它有利于互相切磋、启发、比较，探索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搞得比较好些，更好些。

研究党史根本的态度还是要实事求是。在如何看待我们党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态度是要防止的。一种是把党看成完美无缺的。过去我们在宣传上曾经强词夺理，夸大党的作用和成就，否认党的缺点和错误，这是形而上学，不符合实际的。现在又有另一种倾向，即抹煞党的成就，贬低党的作用，甚至把我们党说得一无是处，任意丑化党而不感到痛心，这也是错误的，不实事求是的。

三十年来我们这个党虽然犯过大的错误，但总的来说，还不失为光荣伟大的党。是经过了严峻考验，克服了困难，纠正了错误并且战胜了内外敌人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党。

首先，在我国建立和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消灭剥削和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制度虽然今天看来还不很完善，但历史已证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不仅能够战胜内外敌人的破坏和颠覆，而且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领导十亿人口取得了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这是一个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仍然是三十年的基本实际。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根本转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历史发展的巨大变化。这一转变使百多年来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奴役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外力支配，并在世界上发挥重大积极作用的新中国。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进步力量。它顶住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支持了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社会进步的斗争。

其次，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落后的废墟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四化奠定了基础。就工业来说，现在我们已拥有五千亿元的固定资产和三千亿元的流动资金，比之建国时的128亿元增加了近四十倍。职工队伍近一亿人，比解放初增加五十倍；大专毕业生三百万，加上中专毕业生总共已有七、八百万。解放初中学以上知识分子总共才三百万。建立了许多新的科技部门和少数的尖端科学。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一九七九年每人平均收入201元，比解放初的76元增加近二倍（以不变价格计算）。

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先进人物向资本主义学习，提出了许多救国救民的主张，但都破产了。蒋介石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更将中国带进了死胡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将中国人民领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起点。在这一新的征途中，我们难免要有挫折和失败。正象民主革命28年中我们难免经受挫折和失败一样，当我们克服了错误，端正了路线，党就领导人民继续胜利前进了。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尽管在我们面前困难还很大，问题堆积如山，但革命者最重要

的是要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能失去信心，并且敢于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人民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今后准备怎么办，使人民得到鼓舞，受到教益。从一九七八年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不断地认真地研究了党在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水平和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已大大提高了，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成效显著，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人民对党的信任也日益增强了。

对于党犯的错误，要不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和步骤向党向人民讲清楚，特别是对老年人的错误可不可以讲？至今有人讳莫如深，顾虑重重，以为这样对党的威望会有好处，其实这正适得其反。马克思讲：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他主张无情地自我批判。他讲：“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转引自中央党校《理论动态》224期，第19页）列宁讲过，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正确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找出改正错误的办法，这是一个郑重党的标志。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一些同志没有传达他在六一年六月的一次会上所作的自我批评以后说：“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我们指出错误，是为了今后避免和减少错误，教育党教育人民，这完全是积极的。研究分析错误，重在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必须采取实事求是，严肃慎重的态度。对于毛主席的一生来说功大于过，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过是第二位的。对于毛主席的功过要讲清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以功掩过，文过饰非，也不可因过而抹煞他的伟大功绩。现在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一方面是感激的心情，一方面又因为他晚年的过错而有埋怨情绪。这就要避免感情用事，要十分注意冷静的科学分析。否则就要犯错误，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国内国际、当今和子孙后代的大问题。

列宁讲过：“恩格斯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马克思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但是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应当采取另一种态度，的确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否则你会犯一千次错误。”（《列宁全集》第35卷256页）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特别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和革命作风，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党的领导者、干部和党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民解放军战士、革命青年和广大人民群众。由他的科学思想和革命作风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干部和党员，现在是今后仍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巨大功绩，就是不承认客观的历史，不承认革命的传统。这样的态度是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

（二）对建国后十七年党史的基本回顾

总的来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是党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按照中国社会的特点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

创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征途中曲折前进的历史。十七年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折：一是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折；二是由过渡时期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折；三是党的工作重点由革命到建设的转折。前两个转折是转得好的，成功的，后一个转折发生了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总的看，十七年间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在1958年的下半年到1960年的下半年，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内党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和其它各项事业的损失。经过调整，国民经济才又得以恢复和发展。因此，十七年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一个上升、下降、再上升的之字型的曲折发展历程。

十七年的历史，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1949年10月—1956年）；

第二段，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失误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1957年—1966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代表帝、封、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全国大陆覆灭，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历史过程基本完结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开始了。列宁讲：“政权在那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标志”。因此，在消灭三大敌人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即依据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观点和毛泽东同志革命转变论的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上正确地制定了适合我国社会历史情况的革命转变的战略和策略。其中要点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奠定社会主义的初步经济基础。

二、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作为党夺取政权后的中心任务。实行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建设事业，使党领导的各种运动，各项工作的进行，都围绕生产，促进生产。

三、对资产阶级实行区别对待。对资产阶级的主体——官僚资产阶级实行坚决消灭和镇压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民主爱国人士采取团结改造的政策，一律包下来，给他们选票和饭票，将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统一战线。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爱国人士过好“三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

四、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已经开始，而民主革命大量遗留任务急待完成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党一方面指明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全局而言，这一矛盾已成为决定历史方向，决定革命道路和制约其它一切矛盾的主要矛盾；同时又顾及到建国初期人民大众同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还在相当大的地区和部门中尖锐地存在的事实，采取了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先后缓急，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避免全国“一刀切”或“四面出击”的策略，这样，革命

的转变和主要矛盾的转化实际上经历了三年的历史过程。

建国头三年由于党实行了革命转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和异常艰巨繁重的任务面前，党在紧紧抓住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中心任务的同时，进行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民主改革等运动。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措施，对资产阶级投机倒把，扰乱金融，施放五毒等不法行为也曾先后开展过激烈而又有节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在上述各种运动推动下，一九五二年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

国民经济的恢复为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五三年党适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总结建国三年来的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提出来的。党考虑到：

一、经过三年来的工作，特别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农联盟已空前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已巩固地确立起来；在经济上、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确立了稳固的领导地位。

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政治上较弱，在党的正确政策下，表示拥护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改造；党在三年中通过稳定物价的斗争、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的斗争，已成功地摸索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改造的经验。

三、认识到搞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共存，同时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小农经济处于分化中也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

在上述实践认识的基础上，在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时，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制定了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丰富发展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明确地加进了“逐步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内容。

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对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逐步引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明确地提出要改造小私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公有的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

三、七届二中全会以及建国初期，我们党曾设想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是很远的将来的事情，是要等到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再来进行，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则明确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国即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就给建国前后，我们曾经叫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或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赋予了社会主义逐步改造和逐步过渡的新内容。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保护富农”等过时的观点和提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并举，而又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集中了很大的力量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用社会主义工业化吸引和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保社会主

义制度在我国的胜利。

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党的政策大体是正确的。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再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形式，经历了七年的时间，而我国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内即有二十多年的互助合作的传统和工作基础。因此广大农民易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比之苏联二十年代末期实行集体化的情况要顺利得多，而且避免了生产力的破坏和下降。问题是从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大太快了，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群众觉悟的程度，发生工作粗糙，要求过急，在一些地区违背自愿互利原则，侵犯中农利益等缺点错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和资产阶级建立了特式的阶级联盟，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早已提出来而未能实现的设想。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历史使命。并逐步完成了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过程。这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新贡献。消灭资产阶级，我们共付出了三十亿元〔即从建国初期搞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四马分肥到公私合营后实行定息（五厘）的十七年总计〕。而且使我们利用资本家的企业，繁荣市场，为国家积累资金，增加了财富，壮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的缺点是：（一）在一九五五年冬的社会主义高潮兴起后，步子过急，在一些地区和行业忽视了生产发展的实际要求，不适当地实行相当大的“裁、并、改、合”，使许多原来小厂小手工业经营的花色品种多样的特点，被统一的、单调的产品代替了，原有原料产品供应渠道也割断了，商业网点大量减少。对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二）对原有企业的一些好的经营管理方法，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概否定了。而又没有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创造出适合各种不同情况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多样化的经济形式和经营管理形式。（三）在改造高潮时，有相当大的一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它劳动者也盲目地带入公私合营。这些本来可以保留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当时又把他们统称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也是不妥的。（四）未能适当保留部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和流通事业。

在一九五三年——五五年期间党内反对了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在全党为贯彻实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时刻，反对篡党野心家的斗争，算不上是一次路线斗争。因为高、饶他们并未提出什么与中央相对立的政治纲领。这一斗争是必要的，它对于巩固党的团结，抵制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涉，保证全党团结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斗争所采取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主要是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保护多数，团结教育，斗争有节，基本没有扩大化。

至于这一期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不适当的（中央已发76号文件予以平反）。当然对胡风的错误思想、政治观点、文艺理论观点是可以进行批评的。但采取全国政治运动当作所谓反革命集团打是“左”的扩大化的错误。这违反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思想政治理论观点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办法去解决的原则。这使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伤害。这是一个教训。它证明了，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政治观点、文艺观点必须采取双百方针，透彻说理明辨是非。用群众性政治运动压制的办法是错误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全党的努力，许多原定指标在一九五六年即提前完成了。四年中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二十一，手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百分之十四，农业总产值完成原计划百分之一百零一，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农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三十。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好的，五年计划做到四年完成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办的。据计委的同志讲，这是建国以来，迄今唯一按计划执行好的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的计划，有的没有执行，有的根本没有具体计划，或只有一个初步大纲。

在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功绩是：（一）对“七大”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工作作了正确的总结，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二）分析了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三）特别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提出执政党的地位，要求全党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等。“八大”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而且直到现在还有现实指导意义。

但是，“八大”是在一片胜利声中召开的，缺少反面的经验，事实证明光有成功经验是不够的。由于经验不足，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针，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对发展党和社会主义民主等的讨论和规定都不够充分，也未规定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实施办法和党纪国法作为保证。

当然这只能作历史经验而总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八大”不可能做出那样严格的规定。我们不应苛求于“八大”。因此我们认为“八大”是迄今社会主义三十一年来所有代表大会中最成功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八大”通过的各项文献和重要发言，同毛泽东同志在“八大”前后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代表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高峰。

总之，建国后的前七年，我们党领导人民顺利地实现了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面貌欣欣向荣，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民经济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党的威望很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表现。这在理论上和实

践上初步回答了象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为什么能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在纷繁艰巨的任务下，特别是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党不但没有犯大的错误，而且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呢？单就党的领导经验来讲，提出以下几点，请大家研究。

一、建国初，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和“七大”以来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

二、保持了战争年代艰苦奋斗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

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肯于学习，勤奋工作。

四、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保持了党的先锋队的战斗性和组织纪律性。

第二段，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十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失误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并为纠正正在探索道路中所犯的错误的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这个时期工作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严重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特别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严重错误。这个政治上的错误，在这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虽然还没有支配全局，但也没有得到认真的纠正，反而逐步发展和升级，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害，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经济建设中重工轻农，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不足的缺陷暴露得愈加明显了，加之波匈事件的教训，促使我们党考虑走自己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党中央经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吸取苏联的教训，由毛泽东同志加以集中整理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理论上、政策上作了新的探索，两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即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文章分析了新形势下国内矛盾的变化，论证了党在建设时期一些重大的经济、政治方针政策。很可惜的是这种科学性的探索，并未始终一贯地坚持去。而在不久，连毛泽东同志本人也违背了这些理论和政策。

从革命到建设时期，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我们党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九五七年党提出整风，目的是为了贯彻“八大”精神和上述两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以便更好地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即发生了少数右派猖狂进攻的情况，在反右斗争中，我们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结果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五七年，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如有人攻击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公开提出要“轮流坐庄”，甚至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骂得一无是处。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对这种进攻，给予批判反击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如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等问题），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是扩大化了，据最近对右派问题复查结果表明，全国共划右派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五十二人，绝大部分都改正了。这表明把一大批人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使许多同志和朋友长期受到了委屈和压制（也牵连到家属子女），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这一错误也使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受到了挫折。

为什么会造成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一、我们党长期搞阶级斗争习惯了，这种工作方法尚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化，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对大量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尚不善于对待。面对那些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文化矛盾、思想矛盾、以至个人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缺少经验和新的处理办法，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去观察和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党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重新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为以后长时期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阶级斗争，提供了“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

二、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国际反共逆流、反革命颠覆活动和修正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估量过分，对国内右派的进攻形势也估计过重过大，本来是“吹皱一池春水”的形势，误认为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情况。以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和朋友。

三、党在胜利面前不谨慎了，听不得不同意见了，还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因而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影响极为浓厚，对党的影响也很大。加上我们党长期处在革命战争和剧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习惯。又因为接连不断的胜利，歌功颂德的话听得多了，因而对待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很尖锐刺耳，有的还不完全正确和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

还有的是由于右派中知识分子居多，就不加分析地认为是知识分子带头反党。说他们尾巴翘得太高了，有意要敲打他们，甚至因为我们党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把一些专家学者的科学见解和建议，误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加以打击。

四、当时还不适当地支持党外个别人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的建议，在全国发动所谓“四大”，以致造成到处紧张的动乱气氛。对此，又采取“一刀切”，在全国发动“反右”政治运动，结果有一般思想政治问题的人中，有不少被当作“右派”打了。

接着反右派扩大化的错误之后，是批判反冒进的错误。

一九五五年农业改造高潮出现以来，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情绪。一九五七年十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错误地批判反冒进，矛头直指×××同志和××同志。说他们是“促退派”。原因是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高潮形势下有人头脑发热，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冒进，发生了基建投资过大，职工增加过多，农业贷款过多，

许多地区将原定十二年内完成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在三、五年内做完，结果，造成很大财政赤字和物资供应紧张的被动局面。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报告中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客观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勉强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名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社论提出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矛头是指着他的。并且硬说这是给群众泼冷水。因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九——十二月发表的《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中，就已经过分地估计生产发展的高速度，过分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政治”作用的因素，提出要“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虽然在毛泽东同志写的《序言》中也有“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这样的话，但老人家的本意是要批“右倾保守思想的”，所以当别的同志提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而且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应着重反急躁冒进倾向时，毛泽东同志就认为是曲解了他的原意。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其中提到了“跃进”的口号，毛主席对这篇文章非常赞赏，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极为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问题，接着一月末的最高国务会议、二月的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月的成都会议、四月的汉口会议、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曾多次批判反冒进，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从“促退派”、“稳妥派”，到“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是“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来的一股风”，“由于反冒进右派才进攻”等。而且毛泽东同志个人专断地规定今后不准再反冒进。这种批判致使当时党内空气紧张，恐右病大大滋长，这恰恰给五八年的“大冒进”造成了浓厚的气氛。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体现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进程，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贫穷落后的愿望。总路线的要点规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就主要方面，首先是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说，是“八大”一次会议正确路线的继续。在党的总路线鼓舞下，人民群众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自力更生的创造精神，在许多生产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开辟了新的局面。

但无可否认一九五八年所兴起的三年“大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失败了。党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有关方面估计仅国民收入一项损失即达一千二百亿元，政治、思想、作风上的损害就更大。

造成失误的原因，一般说我们没有独立搞大规模建设的经验，要付出一定的学费，这是必然的。但再进一步想一想，为什么建国初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复杂艰巨的情况我们没有犯大的错误，反而在建设有了一定经验时犯这样大的错误呢？特别是又为

什么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之后要犯这样大的错误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叶副主席在国庆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造成大跃进失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开始不谨慎了，这个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但还要加以具体说明。我考虑这种骄傲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的表现：

一、党的建设总路线的制定，是在反右派扩大化和错误地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制定的。因此，制定总路线的指导思想上即缺乏实事求是、民主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和措施是凭主观的愿望和一时的热情提出来的。名曰多快好省，实则只讲多快不讲好省，鼓足干劲又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背离，这样的指导思想必然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二、胜利冲昏头脑，急于过渡，超越阶段，超越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进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违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理，搞“穷过渡”，“白拉平”。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党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次会议冒然地决定当年钢铁生产要比上一年翻一番，以此作为实现工业大跃进的“纲”，并且决定把刚成立不久的高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人民公社。错误地认为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可加快进入共产主义。因此，北戴河决议公开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实践表明，这不是搞共产主义，实际是搞农民平均主义，它严重地剥夺农民的生活资料，大大地破坏了生产力。列宁讲：“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否则共产主义是一钱不值的。”（《列宁全集》第29卷163页）

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空想。它的基本点可以归纳为：1.农业公社“一大二公”，农工商学兵一体化。2.实行“穷过渡”的绝对平均主义。3.吃大锅饭，搞供给制。4.组织军事化（“又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5.工农知识分子过同等生活水平，搞“白拉平”。6.保持小生产自给自足。这样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

三、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自以为是，片面理解自力更生，轻视当代科学技术，以为群众发动起来靠土办法即可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搞上去，甚至超过别人。轻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

四、党内和国内生活不民主，采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办法推动建设，这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它还助长了强迫命令、虚报浮夸等不正之风。

五、把经济建设工作混同于革命斗争的进程和战争的进程，企图用发动群众运动的办法，象组织战役和战斗那样，片面强调政治的作用，强调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不立足于经济本身的客观可能及其发展规律。列宁曾经对当年苏联建设初期的类似错误提出批评。他讲：“革命所作的以及能够作成事业过去是、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依靠英勇精神而取得的。我们就是靠这些东西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

里，因为情况改变了，我们要解决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任务了，在这里不能向后看，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任务了。”“这件工作要做好几十年，要花极大的气力。决不能用我们进行军事工作的速度和条件来进行这项工作。”（《列宁全集》第33卷146—147页）在这里“绝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要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列宁全集》第29卷385页）

陈云同志在党的三中全会上讲建设的速度问题时，他说，什么叫高速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有计划按比例，就是高速度”。这是总结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工作的经验之谈。

上述错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逐步有所觉察，陆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十二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八届七中全会（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直至庐山会议的前期（七月），从理论上到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纠“左”的措施。这些会议反复强调：（1）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2）划清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3）反对“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4）要求重视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5）逐步地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从而开始部分地对经济工作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有所扭转。

然而纠“左”有严重阻力，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在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借口下，拒绝改正错误，而且还攻击纠“左”是右倾保守主义。实际上许多部门和地区“左”的错误并未纠正。根本原因我认为：

（一）三面红旗是不可触动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是指出它有缺点和错误谁就必然倒霉。因而人们的心理状况怕右不怕“左”的思想始终占了上风。这种情况不改变，纠“左”就不可能彻底，更不可能立竿见影。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之火以及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有它深刻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把火既已点燃了，就不易轻而熄灭。

在纠“左”过程中又发生了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同志以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因而纠“左”的进程被打断了。“左”的错误又占了上风，于是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党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但回潮了，而且比五八年的“左”倾发展的更为完备，从经济工作指导上的“左”的严重失误，发展到政治上组织上“左”倾错误，因此它更带有全局性。庐山会议还开创了把党内斗争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党内斗争扩大化的先例（过去讲路线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现在讲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并且提出了一个党内“民主派”的错误口号。庐山会议破坏了党内民主，打击了敢于实事求是地按照党的组织纪律在党的会议上向党反映情况和提出对工作的批评意见的同志，助长了个人专断。

庐山会议决定林彪代替彭德怀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从此，他开始在军内进行拉帮结伙，打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个人迷信的活动。

庐山会议后，完全错误地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使原来纠“左”的东西成了右倾受批判，“左”的错误恶性发展，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加上赫鲁晓夫撤

专家毁合同和自然灾害，使我国遭到严重的困难。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实践的惩罚，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倡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十一月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12条），这是纠正左倾错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上述方针和指示，并且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倡议，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次会议是克服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的一个转折点。

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解决，特别是解决了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高指标，高征购（60年以后），划小社队规模，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一九六一年六月决定取消），允许农民保留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副业等，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此外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分别主持制定了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等以及其它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套在当时条件下基本适合我国情况的具体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及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省地县负责同志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给错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会议对贯彻八字方针问题，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要努力克服盲目性，认真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对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根源还缺乏必要的清算和深刻认识。不给彭德怀同志等平反，就说明了“左”的错误并未彻底纠正和认识，而党内“恐右病”也就解决不了。林彪在会上起了恶劣的作用，说什么造成困难的原因是没有“高举”、紧跟”，是“受到干扰”等。

一九六二年二月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陈云同志作了题为《目前财政情况和应采取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五月，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两次会议对当时财经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提醒全党必须对困难形势有足够的认识。会议坚决贯彻八字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和工业生产战线（实行关停并），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紧缩财政开支，加强财政金融统一管理，对某些商品采取高价政策，回笼货币等。两次会议对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起了有效的作用，到六二年底经济形势就有了明显好转。

但是，形势稍有好转，就又要抓阶级斗争了。在严重困难情况下，农村曾发生了部分单干，包产到户（属于生产管理责任制），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等，封建迷信活动也多起来了。这些问题的产生，直接与我们执行“左”倾政策造成严重经济困难有关，而且绝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根本的办法是纠正我们工作中“左”倾错误的问题，但又

被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彭德怀同志由于对七千人会上指责他“里通外国”等有意见，给中央写了申诉书，又被说成是搞翻案活动。

六二年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接着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除了肯定经济形势的好转，要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外，毛泽东同志又把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他把社会主义一定阶段中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贯串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把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夸大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而且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使一九五七年以来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更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使党在长时期内陷于难以解脱的思想政治的混乱之中，这是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

十中全会，批单干风和翻案风（指彭的申诉书和小说《刘志丹》），康生诬陷习仲勋同志为高岗翻案，说这是利用小说反党。

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提出鉴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教训，要把做好当前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这对于当时继续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没有受过多的干扰，起了好的作用。

十中全会以后，许多地方陆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对城乡基层组织中，在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的帐目不清，财务不清，在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多吃多占，官僚主义，组织不纯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极少数带有阶级斗争成分），按照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清理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把这些问题一概说成是敌我性质的阶级斗争，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但是在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左”的口号影响下，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四年九月，先后在杭州和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有关农村社教两个“十条”以及后来一九六五年二月制定的二十三条，对农村形势的分析都发生了“左”的错误。“二十三条”虽然做出了要保护干部的大多数，四清要落实在生产上等正确的规定，但这个文件又认为全国城乡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提出“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说走资派从地方到中央层层都有，并且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说“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开展农村社教同时，在城市部分工厂和个别单位也开展了社教运动；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从错误地批判《刘志丹》小说开始扩及到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美术各个部门的代表人物，说他们是服务于某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甚至说文化系统十五年来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教育部门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着。说农村生产队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的大部分领导权也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群众手里。认为统战部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部，农村工作部是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三自一包”的，以致常常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总之，由于对国内党内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夸大了阶级敌人复辟的危险，当时搞的许多批判，也都是无限上纲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具体策划的对《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使这种政治陷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且直接成

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十中全会后的国内形势，虽然阶级斗争一步紧逼一步，但就全局来说，党的中心注意力还是搞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主要表现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强农业战线，对工厂企业实行大规模的关停并转，保证重点建设和重点工业企业，使工业基建的发展同农业的生产水平相适应，在工业部门内部整顿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作到综合平衡。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规格，使之成龙配套，当时的口号是“抓农业、轻工业，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

党在克服困难的過程中所表现的团结一致，纪律严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证明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和人民的团结是巩固的，党是对人民负责的 和 值得人民信赖的。这一段历史有力地证明，我们党不愧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一九六三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一九六四年底，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提出，大大地鼓舞了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到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已达到和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一九六三——六五年我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七点九，其中轻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二，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九。农业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一，达到了很高的速度。当然这些都带有恢复国民经济的性质。

总之，十七年来我们党走过曲折道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只有经过错误和挫折，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列宁全集》第28卷54页）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正在实践发展中的新事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不可能不犯错误，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建设的道路也不会是笔直的。恩格斯讲：“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差不多还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错误的前代要多的多。”（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全集第3卷125页）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要有相当的过程，我们只能从总结革命和建设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使我们日益变得聪明起来，也就是使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客观的实际，把我们的事业办得更好些。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恩全集》第4卷285页）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在总结三十多年的实践和认识，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今天的情况我觉得犹如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期，那时全党对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飞跃。整风的胜利，使全党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历史性胜利。今天我们全党又正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通过这一总结，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将有一个大的飞跃，这是一次党的伟大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相信经过这次的总结和整顿，全党将团结在中央的正确路线下，夺取四个现代化的胜利，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将步入兴旺、发达、文明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我们应该有信心有决心，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以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子孙。

关于从中国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 转变问题（提纲）

（根据录音整理）

李蔡元

学习中共党史的社会主义时期开始时，先来探讨一下革命的转变问题，很有必要。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理解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时，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立即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革命的转变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我国胜利地实现了革命转变的经验，对进一步研究三十年来党的革命斗争经验，对正确理解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即毛泽东思想，都将有所帮助。

一、中国革命转变的历史特点

研究中国的革命转变，应从研究中国革命转变的历史特点入手。这是因为只有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找出该事物发展的特殊发展规律，进而找出一般性的规律。那么，中国革命转变的主要历史特点有哪些方面呢？

第一个主要特点是，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时，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没有横插一个资产阶级的统治时期。这个特点不同于一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国家。例如法国的革命，早在一七九二年八月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但是至今二百多年了，法国仍未出现全国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更不用说直接的革命转变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等较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一些西欧国家，都有类似法国的情况。

第二个主要特点是，中国的革命转变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取得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立了的条件下实现的，这又不同于俄国的革命转变。一九一七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国主义的沙皇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后，列宁就在他的《四月提纲》中宣布：“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页）开始了革命的转变。但是，俄国的革命转变，是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正象列宁当时所指出的：“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了

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同上书）

第三个主要特点是，中国是经过了激烈的国内革命战争，打垮了国内反动派，夺取了全国政权，然后，实现了革命转变。这又不同于俄国的革命转变。俄国是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夺取了全国政权，然后又进行了三年国内革命战争，才使工农政权稳固下来。

第四个主要特点是，中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仍然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统一战线，一直到中国资本家阶级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作为阶级已不再存在了的时候，统一战线的性质才有所变化。这和俄国不同，也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不同，它们在实行革命的转变后，都没有同本国的中等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关系。

研究中国革命转变的这些历史特点，必须联系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历史特点（国情），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时的时代背景等等，进行分析探讨。

二、中国革命转变的准备

中国的革命转变，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能够顺利的实现，是由于在转变前经过了长期准备。

广义地说，中国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着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作准备。早在三十年代，毛主席就指出过：“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卷第254页）又说：“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4页）这表明我们党从来就是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看作是革命两步走的第一步，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看作是在条件成熟时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一九四九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随着人民解放军的继续奋勇前进，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日趋成熟，实行革命转变的措施就需要开始具体化。同年三月五日至十二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了促使全国解放和实施革命转变的一系列的纲领、方针和战略决策。

所谓准备，就是要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毛主席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的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14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在中国，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在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也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反革命政权；同时，建立全国的人民自己的革命政权。在这个条件没有准备好之前，就还根本谈不上革命的转变。

为实现这个条件，我们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曾把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到了乡村，创造了一条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中心又从乡村转到城市同时兼顾乡村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不久，推翻了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政府，经过召开人民政协会议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主要的必要条件就具备了。

第二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本）、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剥削中国人民的旧经济制度，是旧中国反革命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不彻底消灭它，反革命政权就不能彻底推翻，推翻了还有复辟的可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制定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49页）三大经济纲领。这是消灭旧中国经济制度的革命纲领。

尔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把个体经济逐步引向合作化、集体化使之成为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以及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等方针政策。这就是说，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转变的历史特点，只是消灭了旧的经济基础，而不同时建立起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为改造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仍然不能说是准备好了革命转变的条件。

我们在实现革命的转变之前，随着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相继解放，逐步没收官僚资本；全国解放后又迅速地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并立即将它同老解放区的公营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这就不仅在纲领、政策上，而且在实践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准备好了革命转变的又一个必要条件。

第三个必要条件是要作好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610页）。要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立即转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把革命群众的头脑武装起来。

首先，要武装起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使每个党员都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其次，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地向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在二十年代初，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无产阶级必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这是我党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最初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当时在理论上还有缺陷，也不够完整，因为它只是要“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重革命的领导任务，都已经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毛主席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展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他指出：中国民

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4页）。如果用诗的语言来表述党和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关系，那就是“三座大山齐推倒，两重革命一肩担”（《朱德诗选集》第66页）。

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适时地提出：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等等重要的思想理论。

党和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从精神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员和广大的革命群众，使他们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自觉地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是为实行革命转变的一项重要准备。

第四个必要条件是革命干部的准备。我们党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战斗中，在军事战线、政治战线以及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方面，都培育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的战略方针。这正象毛主席后来说的“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一套干部的准备，也是我国革命的转变能够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中国革命转变的标志和过程

关于标志，一般的提法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个提法最早见于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六月的一次讲话，后来“八大”文献和其他中央文件也都用这个提法。这个提法对不对？我认为很对。但是，毛主席还有另一个提法是：“……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见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39页。这段话是毛主席增加的）。

这后一提法的前半句“国民党反革命政府的灭亡”，说明旧中国的反革命政权已经转移；

后半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说明政权的转移并没有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去，而是转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手中来了，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

这比较完整地说明了中国革命转变的两个主要历史特点——即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直接转变和在中国工人阶级掌握了全国政权条件下实现的转变这两个特点。

这也和列宁曾经指出的“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

志”（《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4页）的精神完全一致。

为什么说中国革命转变的标志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呢？最根本的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导方面都起了变化。关于这一点，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一次讲话中论证得很清楚。少奇同志说的大意是：

事物的性质由什么规定？由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社会性质，决定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成为主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主要矛盾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占主导方面。因此，发生了两种变化，即主要矛盾的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

刘少奇同志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第一，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对矛盾的转化作了正确说明。他指出，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同时指出了无产阶级占居矛盾的主导方面；第二，他把中国革命转变的一二两个历史特点与俄国作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起了变化，革命的新时期，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也都相应地起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即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在中国也曾经叫它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家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叫人民民主国家，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当时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尚未建立起来，但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都已在全国占居了绝对优势，所以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已经是属于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社会主义体系的社会。

说政权的转变是革命转变的标志，是否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一切地方、一切方面的主要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呢？党中央回答说：“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39页）。这段话说明，中国由于地大、人多和革命发展不平衡，对一切事情都不应当“一刀切”、“一锅煮”。革命的转变也有一个由城市到农村，由老解放区到新解放区，由内地到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过程。

但也不能因为有个发展过程，就又反过来否认革命转变的标志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正确论断；否认从全局来看，建国后尤其土改完成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不再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这一历史实际。

四、中国革命转变与党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

党的历史任务的确定也是根据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变化而来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应有三条：

第一条，恢复国民经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重点建设；

第二条，将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条，有领导、有计划、有区别、有步骤地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这三条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但就全局来说，则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前提为中心或首要任务。

关于恢复国民经济。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来的。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现代性的工业产值也只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加上连续多年的战争破坏以及人民解放战争还未完全结束，还需要支援等情况，使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财政上也入不敷出。因此，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步就是力争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和平衡国家的财政收支。这场斗争的起步是稳定物价，落脚点是平衡财政收支。为此目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一天，党中央也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方法去保障政务院决定的全部实施。

党和国家在作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重大决策的同时，还采取其它一些措施，如运粮救灾，集中物资力量打击投机资本，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军队参加生产建设，节约开支，核实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征收工作等等。这样，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向稳定，人民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不幸时代遂告结束。

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财政收支的接近平衡和金融物价的趋向稳定，是建国初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这个胜利，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这个胜利，宣告帝国主义者叫喊的“中共无法克服经济上的困难”等等谰言的破产，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称赞。

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二步是在财经状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前进一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此，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讨论通过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规定了获得财经状况基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以及必须做好的八项工作。三个条件中带关键性的是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和合理调整工商业两条。

完成土地改革是解决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主要工作，同时又是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正象《土地改革法》总则上说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

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和斗争，到一九五二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以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新老解放区，大约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六百多亿斤粮食的地租。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中国农民完成的两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改革之一（另一项伟大的改革是尔后完成的农业合作化）。

合理调整工商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其目的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私营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句话，就是要把各种经济成分，经过调整逐步纳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

把各种经济成分纳入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相背驰的，是和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相矛盾的。因此，必然会遇到资本家阶级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抵抗。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利用、限制政策同资本家阶级的反限制的斗争，就成了一定时期内的主要阶级斗争形式。经过调整，又经过“三反”、“五反”的激烈斗争，到一九五二年六月，我们在这一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一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在我国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迫使私营工商业者不得不在日益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管理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在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下，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土地改革的完成，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以及包括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抗美援朝在内的五大运动的全部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获得了发展和进一步的巩固，这就是说，到一九五二年底，我国恢复时期的三项任务都一起胜利完成了。

至于开始的重点建设，当时抓的建设项目不多。农业上抓了治黄（河）、修淮（河）和荆江分洪等水利工程建设。交通运输业上在恢复被长期战争破坏了的铁路运输的同时，重点抓了来睦、成渝和天兰等新线路的建设以及公路、航运等的恢复和建设。工业上首先抓了东北工业的恢复，也抓了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恢复。有些新建或扩建的大型厂矿如：阜新发电厂、哈尔滨亚麻纺织厂、西北第一纺织厂，以及鞍钢的大型轧钢厂、太原重型机器厂、海州露天煤矿等等都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投入生产。至于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等事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都有相应的发展或提高。

至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五大运动的胜利对于下一阶段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得很好，他说：

“一九四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一九五七年在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周总理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这一部分的小结。

五、革命转变和建国头三年的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的无产阶级，可以突破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首次作了证明。中国从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前提，就又一次作了证明。革命前的俄国现代性的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六分之一，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解放前的中国，现代性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约百分之十七左右，文盲占百分之八、九十。两国的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中国则更落后。但却先后在本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需要具备两个最根本的条件：

根本条件之一是，资本主义要有一定水平的发展，有了相当数量的现代无产阶级并组织成了能起先进战士作用的政党；

根本条件之二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了牢固的联盟，争取到革命的领导权。

有了以上两个根本条件，再利用或创造一些其它的有利条件，就可能突破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而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条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也对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第二，要突破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必须利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利用有利于我们的一切国际环境。但这只是个次要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国内的因素。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所以能够实现革命的转变，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的的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软弱，而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援助以及其他国际有利条件，只是个次要的外部因素。国际的支援，只影响我们前进的快一点或慢一点的问题，但它不能决定我们能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第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拿枪的敌人逐渐趋于灭亡，而不拿枪的敌人仍将会同我们进行各种形式的较量。因而必需在一定时期内强化政权作用（包括人民武装的建设），而不能削弱它。还必须把政权的自上而下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支持、监督作用，正确地结合起来；把发挥政权的作用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包括经济规律）正确地结合起来；而绝对不可以认为手里掌握了政权，就什么事情都可以任意施行了。我国恢复时期的任务所以完成得比较顺利，就因为比较注意了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的正确配合这些方面的关系。

第四，俄国和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共产党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区别的政策很重要，以中国建国初期的情况来说，就是要区分城市与乡村，老区、半老区与新区，区分内地与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等等的不同情况而分别对待。不加区别的“一刀切”办法，总是要碰钉子的。在这方面，我们有经验，也有教

训。它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现实意义。

阶级路线和政策十分重要。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页）。

在乡村，不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都要坚持工农联盟。完成土改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都要靠工农联盟。过去，党靠工农联盟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农民这个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发挥作用。因此，党在农村政策和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

当然，巩固工农联盟，不仅仅是党的农村政策，它是党的路线的重要基础，即是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才能巩固和发展。只有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完成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恢复时期的历史任务。

还有个重要政策即保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个重要的法宝。毛主席说：“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9—310页）。

既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又对它采取适当的利用、限制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转变的历史特点所规定的，是我们党采取的赎买政策的一项策略措施。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完全正确。

有人提出，既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统一战线，又说是中国过渡时期的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两者是否存在矛盾呢？我以为并不矛盾，因为所谓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建国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代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矛盾斗争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非得加以解决不可。至于对这种矛盾的解决应采取对抗的形式还是非对抗的形式，是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那要看时间、地点和其他具体条件而定。

第五，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完善，是要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和高度文明的基础上的。象俄国和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突破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而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领导下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尽快地建立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不可甘于落后，安于落后。列宁曾经向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争辩说：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

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692页）

列宁又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64—65页）。

列宁在这里强调的只是能否改变发展的“通常的历史顺序”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问题。而不是不要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建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恰恰相反，列宁是反复强调过要以电气化为动力来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的。

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对发展文教事业都是抓得很紧的，也收到了成效。可惜在后来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只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现了“穷过渡”、“白拉平”等错误指导，并被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等野心家所利用，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破坏。这条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加以认真地总结。

第六，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来的。封建主义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作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之后，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而自行消灭。本来，我们在完成土地制度改革以后，应当在认真地区别封建的糟粕和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开展一场批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清扫封建遗毒的工作。但是，由于当时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这项工作进行得不够有力。以致后来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等阴谋家、野心家利用人们精神上的封建主义枷锁，假借“反资”、“批修”等名义，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吸取的历史教训。

以上六条，可能很不全面。如有不妥，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关于反对高岗、饶漱石 反党阴谋活动的问题

陈 诗 惠

一九五三年，在全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党内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党中央及时察觉并领导全党团结一致地进行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必要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方针、方法是正确的。这是我们党执政后，按照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优良传统进行得比较好的一次党内斗争。今天，在党和人民经历了十年大动乱，吃尽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党内斗争扩大化的苦头之后，回头来研究党同高饶的斗争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促进党的团结，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是有意义有教益的。

（一）高饶事件出现的环境和原因

对高饶事件的出现，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强调或者只讲这是阶级斗争复杂化、尖锐化、深刻化的反映；一种则是强调或者只讲这是由于高岗、饶漱石个人品质坏，把这个事件的产生仅仅归之于个人的罪孽。这都是不够全面的。我认为，考察高饶事件的出现，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这样一个历史变化，从执政党遇到的新问题入手，具体地分析一九五三年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的环境、条件，分析高岗、饶漱石本身思想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以求从中引出比较符合历史情况的结论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要防止工作人员追求升官发财，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在通过民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同样遇到了这个无法回避的新问题。特别是象我们这样一个经过几千年封建制度统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象我们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党员占着很大比重的党，确实遇到了严峻的现实的考验。对于这个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革命胜利前夕就向全党敲了警钟，尖锐地提出：要警惕因为胜利而居功骄傲，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避免重演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执政党面临的问题是清醒的，有预见的。经过恢复时期的整

党、整风，经过“三反”运动，我们绝大多数党员能够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这是很可贵的。但是，也有一些党员由于党执政而握有政治、经济大权，在浓厚的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腐蚀下，以功臣自居的骄傲情绪逐渐发展，平时埋伏着的“升官发财”的欲望膨胀起来，这就造成了政治上腐化蜕变现象的加剧。极少数人包括某些领导干部没有经受住胜利、执政这个新考验，被物资糖弹或精神糖弹所打中，甚至为谋取个人权位而走上破坏党、分裂党的道路。这就是高饶反党事件出现的客观的社会原因。

高饶走上反党道路，还有其主观的内在的因素，他们的错误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高岗、饶漱石过去都曾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但在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就开始表现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而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又不注意改造非无产阶级意识，特别是全国胜利后，以功臣自居，不能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监督，以至他们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包括一些浓厚的封建意识）越来越发展，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使思想上的阴暗面迅速发展，终于一步一步地变为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高岗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主持党在西北地区的领导工作，并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七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工作。在全国解放前后，高岗对他将来的职位考虑很多，曾对人表示：革命胜利后，大概可以管管农业、林业，当个部长。林彪入关后，中央决定他任东北局的书记，并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独揽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新中国成立，他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权力的增大，带来的是权欲的膨胀。高岗对于这些职务渐渐地感到不满足了，他觊觎着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一九四九年秋起，他就破坏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进行了许多分裂党的宗派活动。高岗认为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是他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主要障碍，便到处制造舆论，散布流言蜚语，集中地攻击他们，妄图挑起某些干部对中央的不满。高岗违背党章党纪，实行无原则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私自封官许愿，拿权力和地位来引诱某些干部，借以扩大他的影响，骗取别人的信任。高岗把他所领导的地区、部门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和工具，常常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不尊重党的统一领导。他一再宣扬“东北特殊”、“东北一贯先进”、“东北一贯正确”的论调，在报刊上不适当地夸大、突出他个人的作用，对上报喜不报忧，对下压制民主，实行家长制的统治，不许东北党员向中央揭露东北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调他到中央工作，他认为是“调虎离山”，迟迟不上任，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但不愿意把日常工作的实权交给林枫同志，这件事，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过高岗。高岗背着党中央私自向个别苏共领导人乱谈我们党内问题，搬弄是非，吹嘘自己，贬低中央领导同志，损害中苏团结。此外，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糜烂的，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道德，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这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资产阶级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高岗在道德上的极端堕落，正是他在政治上蜕化的表现之一。

高岗的同盟者饶漱石，一九二五年入党，曾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抗战时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和华中局副书记，一九四二年曾任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早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十年间，就多次进行过夺取个人权力的活动。一九四三年秋，为了夺取新四军的领导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反对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斗争。在发动斗争前，他既不同陈毅同志谈一谈，又不向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中，进行了打击、排挤陈毅同志的宗派活动。他完全错误地加给陈毅同志以所谓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然后又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给中央打电报，诬陷陈毅同志，要求中央另派干部来代替陈毅同志，这样来达到赶走陈毅同志的目的。一九四四年，陈毅同志奉中央电，调到延安。陈毅同志对自己在华中局团结问题上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是有功劳的；还指出黄花塘（指新四军军部驻地）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要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但饶仍策动几个人联名电告中央，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饶漱石就是这样运用旧社会剥削阶级挑拨离间的手段来组织党内斗争，以图达到个人争权夺位的卑鄙目的。一九四九年，他又用欺上瞒下的不正当手段，骗取了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在担任华东局书记期间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如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拒绝放手发动群众，而采取“以特反特”的荒谬政策，甚至提出“变大批反革命干部为我们的干部”的错误主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九五二年底、一九五三初，高岗、饶漱石先后被调到中央工作。高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互相利用，个人野心和权欲把他们结合在一起。饶漱石原来因为工作关系与刘少奇同志比较接近。随着高岗地位的上升，他从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观点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错误地判断毛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已由刘少奇同志转为高岗。他担心再跟刘少奇同志“吃不开”，于是向高岗靠拢。同时，他以为高岗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即将成功，就赶快铤而走险、配合行动。高岗则力图利用饶漱石控制人事大权，想倚重他来扩充势力。从高饶在中央工作这段时间里的共同言行来看，他们确实互相配合，进行了许多反党的阴谋活动。

高饶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三年，还应分析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具体的历史条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进行，党处在阶级关系激烈变化、阶级矛盾相对紧张的时期。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包围还存在；在国内，城乡资产阶级时刻都在向工人阶级向党进行着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性质的，有的是经济性质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他们不但有经济实力，有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联系，而且他们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武器，即几千年剥削制度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思想、剥削阶级作风、阴险狡诈的斗争手腕、腐朽堕落的生活习惯等等，经常地包围着、腐蚀着我们的党。这正如列宁所说的：“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这些东西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并在党的薄弱部分得到传播。

一九五三年，为适应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考虑改革国家体制问题。在小范围内，曾经酝酿、议论过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等职位；毛泽东同志还提出分一线和二线的主张。同时也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当历史转折时期，各级机构需要调整、人事安排需要变动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野心人或野心家就趁机捞权，加紧活动。野心家在平时隐蔽得很好，时机来了才原形毕露。他们平时拿不出借口来，有了一定的政治气候，在关键时刻就伸手，这大概可以算是一个规律，高、饶自不例外。他们自恃对革命有功，认定这是夺权的极好机会。而当时也有一定条件，可以作为他们进攻的借口，那就是党正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思想，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高、饶便急不可待地把他们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发展到了顶点。

（二）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是在一九五三年夏季的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和秋季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中央书记处在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十二月间，逐渐发现了高、饶所进行的反党活动。一九五三年冬，党中央在掌握了高、饶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事实后，下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

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统一党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纠正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思想，批评财政部门某些负责同志近半年来在税收政策等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例如修改后的“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在税收政策方面要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规定，实际上有利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发展。对这个问题，当时财委副主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同志是有一定责任的。本来，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在党内生活中是正常的事情。但高岗、饶漱石不怀好意，别有用心地利用党纠正错误的机会，制造紧张空气，搞过火斗争。他们的目的不仅在于夺取财权，更重要的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他们硬说财政部工作中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与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有关。在会上，高岗等人的发言，以批判薄一波同志为名，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同志曾经讲过的一些话来进行攻击和煽动。了解情况的人一听就知道他们在旁敲侧击，是“明讲薄，暗射刘”。

在会外，他们大肆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曲解中央的政治生活，甚至直接点名道姓，破坏中央的领导威信。他们采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硬把刘少奇同志在某些问题上的个别错误说成是系统错误，把一般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把已经改正或检讨过的问题当成现实的严重问题。比如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和他对富农党员的处理意见，无论从总的精神，从原则上来看，或者从具体处理的方法上来说都是正确的。但他们抓住个别“走了火”的不妥当的语句肆意夸大歪曲，并上纲到是对资产阶级、对富

衣投降的原则高度加以批判。他们还把收集的刘少奇同志的一些讲话或文件批语（如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关于一九四七年土改中发生“左”倾错误问题；关于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问题等等）抄成档案，作为攻击的炮弹。

他们硬说中央有宗派，诬蔑刘少奇同志有“圈圈”，周恩来同志有“摊摊”。他们抓住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拟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大做文章。明明是高岗与安子文同志议论过的“名单”，高、饶却倒打一耙，硬说“名单”来源于刘少奇同志。

“名单”中白纸黑字写着有薄一波同志，也有林彪，但高饶却说“有薄无林”。饶还煽动说，这个“名单”有“圈圈”，财经会议斗了这个“圈圈”中的薄一波同志，以后还要开别的会议斗争“圈圈”中的其他人，到处挑拨离间，妄图制造党内不和。

高岗妄图蒙骗在军队中工作的一些党员干部支持他，蓄意制造和散布了“两党论”、“军党论”的荒谬观点。他居心叵测地把统一的党组织分成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他说什么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命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竭力为他攫取最高领导权位制造理论根据。从这个歪曲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他硬说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要“彻底改组”。他自恃毛主席“信任”他，又自认为组织了“经济内阁”，集中了政务院相当大一部分权力在手，同时还主观地认为六个大区中他大概可以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感到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已相当有把握。因此，活动十分放肆、频繁，甚至不放过组织舞会、请客吃饭等各种机会进行串连、煽动。

当时中央对高饶活动的最终目的还不了解，但已注意到高饶等人的活动有不正常的地方，并采取一些措施，及时纠正了在他们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从而使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针对他们夸大财经工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有明确的态度和结论。毛泽东同志用笔在纸上画图讲几何学，生动形象地对大家说，两点才能连成线，“新税制”问题只是一点，一点就连不成线。前段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不是路线错误。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做结论时也指出：财经工作中的一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针对高饶搞分裂活动，会议强调了团结。毛泽东同志在财经会上讲话中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找各方面的同志谈话，都是讲要团结，要消灭圈圈，削平山头。周恩来同志也强调了团结的意义。

但高岗对此置若罔闻。在财经会后，他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有计划地进行“游说”，除了大量散布所谓“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党的历史应当重新估计”等等反动谬论外，还用夸大歪曲甚至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把私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补充人选传播出去，在一些高级干部中鼓吹他的“改组”党和国家的领导计划，妄图私下拼凑他篡党夺权的班底。高岗在杭州曾与林彪共同议论过“中央人选”的名单。

同一时期，饶漱石与高岗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在财经会议尚未结束时，他不经中央任何人预先知道和同意，捏造各种借口，发动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的蛮横无理

斗争。他故意将安子文同志写过一个“名单”、受过处分的事传播出去，他攻击安子文同志对财经会议有抵触，以此影射刘少奇同志对财经会议的态度有问题，以积极配合、支持、参加高岗分裂活动。然后又在九、十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问题为名，把锋芒指向刘少奇同志，导演了一出“讨安倒刘”的闹剧。在会上，原东北局组织部长的发言是早有酝酿和准备的，他批评中组部使用干部“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他表面上是讲安子文同志的问题，实际上是谈刘少奇同志对某些问题处理的意见。原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的发言则利用整党问题向中央进攻。他们在会内会外进行煽动、要挟，妄图全面夺取人事大权，改组中组部的领导，并预谋点出刘少奇同志的名字，实行公开“摊牌”。

中央为制止饶漱石的活动，立即停止大会，专门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揭露、批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同志出席了领导小组会议，并讲了话，着重强调全党的团结对于贯彻总路线的意义。在十月二十七日的闭幕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肯定过去中组部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成绩很大，并再次强调党的团结。大会责成参加会议的每个代表在全党各个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强调团结的指示。中央的措施打破了饶漱石利用组工会议分裂党的计划。

但直到此时，高饶对自己的错误仍不悔悟。高岗从南方回京后，更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活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领导工作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他曾对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党中央应设副主席，由谁担任呢？“你一个、我一个。”他还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就是说要由他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从而彻底暴露了他的狂妄野心。他完全错估了形势。这时，许多听过他的反党宣传的同志已陆续向中央揭发了他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掌握情况后，也做过一些调查，主动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一次，毛泽东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话时，风趣地谈到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然后询问、调查了有关情况。中央书记处经过调查，掌握情况后，在高、饶以外的全体在京的中央委员的一致支持下，坚决地制止了高饶反党的阴谋活动。

综上所述，从财经会议、高岗南下、组工会议到十二月间，高饶确实互相配合有系统地搞了大量分裂党的活动。他们攻击的目标，散布的言论，活动的方式，都是一致的。他们完全违背了党的立场、原则和纪律，彻底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客和野心家。

从政治上说，高、饶企图是从党中央和政府中排挤刘少奇、周恩来同志，首先控制第一线的实权，架空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他们多年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不在中央时，政治局一直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这就是高饶特别集中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他们狂妄地提出“改组”中央领导的计划，公然要求由自己取而代之，简直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从权欲熏心这一点来说，从嗜权和夺权的露骨程度来

说，高、饶是把他们的野心和盘托出，而不作任何遮掩了。联系后来林彪、“四人帮”进行的反革命篡党夺权活动，可以看出：正是一个“权”字，把一切野心家阴谋活动的最反动本质暴露无遗了。

从活动方法看，高岗和饶漱石采用的是剥削阶级通常施展的阴谋手法。他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打着拥护党、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把自己伪装起来，偷偷摸摸地进行反党反中央的破坏活动。他们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自知无理，所以从来不在中央的会议上公开地正式地提出意见，却在背地里捏造材料，歪曲事实，把这样那样夸大的、虚构的所谓“错误”，加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头上，并向不少人传播。在毛泽东同志提出考虑增加政治局委员名额的问题后，在一定范围酝酿这事，本属党内正常生活范围，但他们却造谣、栽赃，一口咬定安子文同志写“名单”是刘少奇同志授意的。实际上，刘少奇同志根本不知道安子文同志和高岗议论过“名单”这件事。同时，他们还将“名单”在会内会外、从北到南广为散发。没有的东西，他们尚要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一旦他们抓到某些同志在工作中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那就更要以“正确路线”代表的姿态出现，狠狠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在组织上，高岗和饶漱石是搞宗派活动的。一切野心家都要搞派别，垒“山头”，拼凑自己的势力。他们不惜采用封建阶级纵横捭阖的手段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或者先打后拉，使人就范，落入圈套。饶漱石曾说过，他对付人的办法是“先小人，后君子”。所谓“先小人”，就是找机会给对方以狠狠的打击，从而制服对方；所谓“后君子”，就是把已经“制服”了的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这完全是剥削阶级官场中的丑恶权术。

这次揭露、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建国以后党内发生的一次重大斗争。高饶都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们的罪恶活动一无纲领，二无政策。就是说，他们没有提出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对抗的路线和政纲；没有从理论上提出对于革命形势、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任务等另一套政治主张；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单独形成一套政策、制度，因此同他们的这场斗争说不上是什么政治路线斗争。当然，他们为了分裂党，曾经散布过“军党论”、“两党论”的荒谬观点。同时，由于他们搞分裂活动，破坏了党的团结，影响和妨碍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应该坚决制止和斗争。从组织上说，他们搞宗派是违背了党的组织路线的。但毕竟他们不是因为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发生分歧而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路线、理论纲领。所以，这不是一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前党的正式决议和文件也没有把高饶事件说成是路线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同志在个别场合中讲的一些不妥当的话，大做文章，为的是要借高饶问题以打击一大批老干部。我认为，党内斗争是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实事求是。这次斗争，应该说是一场反对野心家分裂党的阴谋、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斗争。当然，对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活动斗争的情况

高岗、饶漱石进行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危害着党的事业，为了唤起全党同志维护团结，反对分裂，政治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对高饶进行揭发、批判和清算，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团结了绝大多数干部，包括所有犯错误的干部。

首先是在中央高级干部中进行揭发、批判。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高岗他们在“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会上，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并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七届四中全会讨论。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因休假未出席会议，刘少奇同志受政治局委托，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①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局的工作；②关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③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会上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位同志作了重要发言。经过详细讨论，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决议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党在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巩固的、健全的，并依靠这种团结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也只有依靠这种团结，才能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决议同时分析了存在着威胁党的团结的因素，指出：国内外的敌人正企图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我们党还采取着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党很大，党内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同时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严重的是执政后党内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为胜利冲昏头脑，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四中全会向全党敲起警钟，号召及时消灭这种危险因素，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决议总结党内斗争经验，规定了六条具体措施，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以高度的自觉来维护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决议还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为此，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同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倾向展开坚决的斗争。决议规定对犯错误的党员，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针。对于那种有意识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

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它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虽具有严重缺点和犯有严重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愿意改正或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

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揭露和反对了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保卫了党中央，捍卫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党曾向高岗指出他错误的严重性，要其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作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在全会上虽然高岗作了表面的检讨，饶漱石也作了一般的检查，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悔过的表示。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在这两个座谈会上，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饶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同志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揭露了高岗分裂党、妄图夺取中央领导权力的主要事实，分析了高岗走上反党道路的根源，指出了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同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揭露了饶漱石伪君子、野心家的特点和他配合高岗搞分裂活动的事实，指出了应吸取的教训。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有四十三人发言，揭发了他的罪行。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拒绝向党交待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反而用自杀（未遂）来抗拒对他的揭露和批评。他在二月二十四日的检讨中，仅仅承认反对中央个别领导同志，进行宗派活动和非法活动，并轻描淡写地说这些错误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等等，以此掩盖他已经进行的分裂党以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全部阴谋活动。他并以一时思想糊涂企图毁灭自己为词，诡辩他在阴谋暴露后更加仇恨党、仇恨同志们的绝望的自杀行为。尽管四中全会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高岗仍拒绝了党的教育和挽救，终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自杀身死。在饶漱石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有各大区及中央各部同志六十六人参加会议，饶在座谈会上做了初步检讨，但避重就轻，实行抵赖。会后，饶又作过书面检讨，虽承认了一些别人已揭发的事实，但还对许多重要关键问题避而不谈。

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一九五四年四月，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传达报告。会议严肃地、尖锐地揭发、批判了高岗的反党活动，也揭发批评了跟着高岗犯了错误的一些同志的严重错误。同月，华东局召开了党代表会议；五、六月间，山东分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六月，上海市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八月，召开了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饶漱石的反党活动，批评了跟着饶漱石犯了严重错误的一些同志的问题。上述会议对改进东北、华东党组织的工作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中全会后，二月十二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干部和党员中传达和组织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公报中公布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主要内容。中央政治局把揭露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问题首先向全党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传达。八月十七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又向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进行了传达，并通知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深入地学习、研究四中全会文件，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对高饶的反党阴谋分裂活动表示极大愤慨，提高了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党中央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陈云同志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专题报告。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以董必武同志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上述三项决议和选出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

党同高饶斗争的实践证明，这次党内斗争进行得比较成功。考察、检验一场党内斗争是否进行得比较好，首先要看它是否确有必要，是否客观存在着非解决不可的事关重大的党内矛盾。不夸大不缩小地揭露和解决党内出现的矛盾，这是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最起码的唯物主义要求，是正确进行这一斗争的前提。我们党反对高饶的斗争，是从高岗、饶漱石确实进行了反党阴谋活动的事实出发的，是在他们的活动已使党受到危害并面临分裂危险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这场斗争是有的放矢的，确有其事，确有其人的，而不是无中生有，人为制造的。

其次，我们反对高饶阴谋活动的斗争所以比较成功，还在于这次斗争较好地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传统，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整个斗争有领导、有秩序、有节制，既坚决又谨慎，既对原则问题不含糊敷衍，又不过分伤害同志，没有犯扩大化的错误。总的说，发展是健康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这次党内斗争始终比较注重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性质和范围，采取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斗争方法和步骤。中央发现问题比较及时，当书记处发现高饶分裂党的活动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亲自找人谈话，分头作调查，做工作，询问情况，弄清事实真相。在中央抓住高岗、饶漱石篡党夺权的本质问题后，毫不犹豫，立即揭露，坚决制止，使之不能再传播影响，贻害更多的人。整个斗争的发展进程比较稳妥，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逐级进行的；着重思想教育，抓住执政后较普遍存在的骄傲情绪，对团结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提高全党政治思想觉悟。在当时，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也不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震动都很大，教育都很深。这次党内斗争既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严肃地处理了高岗和饶漱石问题，又对那些受高、饶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参加过反党活动的同志，根据错误事实，认识程度

度，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弄清思想的基础上，只对其中极少数同志进行了组织处分，同时给他们另行安排了工作。这些同志以后都受到了锻炼，吸取了教训，为人民做了很有益的工作。这次党内斗争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有些思想批判还可以做得更细致一些，对有些同志的组织处理还可以轻一些，对个别人降职降薪的幅度也还可以稍小一点，这些问题是极次要的方面，仍应予以重视。不过，总的来说，这次党内斗争是有成效的，既充分揭发了高岗、饶漱石，又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使全党受到极大教育，增强了党的团结，并能适时地把全党的积极性调动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上来，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实现。但可惜，这种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的经验，以后没能始终注意运用和发展，对比后来的沉痛教训，更觉这些经验的可贵。我们应该积极地为恢复和发扬党内生活的优良传统而努力。

(四) 经验教训

高饶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时光的流逝，实践的检验，可以使人们更能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曾经发生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都曾对这次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作过深刻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如在政治上提出要防止野心家篡权；在思想上强调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反对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反对家长作风和独断专行，对任何党员都要实行经常的、严格的、系统的监督等等，所以这些至今仍不失其思想光辉。

高饶事件从反面教育我们，对于一个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必须时刻警惕和反对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当我们比较谦虚谨慎、比较冷静时，党的事业的发展就顺利些，前进就快些。相反，如果骄傲自满，就会碰壁、吃亏，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党处于执政的地位，人民信赖和感谢我们，各式各样的人们也出来捧场，这就有了滋生居功自傲情绪的某种客观条件。而由于手中有权，一些党员干部中的这种情绪就可能发展，甚至有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危险性。因此，防骄反骄就不能不成为执政党建设上的重大课题之一。高、饶走上反党道路的因素之一是骄傲情绪的恶性发展，而他们非法活动之所以曾有一定市场，也是和部分干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骄傲情绪有关的。由于这种情绪的滋长，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使自由主义得以发展，给了高、饶这样的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四中全会后，党内大力克服这种危险情绪，许多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联系工作、思想实际，自觉地作了检查，能够戒骄戒躁、齐心协力，很快促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正如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所说：“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也就是开始骄傲了，所以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走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教训是深刻的。

党同高饶反党的斗争极其深刻地教育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增强党的团结而奋斗。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每个党员的神圣职责。高、饶所进行的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

动，使我们党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深刻地总结了党同高饶作斗争的经验，把巩固党的统一，维护党的团结提高到保护党的生命的原则高度，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增强了组织观念，对党的建设的学说也是一个新的贡献。今天在经历了林彪、“四人帮”对党空前的大分裂、大破坏之后，我们更加体会到党的团结比什么都宝贵，党的团结确实是党的生命。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还向我们揭示：在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情况下，要特别警惕和防止大小野心家的出现，要善于识别和抵制各种阴谋活动。由于我们党在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又有严密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野心的人一般不敢亮出自己的旗号进行活动，而总是借助于剥削阶级的政客手腕，施展阴谋诡计，搞分裂，搞暗算。这不仅为高饶事件所证明，而且为以后林彪、“四人帮”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的罪恶活动所证实；不仅在中共党史上重复地出现，而且在联共党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可见，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特别是经过长期封建统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更应注意解决这个问题。针对高饶的阴谋活动，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尖锐地指出：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当时，还强调要加强马列主义学习，学会区别现象与本质，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对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应当经常保持一个距离，千万不要被野心家的“鬼”缠住。这些对于我们健全党内生活，识别阴谋活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同时，还应从不断改革、完善制度上来考虑问题，纠正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等弊病，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使人民群众真正能够行使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另外，附带说几句关于饶漱石的简单情况：因为发现他有包庇反革命等严重政治问题，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开除其党籍。此后，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公安部按照法律程序逮捕了饶漱石。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判饶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力十年。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予以假释。一九六七年重新收监审查。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因患中毒性肺炎死亡。）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纲)

李葵元

(根据录音整理)

我们在讨论了革命转变问题以后，再来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很有必要。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到五六年，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有了新的发展。研究党的这段历史必须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这条总路线，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即对于我们今天实现四化的伟大事业也有现实意义。

(一)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及教育宣传工作

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1952年末，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将要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毛泽东主席说：“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8页）

关于列宁的过渡时期的学说，其基本要点可概括为：一、“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二、“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列宁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列举了五种经济形态，即：“（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在五种经济形态中，最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三、“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四、“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要“引导动摇分子和不

稳定分子，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见《列宁选集》第三卷和第四卷）

我党公开提出“过渡时期”和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是一九五三年《人民日报》的“五一”社论。社论说：“我国新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化的过渡时期。逐步实现我国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对我国国民经济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同年五月二日，中国工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工会“七大”致祝词，又向全国工人发出“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的号召。六月，党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做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全面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判了背离总路线的一些错误观点。

以上是过渡时期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理论根据和简略情况。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为了统一认识和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953年6月开始，党向党团员和人民群众进行了关于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广泛深入地动员工作。

6月至8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批示，阐述了总路线的内容。总理在结论中说，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指出并已经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建国以后，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我们的各项工作，不断取得了很大胜利。8月2日，毛主席又在全国财经会上作了《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讲话，严肃批评了干部思想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执行的重大意义，又作了说明。

财经会议之后，中央又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都讲了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意义。周总理9月29日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治报告。报告说：最近从全国财经会议以来，毛主席根据二中全会精神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并且要我们把这个问题在党内外都明确起来，逐步把它具体化。接着，他分析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问题，指出：革命虽然分为两个阶段，但方向却是一个。因此，一旦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它就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周总理又说，对于这一点，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两种模糊想法：一种认为革命胜利后大概要停顿一个时期；再一种想法，以为胜利以后就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总理说，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既不能等待，不能停顿不前，也不能冒进，不能“左”倾激进，而是依据中国的情况，要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周总理又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中间没有一个真空时间。他号召大家必须认识清楚，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搞别的东西。

六月间青年团召开了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有讲话，也都讲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任务，就是逐步实现工业化、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等总路线的精神。

朱总司令在“八一”建军节二十六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也讲了这些内容。

九月八日到十一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周总理的报告时，他作了攻击性的发言。在

九月下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二十七次会议时，梁漱溟列席了会议，又作了攻击性的发言。后来毛主席、周总理先后在发言中批评了梁漱溟。指出梁的反动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应当在全党和全国进行讨论，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搞清楚。

十月十日至十六日，中央召开了全国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对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党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讲话中又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观点，同时提出了“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的著名论断。这个科学论断当时在干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于十二月十六日由中共中央通过发布。这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贯彻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会议。

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中央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几年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确定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在十一月间，还开了一个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向大会作了重要报告，对工商界的人士阐明了党和政府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会上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一致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决议》。

十二月，中宣部制定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发布以后更进一步地深入组织大家学习，开展了更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

总路线的教育宣传工作，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群众，到工商界和各界人士。这样，就逐步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并把贯彻总路线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活动。

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宪法。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又写到宪法中去了。使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成为保障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推行的国家大法。

三、经过教育、宣传活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识中明确了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就进入了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就是说，建国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是个统一的概念，是一个时期，而不是两个概念、两个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的新民主主义即过渡时期，在性质上和发展阶段上要同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加以区别。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还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历史范畴。时间和历史条件变了，新民主主义的含义也相应地有所发展、有所变化了。

第二，明确了我国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

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学习和宣传提纲）。又因为我国过渡时期，虽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和大量小生产的非社会主义的成分，但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占居领导地位。所以，我国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可以采取不流血的和平过渡的方式方法。也就是说，我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不是经过推翻现存的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由已经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上而下地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

第三，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又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去开展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学习和宣传提纲）。毛主席解释这个“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两种私有制的改变——“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发展生产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9页）。毛主席是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总路线的主体即中心任务来解释这个实质的。

第四，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之后，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进行和平改造，也就是在我国条件下对资本家阶级实行赎买。这并不是取消对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只是改变了斗争方式。毛主席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3页）。也就是说一方面同资本家阶级作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的团结他们，同他们保持统一战线。“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9—310页）。

第五，明确了对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的改造，不能采取剥夺的方法，只能把农民、手工业者一步一步地引向走合作化——集体化经济的道路。明确了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条件下可以采取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到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等一些不同阶段，逐步地由部分质变达到全部质变，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以上几个明确，当时是曾经达到了的。但是，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没赶上那时的教育、宣传活动，他们对这些原则问题很模糊，有些老同志，二十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也渐渐地淡忘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有些问题被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之流搞得是非颠倒。所以，有些曾经明确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模糊起来。为此，我们党史工作者，有责任进行重新学习并重作教育、宣传工作。

(二)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是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开展起来的。因为“一五”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一五”计划在体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上，表现了自己的三个主要特点，即：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和互相促进，并以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

第二，不论生产和建设，经济和文化，都是在原来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在比较充分地利用、改造原有的基础的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地实施的；

第三，是在兼顾建设和生活，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改善物质生活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二、“一五”计划早在一九五一年就着手编制。五三年就边编制边开始实施，积累经验加以修改和补充。于一九五五年二月编制完毕，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基本通过。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化，逐步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正确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建设方面，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工程为重点。五年内工业建设大中型项目共694个，投资二百四十八亿五千万，占整个基建投资的58.2%。计划新建和扩建钢铁、煤炭、电力、石油、采矿、机械、有色金属工业以及拖拉机、汽车、飞机制造等大型企业。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推动农业、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将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强大的物资基础。

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32亿6千万元，并采取许多措施，发放农贷，调整农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

计划还规定五年内用于文化教育、卫生部门的基本建设经费为142亿7千万元，占总投资的18.6%。

为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规定五年内，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33%，使农民的购买力提高将近一倍。

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计划要求，一九五七年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总农户的三分之一左右，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人数达到210万人，较1952年增加8.6倍。把私营工业的大部分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大部分私营的现代工业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把一半以上的私营商业转变为各种形

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商业。

这个“一五”计划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指导下和毛主席的关切下，由周总理和陈云、李富春同志直接负责领导以及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编制出来的。1952年8月中旬，周总理率领有陈云、李富春同志参加的代表团到苏联去会谈。“一五”计划得到了苏联的很大援助，如工业，原计划规定每年增长16%，斯大林同志认为高了一些，定为14%比较好。同时他还认为五年计划争取四年完成好，一定要留有后备等。这些意见我们都采纳了。同时也得到苏联国家计委的大力帮助。

三、“一五”计划在实施中，由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动员工作进行得比较深入，所以进展比较迅速，也比较顺利。虽然在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过冒进和保守两种偏向，也发生过其他方面的一些缺点、错误，但都是属于具体工作的问题，从路线、方针、政策上看，基本上或者说大体上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曾发生过的不同认识的批评和思想斗争，也是属于具体工作中的批评或自我批评，那时还并没有形成为路线斗争。

从建设的成就方面看，1953、54两年，就取得巨大进展。1953年工业总产值达447亿元，比52年增长了30.2%，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7.2%。1954年工业总产值达519亿7千万元，比53年增长17%，占工业总产值的52%。标志着工业化程度的现代工业，1953年总产值达288亿1千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4.5%；1954年总产值达339亿8千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65.4%。1955年，特别是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工业的发展步伐更快一些。到了1956年年底，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达到了586亿元，钢产量达到447万吨，都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57年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四年总共达到411亿元，接近五年计划的要求指标，大批新建和扩建企业先后投入生产。新兴工业部门大批出现，新建或改建的工业城市也比较有计划。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5%，生产资料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8.4%。从1953到56年仅仅四年间总起来看，农业增长了24.8%，平均每年递增4.5%，工业生产增长了128.6%，平均每年递增18%，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也有明显提高。职工工资，每年递增7.4%，农民收入平均递增5.1%。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这样，除少数几个项目外，实现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预期目标，也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实践验证，当时党对建设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国家对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来说也是大体上正确的，但也存在着某些缺点错误，主要是从1955和1956两年在一些环节上有些要求过急，有些冒进。拿1956年的情况看，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职工人数的增加也多了一些，一部分职工的工资也增长得多了一些，等等。因此，在一定时间内造成了物资供应紧张，财政超支，动用了库存的物资贮备。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方面，也照搬得多了一些。在建设的整体规划和全局部署上，也存在着不完全适合我国特点的一些缺点。这些，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两篇文章中和周总理在1956年“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以及1957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指出来了，有关的数字可以查看文件，就不必在这里列举了。

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来看。

农业、手工业的改造,从1953年到55年5月,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贯彻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顺序前进、逐步过渡等党的正确指导方针。以对农业改造为例,1952年全国的初级社只有3634个,到53年发展到14000多个,54年发展到10万个左右,年年在逐步前进,1955年春,从54年的10万个社、发展到67万个,步子就迈得大了一些,尤其是浙江和河北省的一部分地区,发展得过急过猛。因此,党中央于1955年1月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经过整顿,收缩了两万个社,剩下65万个社还是巩固下来了,问题还不太严重。但是从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手工业的改造高潮起,到56年底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全国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6%,其中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由1955年底的4%,猛增到占总农户的88%。不仅初级合作社,连高级社也一步完成,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这样快的运动发展情况,并不符合毛主席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由点到面,稳步前进,分期分批地发展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事实上,从1949年就已经在解放的城市中开始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一经解放,国家商业部门就着手对私营工业企业开展收购商品的业务,那就是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1950年起,收购失去了主要地位,加工订货则逐年发展。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来之后,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才被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环节。53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只有一千多家左右,到了1955年6月底,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增加到二千多家。是逐步发展的。但那时,扩展公私合营,是一个一个地进行的。这出现了合营企业与未参加合营企业的矛盾,因为加工订货的任务,主要被公私合营企业所占有;而未合营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则得不到或很少得到加工订货的任务,机器不能开工,工资也就发不出去。有的地方,工人带着资本家向当地政府请愿,形势相当紧张。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党采取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方式。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生产上有利于贯彻国家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的方针,有利于对整个行业在生产上进行直接计划。因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也是正确的。党在1955年10月间,号召全国资本家接受按行业公私合营的方针。在党的号召之下,在全国农业和手工业出现合作化的高潮的影响之下,在工人群众的积极推动下,1956年1月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56年底,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与此同时,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了合作社、合作小组,或转成国营企业,也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从1956年1月出现合营高潮到年底,仅仅一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子也走得过分快了一些。

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严重的限制反限制、改造和抗拒改造的阶级斗争。1952年三反、五反斗争,1955年到56年的实行公私合营时,某些资本家抽逃资金,和以停产歇业对抗改造,甚至妄图“合公营私”之间的斗争,表现的斗争形式虽然不同,但错综复杂性却是一样的。这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根据每个时期的情况,采取了对

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

(三)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定性胜利 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

1956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主要指标四年完成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定性胜利。对这个胜利如何正确地评定它？有哪些应当吸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这一胜利的意义，当时，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已有评定或重要的评议。党中央决议文件上的正式评定是：

“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第二段）。

“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上决议的第三段）。

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评议有许多。这里只选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的评议作代表：

一、毛主席的重要评议是：“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八大”开幕词）。

二、周总理的重要评议是：“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中，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1957年6月2日在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报告）。

三、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评议是：“现在除了边疆地区以外，我们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取得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四、陈云同志的重要评议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在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已经成为唯一重要的经济形式。但大量的原来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然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

“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目前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错误是：（一）手工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过多地实行了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而这是不利于手工业的经营的。因此，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发生了比自营时候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一部分服务性的手工业在合并经营的条件下，对于居民和手工业者自己都发生了许多不便。（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高潮中也发生了一些盲目合并的现象，同手工业的盲目合并产生了类似的问题。（三）农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所有这些错误，都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需要继续纠正”（在“八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以上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评定或评议，集中地说明了：

第一，那时期的党的路线大体上是正确的，胜利是伟大的，但工作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部的、暂时性的缺点、错误；

第二，由于总路线的胜利贯彻，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它还不完善，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还需要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来的一些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还需要抓紧处理和正确的解决它们。

这些，本来是历史地正确地评定或评议。但尔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被林彪、“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之流篡改、歪曲了历史，搞的是非颠倒，非常混乱。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又对这段历史重新作了估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同志，在他们的报告或发言中都曾多次有所评论。只选两条有代表性的录之如下：

一是华国锋同志对建设成绩的评价，他说：“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卓越领导下，我们在胜利开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很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有相当水平的工业——农业国家。我国国民经济在这段时间里的发展速度，不但为旧中国所望尘莫及，也高出于同时期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七九年六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叶剑英同志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他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提出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设想。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方针。我们在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在农业合作化的伟大

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深刻了解我国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在土地改革后要求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领导我们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等一系列过渡形式，认真执行自愿互利和典型示范的原则，使广大农民比较自然地、顺利地逐步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大规模的、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中，我们避免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而且正确地实行了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方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依据马列主义理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评定和评论作指导思想，回顾建国后七年的历史实践，我提出以下几条历史经验教训，作同志们研究这段历史的参考：

第一，我认为，1952年冬至53年春，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我国已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基本上适时的。所谓适时，就是说适应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有了提出来的主客观条件。

前面讲过，一九五三年六月周总理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曾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指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但是当时并未明确指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我国就进入过渡时期，也没有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为时机还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共同纲领》上也未明确提出，仍然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为什么呢？周总理在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中曾有一段说明，他说：“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共同纲领》的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

我们说，53年初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是适时的，主要是因为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党内外对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客观真理，已在实践中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同时，三年革命实践也为这一命题的提出创造了前提，即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②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国政权已经巩固了；③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主要是新区土改）已在中国大陆上基本完成。有了这三个前提，明确提出过渡时期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就不会感到太突然，就会容易接受。

为什么在适时前面加上“基本”二字而不说是完全适时呢？因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对土改完成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仍待批判和肃清的严重历史意义，当时还认识不够。因而在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宣传工作中，只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一面，却忽视了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清扫封建主义遗毒的另一面。这正象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

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量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因此，我们在肯定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正确的、适时的这一历史经验的同时，还需要看到这些不足的地方，以便吸取教训。

第二，我以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内容、实质，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以及贯彻这条路线的方针、方法、步骤，大体上都是正确的。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逐步实行一化三改；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是要在中国完全消灭城乡剥削制度建立起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方针是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即和平改造；对农业、手工业是引向合作化、集体化；方法、步骤是建设和改造并举；在改造方面实行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过渡形式逐步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我们绝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4页）。又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10页）。

列宁也讲过多次同样意思的话而且更详细（参看列宁《论粮食税》一文）。同时列宁还强调：“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9页）。

这里，马、恩和列宁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家阶级，又应如何正确地对待农民小生产者，以及应把发展社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讲得很好，也很重要。

依据马列主义这些根本原理和二十多年以来的实践来进行检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实质、目标以及方针、方法、步骤，直到今天我认为仍然都是大体上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又是符合中国情况的。这一点应当首先肯定。

但遗憾的是，党在坚持了正确路线的同时，对原来规定的那些正确的方法、步骤，未能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到底。例如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1955年5月到56年秋，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国六十五万个社的基础上一下子完成了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基本上的合作化。由于发展过快，有的地区就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也未能把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等正确方针贯彻到底，而犯了“一刀切”、“一锅煮”的错误。又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1956年以“铺天盖地”而来的形势完成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也难免工作中有些粗糙，把不应合并的一些小企业也混在一起实行了合并。这些缺点、错误，在当时虽然还只是次要的局部性的，但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以利于吸取历史教训。

第三，我以为，党对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任务所做的阶级分析，以及阶级力量的部署，是正确的。

总的力量部署是，由已经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行从上而下的领导，并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来实现这个历史任务。

在工商业战线上（包括工业建设和对私资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及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建设，逐步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

在农业战线上（包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建设），是依靠贫农和新老两部分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并尽可能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营的工商企业，划分大、中、小区别对待，对工业和商业区别对待，对正常经营的商业和投机商业区别对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全国施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以上这些，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战略策略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而且有新的发展。

但从那段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在施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某些环节上，发生过“左”的偏向，有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界限（例如批判胡风）。对资改造运动的后期（1956年），在对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的经营管理经验，也发生过不够重视的某些偏向。

第四，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和人民政府对外资的处理上，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我认为正确的，处理得很好。这项工作开始得较早，1950年就开始了。但为慎重起见，步子迈得很稳，直到1962年才完成。这是在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同时，对英、美、法等国当时还在中国境内经营的工矿金融和商业企业，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对于外资企业，首先是取消它们的在华特权，并要它们服从中国政府的法律；接着便用“征用”、“代管”和“转让”等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中“转让”是主要的形式），使其转变为中国的企业。解决了外资在华企业的问题，标志着旧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被否定。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是必需的，正确的。至于后来1979年我国制定并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便吸收外资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正确措施。切不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正确措施而回过头去否定当时处理外资的正确性及其历史意义。

第五，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已是全国执政的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否保持并得到了发扬，必然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否顺利发展。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认为从全局看，那时，我们党坚持了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那时，党内民主集中制也是比较正常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能坚持从实际出发，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是主要的，占第一位的。至于具体工作中发生的“左”或右的特别是“左”的偏向，在当时来说还只是次要的局部的东西。

我提出的这五条历史经验教训够不够？正确不正确？分寸如何？都请同志们评议。错了的，请批评指正！

农业合作化历史几个问题的研究

许永杰

六十年代初，我们教研室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部交给的编写《福建农业合作化历史》的任务。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集中并查阅了福建农业合作化的大量历史资料，写出了个十四万字左右的史稿，印发省委领导和有关部门审阅。现在，我想从福建省合作化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农业合作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关于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问题

福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在紧接着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不停顿地进行。1949年8、9月间全省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减租的斗争，于1950年6月开始土改试点，同年秋全面展开，到1951年底，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由于全省土地改革分为三批进行，在第一批完成土改的地方，就着手组织互助组，所以还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农业生产互助组就有了初步的发展。1951年春开始在62个完成土改的重点乡中举办了154个重点互助组，到1951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时，全省已有89,300个互助组（其中一部分常年互助组），入组户数达346,241户，占当时全省总农户的12.5%。1951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以草案的形式下达，在《决议》（草案）的指引下，在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的基础上，1952年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生产互助组运动。这一年，已有46.65%的农户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其中有18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259户，占总农户的0.01%。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土地改革以后，并没有停顿、间歇，而是立即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这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决定“趁热打铁”的方针。

土地改革后，要不要“趁热打铁”搞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这是一个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在当时，就有一种所谓“保证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的“四大自由”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企图保留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的现状，不同意党采取的“趁热打铁”的方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解决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广大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土地改革基本上是按人口平分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而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动，

允许他占有比贫下中农较多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这样，土地改革之后，贫下中农和中农在实际的经济地位仍有差别，耕畜、农具占有的差别就更大一些，很多贫雇农没有耕畜和大农具，即使有也是残缺不全、破烂不堪。因此，占农村人口60%——70%的贫下中农在生活上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许多困难。据土改完成较早的闽侯专区调查统计，1951年春耕时，有30%左右的农户缺口粮，其他如耕牛、种子、农具、肥料等等不足的困难更大。他们为了克服生产上的困难，摆脱生活上的贫困，迫切要求组织起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的：“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①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个体经济一片汪洋大海，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但这种分散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经营小块土地）、落后的（使用古老的生产工具，依靠人力畜力耕作）、私有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小农经济是很不稳定的，许多贫下中农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或遭到天灾病祸而成为困难户。对此，国家虽然年年发放救济粮款和生产贷款，帮助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许多人难免要陷于贫困和破产。而少数富裕农民则有着强烈的“单干发家、剥削致富”的愿望，总想凭借较为优越的经济条件去剥削他人，使自己成为新的富农。据长乐县龙门乡调查，国家发放的农贷：1951年几百元，52年三千多元，53年五千多元。但到1953年秋收前，该乡755户中有近300户借高利贷，57户卖土地，100多户放高利贷或买田。列宁在苏联农业合作化以前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②土地改革后面临着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威胁，如果不“趁热打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就会使绝大多数农民重遭残酷的剥削和奴役。正如恩格斯早就警告过的：“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③

从上可见，农民在推翻封建地主的土地制度之后，从小私有者这个特点出发，想在分得的土地上发家致富，所以有着极大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从劳动者这个特点出发，则有着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不可避免地产生着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党为着帮助广大农民克服困难，避免两极分化，采取了“趁热打铁”的方针，及时地鼓励贫下中农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互助合作道路，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但是现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也有的同志认为，土地改革刚把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紧接着又搞互助合作运动，个体经济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又变革了生产关系，这不是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了吗？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一条客观的经济规律。生产关系如果变得过急过快，真的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必然会妨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改革使许多贫苦农民得到了祖宗几代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热烈庆贺土地还家，如果互助合作运动一下子就把农民刚分得的土地变为公有，那他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肯定会破坏生产力的。但是，我们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搞起来的互助合作运动，开始两三年主要还是

互助组的形式。这种劳动组织并不触动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又是在农民固有的变工互助习惯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它一方面能够互通有无，帮助解决单干难以克服的生产生活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实行集体劳动，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生产和收入，所以土地改革后的个体农民是很乐于接受互助组这种形式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素是所有制，当时发动的互助组运动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所以也不存在生产关系变得过急过快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正确与否的争论问题。过去曾经有一种说法，农业必须先机械化，才能集体化。我们农业合作化成功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现在又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农业还没有机械化以前，就实现集体化，是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同志1955年在总结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时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④我认为这是符合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的。首先，我们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很薄弱，土地改革后还不能生产拖拉机和机器来武装农业。象我们福建原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工业的省分，如果要等到农业机械化后才搞合作化，那就更是遥远的事情了。其次，是小农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低，积累有限，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就是国家有机器供应他也买不起。再次，前面说的个体经济分散经营，一家几亩地东一块西一块，很难用机器耕种，即使勉强用起机器来也是不经济不合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死抱住实现农业机械化后才搞合作化，那实际上就等于取消合作化。而我们先合作化，能够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提高农业生产力，既促进国家工业的发展，以生产更多的农业机械，又能增加农业积累，以购买农业机器扩大再生产，而且也只有合作经营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农业机器。再说，我们在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先搞合作化，不但没有降低生产，相反地却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就拿我们福建来说，土地改革完成的1951年，粮食总产量67亿5千万斤（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66亿8千9百万斤），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胜利实现，总产量增加到88亿7千万斤，增长31%。农业总产值1951年7亿9千万元，到1956年增加到11亿9千万元，增长54%。我们打开《联共（布）党史》可以看到，苏联是等到机械化以后才搞集体化的。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实行全盘集体化，中间十一、二年虽然也进行合作化的试验，但实际上是让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自由发展。结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功，但农业很落后，到1927年，十月革命胜利十年了，谷物总产量却只等于战前水准的91%，其中商品部分只等于战前水准的37%。而在以后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搞得过左，如有的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家禽、家畜等也实行公共化，对富农采取扫地出门的政策，因此农业生产力不是上升而是下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在落后的农业国里，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进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必须是先合作化，然后才能机械化。看来，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当然，农业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机械化。我们实现农业合作化，只是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还没有把小生产改造为社会化大生产。因此，合作化以后，应该抓紧发展农业生产，搞好集体经济，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只有把建筑在手工业劳动基础上的集体化

农业，改造成为机械化的集体农业，才能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我们在完成合作化以后，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上，没有把农业机械化跟上去，而是仍然着重于变革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从而妨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严重的教训。诚然，我们在合作化过程中，是有发生过生产关系变得过快过急，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但这不是在土改后紧接着搞合作化，而是在合作化后期到公社化阶段，所以从高级合作化高潮后，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

二、关于采取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前进的过渡形式问题

对个体农民通过合作化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一贯的坚定政策。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苏区群众创造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经验，就指出了这种劳动互助社（即互助组）在农业生产上的伟大作用（见《长冈乡调查》）。他于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又指出：“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而“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⑤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了《论合作社》和《组织起来》两次著名讲话，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互助合作的思想，指出：在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之后，“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⑥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集体互助的初级生产团体。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说明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问题时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⑦在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互助合作政策思想的指引下，早在中央苏区时我省上杭县才溪乡实现土地革命之后，于1931年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开创了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从此，苏区各地劳动互助组织蓬勃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陕北、华北、华东和东北各个解放区，广泛地组织了劳动变工队和互助组，个别的还有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互助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为建国后在土地改革基础上进行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1951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就明确提出了完全适合我国情况的，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互相衔接、逐步前进的步骤，即由初级互助组（亦即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以后称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生产劳动互助组是农业合作化最初步的过渡形式。它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实

行集体劳动。就是说，组员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仍旧是私有的，仍旧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个体经济，但劳动者联合起来集体劳动。从个体劳动变为集体劳动这一点来说，它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性质。常年互助组由于比较固定，能够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并有少量的公共财产（如组里共同购置的农具等），所以它比临时互助组多具有一些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⑧虽然，马克思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手工业的简单协作，但我们也可以从他论证的集体劳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般原理，来认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优越性。据我省当时七个县的七个乡调查，以1951年产量为100计，1952年常年互助组平均达125.2，临时互助组118.2，单干农民111.6，增产幅度常年互助组高于临时互助组，临时互助组高于单干。这就是互助组实行集体劳动提高生产力的结果。

由于这种劳动互助组不触动农民的私有制，又是在农民固有变工互助习惯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克服单干难以克服的缺乏农具、耕畜和劳动力不足的若干困难，实现增产增收，所以它被土地改革后分得了土地的广大贫下中农所欢迎，同时也为比较富裕的农民所接受。正因为这样，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和土地改革完成后的两三年时间内，互助组得到广泛的发展，到1952年底，我们全省就有将近一半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党通过这种最初步的劳动组织形式，引导广大农民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

但是，互助组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各户的土地还是各自经营，存在着集体劳动与分散经营的矛盾。就是说，由于土地是各家分散经营的，这样集体劳动的劳动力的合理安排，劳动范围的扩大和土地、耕畜、农具的合理利用，生产的统一计划等等都难免要受到限制。比如，在耕作时间安排上各户争先恐后，有的在别人土地上劳动不积极，使用别人耕牛、农具不爱惜等等。还有，由于它没有触动私有制，组内一些较为富裕的农民可凭借优厚的生产资料而占有别人的劳动，使那些土地较少较差而劳动力较强的贫苦农民感到吃亏，生产积极性受到限制，不能够有效地克服贫富分化的现象。而且，由于常年互助组“有了某些公共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有了某些分工分业，或兴修水利，或开垦了荒地，就引起了生产上统一土地使用的要求”。因此，随着生产的提高和组内存在的矛盾的发展，为着解决集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有效地利用土地，就需要把各户的土地合并起来统一经营，从互助组向初级合作社过渡。

在1952年互助组广泛发展的时候，福建省委和各地委分别直接试办了十八个初级合作社，1953年扩大试办了160个。这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就是说，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如耕畜、大农具等）的私有制仍然保留着，但由合作社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安排，收获物不是象互助组那样全部归土地所有者，而主要部分按劳分配，并酌留一小部分作为全社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土地分红只占一部分，耕畜和大农具归社使用也给一定的报酬。

初级社在试办过程中，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重要作用，初级社由于实行土地统一经营，克服互助组分散经营时“吃啥种啥”，“啥也种点”的缺点，能够因地制宜和合理种

植，挖掘地力，增加生产。由于统一使用土地、耕畜、大农具和劳动力，就能够比较合理的安排，进行有计划的分工分业劳动，提高效率，从而集中较大的人力物力；搞技术改革和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多种经营，抵御自然灾害，逐步扩大再生产。特别是由于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调动了农民劳动和学习技术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初级社具有上述的优点，所以它比互助组能够实现更大的增产增收。据建阳等五个地区1953年试办的90个社调查，除三个因严重灾害或经营管理不善而略有减产外，其余87个普遍增产。龙溪地委在四个县调查了五个社、五个组、五个单干户1953年早稻收成的情况：初级社平均每亩526斤，互助组420斤，单干户390斤。另据1953年福州郑依姆社和沙县、福安、莆田等八个社167户社员的调查，增加收入的有144户，占86.23%，不增不减的18户，占10.78%，其余5户占2.99%，因遇到疾病缺乏劳动力而略微减收。

初级社的优越性发挥了典型示范的作用，吸引着广大互助组和个体农民，为它们树立了榜样，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时农民流行着这样两句话：“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互助组是基础，合作社是方向”。所以在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这年年底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要求加快合作化的进程，这样，初级社就从扩大试办进入了广泛发展的阶段。到1954年底，全省已有62%农户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其中初级社增加到一万四千六百多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11.5%。这一年，福建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减产二亿二千多万斤，但初级社却表现出抗灾夺丰收的强大威力。据1750个社调查，有77.5%的社仍然实现增产增收。初级社和互助组经过1955年上半年的整顿、巩固、提高而又有了新的进展。到1955年6月，初级社发展到一万八千多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上升到15.5%，全省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比重也上升到70.14%。

初级社在农业合作化中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起了显著的历史作用。它是完全适合我国农村特点的、由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的决定性的过渡形式。由于它保留土地分红，又实行按劳分配，所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一般采用了入股土地固定报酬，超产全归劳动分配，因此随着生产的发展，按劳分配比重逐渐增多，土地分红比重相对减少（在分配总额中扣除公共积累包括公益金后，土地分红一般只占30%左右）。所以采取这种半私有制的过渡形式，既照顾了贫下中农的利益，又利于团结中农，使他们感到入社后不会吃亏，而且能够削弱私有观念，使广大农民从参加合作社得到好处的亲身体验中，逐渐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从而比较自然比较顺利地脱离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可以这样说，只要农民走上了初级社这一步，实现高级合作化也就不很困难了。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农业合作化中发现并普遍采用初级社这种承上启下的最适当的过渡形式，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它对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的我国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意义特别重大。

但是，初级社保留着土地分红，就使一部人仍然凭借较优厚的生产资料而部分地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样，随着生产的发展，初级社土地分红的半私有制，就妨碍着扩大再生产，不利于社员劳动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所以，到一定的时候，如初级社生产有所发展，公共财产有所增多，集体经济有所壮大，入社社员更多地依靠劳动报酬

时,就积极要求取消土地分红,把耕畜、大农具作价归社,过渡到完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高级合作社。在1954年初级社迅速发展时,福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的“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在两个县四个乡试办了四个高级合作社。1955年高级社从重点试办到扩大试办,全省共建立了165个高级合作社。

我国农业合作化采取这样一些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前进的步骤,特别是初级社这种关键性的过渡形式,同时在每一个步骤中认真执行自愿互利和典型示范的原则,在发展到一定数量的时候,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然后再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运动,加上对富农阶级在经济上采取了从限制到逐步消灭,最后允许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进行同工同酬劳动,把消灭剥削阶级同改造剥削分子相结合的正确政策,减少了合作化的阻力。由于采取这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正确政策,所以我们的合作化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在这场涉及几亿农民的、大规模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广大农民比较自然地逐步地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从而不仅避免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而且使农业生产力不断上升。我们福建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从1951年至1956年这六年中,粮食总产除1954年因严重灾害减产2.8%外,其他五年,年年增产,农业总产值六年连年增长。我国农业合作化成功的实践,确实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

三、关于农业合作化高潮问题

福建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10月后进入高潮,到年底实现了初级合作化;从1956年初开始进入高级合作化高潮,到1957年3月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看来,合作化有两个高潮;一次是55年秋冬的初级社高潮,一次是56年的高级社高潮。现在总结经验教训,回过头来看,我以为前一个高潮是正常的,适时的,必要的;后一个高潮则前进过快,搞得急了,粗了,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为什么说初级合作化高潮是适时的、必要的呢?从福建的情况看,1954年是初级社迅速发展的时期,到1955年夏,全省已有一万八千多个社,有15.57%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54.4%农户参加了互助组。这批合作社90%以上是办得好的,80%左右的社增产增收。这说明,在合作化高潮前夜,不但有大批互助组为初级社的大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初级社本身也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它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吸引和鼓舞着广大农民办社的积极性。因此,在1955年夏秋期间,各地都出现了大批互助组要求转为初级社的事例。据晋江、龙溪等四个专区统计,在1955年9月间要求办社的互助组有二万多个、20万农户以上。许多申请转社的互助组未被批准,就自己办了所谓“自发社”或“明组暗社”。据建阳县统计,在1955年春未被批准办社的130个互助组1170户农民,就有575户自动组成45个“自发社”,有174户组成14个“明组暗社”。由此可见,出现初级合作化的高潮,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也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

正因为初级合作化的高潮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在1955年秋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

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传达贯彻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批判了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保守思想（如怕社多了巩固不了，对自发社不加分析地一概采取不承认的态度等）后，就出现了初级合作化的高潮。这真可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也。到年底，全省初级社发展到6万多个，入社农户160多万户，占总农户62.78%。初级社已成为农村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

初级社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村曾流行着初级社是“黄金时代”的说法。事实也正是这样。在1955年底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的时候，初级社立即在1956年扩大冬种面积和推广单季改双季、采用优良品种和合理密植等增产措施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因此，这年的春、夏收作物获得了特大丰收，上半年增产11.5亿斤粮食，比1955年同期增长64.6%。

但是，紧接着初级合作化高潮，又搞了高级合作化高潮，从1956年1月至3月短短三个月时间，高级社从原来165个猛增到6434个，参加高级社农户由2万4千多户增至161万多户，占总农户的比重由0.78%激升到58%。由于这批高级社大多还只是搭个架子，挂个牌子，还没有进行集体生产和分配，对1956年上半年的生产影响还不大，而实际起作用的还是初级社，所以春夏季能够获得大丰收。1956年下半年转入整社阶段，高级社在整顿中又有新的发展，到年底已有74.8%的农户参加高级社，1957年3月又增加到86.8%。

在高级合作化高潮中新建立的高级社，经过1956年夏季到1957年春季三次整社，处理生产资料入社的遗留问题，调整组织规模和健全管理体制，建立了“三包一奖”制度，搞好劳动管理，加强财务管理，正确执行分配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高级社才从搭架子进入实际的集体生产和按劳分配。所以说，农业合作化实际上是在1957年完成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我们前面说了，初级社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农民的觉悟水平，本应把在初级合作化高潮中变革的初级社生产关系，相对地稳定一段时间，以利于生产的大发展。但是很可惜，初级社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就紧接着搞高级合作化的高潮，所以可以说，初级社的好景并不长。由于生产关系变得过急过快，有些单干户和互助组一步登天转入高级社，许多刚建立的初级社还没有稳定下来就又转入高级社，这样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就必然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到1956年下半年，变革得过急过快的高级社的生产关系，开始对生产发生了影响，所以从1956年秋季开始，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大下降。这年全年，福建粮食总产量达88.73亿斤，比1955年增加10.86亿斤，其中春夏季增加11.5亿斤，而占全年粮食总产量70%的晚季却减产7千万斤。1957年也只增长0.07%，几乎没有增产。事实说明，高级合作化搞得快了，已经妨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高级合作化要求过急过快，也就难免要违反自愿互利的原则。许多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是在高潮形势的压力下被卷进来的，并非真正的自觉自愿。所以到1957年春夏期间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就出现了闹退社的风潮。而为了制止和解决这股风潮，在反右派斗争中，从1957年6月开始，广大农村开展了大辩论的全民整风运动，8月以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农村开展了以所谓大辩论的形式、实际

是压服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先例，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

高级合作社搞得过急过快，还为以后农村人民公社留下了急于过渡的后遗症，在1958年出现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加上“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使生产力遭到大破坏。从1959年起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当然也有自然灾害等其他原因），整个国民经济连续三年严重困难。

从高级合作化高潮开始，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急于过渡，过于频繁地变革生产关系，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和损失。这个教训极为深刻。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克服这种“左”的倾向，防止和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把现阶段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相对地稳定下来。

注：

-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版第954页
-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3页
-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1年版第131页和127页
- ⑥《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89页
-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0年版第1434页
- ⑧《资本论》第1卷第362页

关于党的“八大”的几个问题

张 弓

(根据录音整理)

对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方面的论述不少了，大家一致肯定“八大”的历史地位，认为“八大”是我党历史上召开的最成功的全国代表大会之一。就会议本身和它应当起的作用来讲，它可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相比美。可是长久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八大”曾被攻击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大会。现在，这个被颠倒的历史已经颠倒过来了，使“八大”重放光辉。人们深深地记住这个历史教训，痛感我们必须发扬“八大”精神，继承“八大”传统，实现“八大”所确立的“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伟大历史任务。

那个自封为理论“权威”，充当林彪、“四人帮”顾问的康生诬蔑攻击“八大”的五顶帽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扬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已被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彻底地冲刷掉了。而康生这个狂妄骄横、两面三刀，专事搬弄是非的恶棍也已被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人们的唾弃和审判。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今天想就以下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

- （一）关于“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二）“八大”的主要成就和历史的局限性
- （三）对“八大”有关几个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八大”是在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连续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历史性胜利的形势之下，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的情况下召开的。“八大”是我党由遵义会议以来二十多年来连续胜利发展的历史的一个顶点。党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很高。会议充满着对胜利、成功的喜悦，对光明未来的希望和鼓舞，而对已经冒头的“左”的倾向，对个人崇拜的滋长，以及前进中的困难曲折

复杂的形势估计不足。应变的步骤、措施也不那么切实有效。一句话，党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产生了骄傲麻痹的思想，许多人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与党的“七大”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七大”是从失败和成功中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毛主席当时估计了十七种困难），给人以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事的心境；而“八大”时只有胜利的经验，人们滋长的骄傲自满的情绪，尾巴翘的也高，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二、“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二十大”是苏共党领导集团违背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逐步蜕变为一个执行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的起点，这是它的消极方面。另一方面，不是讲“二十大”本身，而是就这次会议所产生的客观影响来说，也有它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它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弱点。诸如，社会主义民主不足，肃反扩大化、个人迷信、大国沙文主义、指挥控制别党别国的老子作风，以及在经济建设上重工轻农等问题。启发了各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活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气氛，从而也启发了我们的党。

我们党在最初是比较注意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从而改进党的工作，制定我国的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这反映在“八大”的主要文献和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中。但是，由于波匈事件的出现和国际反共逆流的猖狂，以及国内右派的出现，我们就对形势作了片面的估计和分析。因此，对“二十大”影响的估价也由一分为二，变为全盘否定，这给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迷信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造成了一种否定“八大”路线的不良气氛。这是又一个历史的教训。

（二）“八大”的主要成就和历史的局限性

“八大”的主要成就可以归结为如下五点：

一、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胜利的经验。它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明了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正式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二、它正确地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制定了比较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三、根据国际经验，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和党委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

四、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

五、“八大”特别指出加强党作为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

总之，“八大”所规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叶帅三十年讲话中指出，“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只要重温“八大”文献，就会有一种亲切的感受，一方面会很自然地感到多年来没有按照“八大”路线办事，吃尽了苦头；另一方面又会感到今天的党中央路线，同当年“八大”路线有许多基本的类似之处。可以说今天的路线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延伸、发展和丰富。因此，我们学习“八大”文献，对于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加深对今天党的路线的认识有很好的作用。

当然“八大”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八大”虽然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正确的判断，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会存在某种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其它社会政治矛盾的事实，也曾有所预料，但却没有认真研究过。“八大”前后一个短时间内，我们党的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在内，看斗争的顺利方面多，看斗争的复杂曲折性方面少了，特别是对党内已经出现的“左”的苗头，没有引起必要的注意和警惕。这样，当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和反共逆流出现，国内发生极少数右派进攻时，就很难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对这些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科学分析，以至发生了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估计和处理。

二、“八大”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的正确决定，但尚未来得及在全党开展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思想工作，并相应地制定必要的党纪国法等实际有效的措施做保证，加上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历史的因素和原因，使得这些问题并未能解决。而且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还有所发展。实践表明，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党和国家的民主不是日益增强而是逐步削弱。党内民主生活不足和国家民主法制的健全，加上党和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等，使人民和党员的应有权力不容易行使，党的领导人和党的领导机构实际处于一种难于监督和难于约束的地位。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贯彻执行，使许多应该和可能防止的错误得不到制止和纠正。

三、“八大”对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关于经济建设的计划的执行，以及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未能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制定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经济法规和实施方案。非常不幸的是，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非常需要党谦虚谨慎地对新的社会情况和新的建设任务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刻，而我们党却骄傲了，相当多的领导人误认为搞建设是比较轻而易举的事情，似乎依靠老经验老办法就可以把建设搞好。所以全党本应集中精力学经济、学科学、学文化等，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政治运动一来，使经济工作遭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损害。

上述问题，我只是就总结历史经验而谈点体会，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当然不能强求

“八大”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得很周全，因为这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经验、认识水平的限制。我们绝不苛求于“八大”。

(三)对“八大”有关的几个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八大”为什么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一词最早是少奇同志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的。“七大”党章总纲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建国后，由于斯大林和苏联党一直不同意我们使用这个词，毛泽东同志为照顾当时的影响，即考虑不再继续使用这一词。从五十年代初，他曾多次提出过这类意见。记得毛泽东同志老早即讲过类似这样的话，马列是总店，我们是分支，不必在马列主义之外再单独提什么毛泽东思想了。51年，陈伯达写了一本书叫《论毛泽东思想》，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通知《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中写道：“党章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此件由毛、刘、周、朱、邓圈阅批发全党），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重申，反对把人名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这些情况说明“八大”所以不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多次提议而那样做的。但是，“八大”决议仍然强调了“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八大”预备会议和开幕词中也反复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这说明“八大”把毛泽东思想实质和精神是完全保留了，根本不存在有谁把毛泽东思想砍掉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后，林彪、康生、“四人帮”，为了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阴谋篡党夺权，曾借此大做文章。他们把自己伪装成最崇拜、最信奉毛泽东思想的虔诚的信徒，胡吹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是“最高最后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他们这样地歪曲毛泽东思想，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害，败坏了毛泽东思想的声誉。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毛泽东思想重新作了科学的解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理论。它将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宗教教条，更不是什么最高最后的绝对真理。毛泽东思想主要

论述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它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无限夸大地说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我今天不讲毛泽东思想所包含的内容问题，而是讲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和精髓，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实事求是。舍此，就不会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是识别真假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试金石。

二、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个人迷信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马克思在分析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特点时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长期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专制主义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一直未能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决定性的摧毁，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残余影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却还有广泛的存在，当然也侵袭到我们党和其它革命组织内部。解放以后，我们又一直忽视了在这方面的清算和教育工作，因此，对个人神化、家长制、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宗法关系等这些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以及支持这些思想残余的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相当大。它严重地侵蚀着我们党和国家的肌体。而且这种思想极易为野心家利用来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党的“八大”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是吸取了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国际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考虑到我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实际状况的。邓小平同志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他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小平同志在报告中还强调要健全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和专断，严禁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八大”党章还规定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

十分遗憾的是“八大”所正确指出的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贯彻和执行。相反，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快发生了动摇，继而发生完全相反的认识，以至酿成很大的恶果。一九五八年以后，党中央的政治民主生活就日益变得不正常了，许多重大经济问题往往不是依靠集体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审慎地形成科学的结论，而往往由个人作出论断。党对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方面的重要决策，也往往是个人提出，而又未经过认真的讨论就在中央会议上通过或以中央名义发布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外，共产国际和苏联党集权过大的历史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我们党的历史上，1943年3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决定中就不适当地规定过，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中，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显

然，这种规定是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虽然多次强调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但是这种历史的习惯和传统，不能不起一定的消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三月，党的成都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开始把个人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崇拜马恩列；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他还把反对个人崇拜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而要崇拜他自己。这种说法表明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原则问题上，有了保留，有了怀疑和动摇。

1963年发表《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时，其中第二十条中对个人迷信的提法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不但不提他搞个人迷信的错误，而且大批反个人迷信，说什么：“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说“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这种只靠大帽子压人，强词夺理的说法，把原来正确的东西压下去了，而且在“理论”上伏下了“文化大革命”中造神论的基础。

1965年1月，主席给斯诺讲：那时（按：指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人崇拜。到了1970年12月，主席再次给斯诺讲，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四人帮”借此大作文章，搞“造神”运动，偶像崇拜，搞到荒谬绝伦的程度。这些大家都深有领教，不去说它。而主席虽然也批了林彪搞“四个伟大”、“大树特树”的罪行，但对此，他并没有深切的认识，实际上还是他一人说了算。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试想“文化大革命”许多错误，同这个错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讲，没有个人专断和个人迷信，“文化大革命”搞不起来，林彪、“四人帮”也上不了台，当不了接班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还坚持“两个凡是”，许多人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客观真理，生怕触犯毛主席，触犯毛泽东思想。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党如果搞个人迷信，这个党的生机就要遭到窒息，发生错误是必然的，这是斯大林晚年的教训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一再证明了的。最近党中央关于取消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规定，正是从领导体制上改变这种弊端的根本措施之一（当然还有其它的措施）。

三、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问题

“八大”政治决议原文讲，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段话整段的文字是要强调说明当前我国的生产力落后，党和全国人民要集中力量来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问题是其中有一句话，即“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

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引起了争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等人诬蔑这句话是刘少奇同志背着毛主席加上去的，是否定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

据我们了解，这句话是在通过决议前，由起草的同志写上的，同少奇同志毫无关系。毛主席发现加了这句话，当即批评了这些同志，指出这句话是不科学的。但既已作为大会决议通过了，即不必再改动了，以后说清楚就是了。五七年十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主席对此又作了说明（见《毛选》五卷）。

对这句话，至今在我们同志间还有不同的理解。我仍然认为这话是不科学的。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经典的表述，简明地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三大基本原理。他当时是这样表述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978年6月人民出版社《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32页〕

这段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人们在社会物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二）一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即生产关系的发展同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相适应。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才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三）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四）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部分改革或根本改变现存生产关系。（五）由此而得出逆定理是：生产关系最多只是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合而不可能走在社会生产力的前边，而许多情况还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果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如穷过渡，人民公社等）那并不是什么先进，而必然要破坏生产力，迟早还得退回来，因此它也根本构不成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不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和小生产者的私有制经济已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三大改造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说基本上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它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起了保护

和促进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实践经验表明,即在那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还有许多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完善因素。如我们的公有制在许多方面是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并未能真正体现为劳动人民所有、为劳动者支配的公有制。其次我们在分配体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交换领域(长期以来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消费领域(一方面浪费惊人,另一方面人民的消费水平太低)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问题,生产关系诸方面的问题大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会议上大体谈到了过去我们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上的许多弊病和不完善的地方,要求在今后逐步地加以改革,否则,我国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尚有许多严重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曾指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寻找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按:现在看来还应加上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存在——张弓),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选》五卷第374页)

毛主席的上述讲话,分析了:(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无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还很不完善,必须不断加以改革与完善之;(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的各方面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些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得好的,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加以解决;(三)在上层建筑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上也还有缺陷必须继续加以解决。

因此就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来讲,不好说生产关系先进;同样,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和我国的生产力之间关系

来说，也不能说何者先进何者落后。因为生产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相应的这种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作，必须同发展社会生产力统一起来，二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

我认为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如何表述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的问题是比较科学的。他讲：“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

华国锋同志这种表述，指明了：（一）现在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这同人民和国家的需要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就我国自身来讲，这种矛盾并不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二）实现四化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必须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同扫除不利于四化的旧习惯势力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和指正。

“大跃进”的失误及其经验教训

孙 梁

1956年三大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时期。在探索中，遭到了曲折。1958年的“大跃进”是探索的一种尝试，但是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1961~1965年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三年“大跃进”和五年大调整，研究党的这段历史，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具有直接现实意义。

但是，这段历史刚刚过去，怎么讲，确实有困难。就说题目吧，到底怎么出好，用什么题目概括这段历史。今年六、七月份在中央党校党史专业班讲时用的题目是“大跃进和八字方针”。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太大，大跃进三年，贯彻八字方针又有五年，要讲八年，题目太大了。现在改了一下，用了《“大跃进”的失误及其经验教训》这样一个题目，主要是讲“大跃进”这段历史。但是又有了问题，是用“大跃进的失误”好呢，还是用“大跃进的错误”好？我现在仍用失误二字。我们探讨大跃进这段历史，重要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故而又在题目上着重标出了“经验教训”这四个字。所以说研究这段历史是困难的，我首先作个发言，作为引玉之砖，供同志们讨论参考。望多提宝贵意见。

准备讲四个问题：

- (一) “大跃进”出现的历史背景
- (二) “大跃进”的出现，左的全局性错误
- (三)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八字方针的提出
- (四) “大跃进”失误的经验教训的探讨

一、“大跃进”出现的历史背景

“大跃进”这个历史现象出现在1958年的中国，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这个问题，准备讲三点：

第一，“大跃进”出现的客观历史背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矛盾起了变化，这是“大跃进”出现的总的客观历史背景。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起了变化。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议

分析了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它明确地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阶级矛盾基本解决后，生产力落后这个矛盾就尖锐地突出起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生产力落后的矛盾突出了，发展速度问题尖锐起来了，要求国民经济有较快的发展。这是客观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也给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4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分析了1958年“大跃进”的原因。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跃进，就是在解放以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也不可能发生1958年式的大跃进。1958年跃进的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和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提供了可能性，使国民经济可以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一五”计划的胜利，建成了一批大规模的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培养一批技术力量，为较快地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由此可见，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

第二，“大跃进”出现的主观指导原因。“大跃进”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在探索建设新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主观指导上的左倾错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基本上是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苏联帮助我们具体制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时，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力图突破苏联的模式，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正象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寻找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新道路一样。

早在三大改造高潮时期，党中央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速度，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1955年9月到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曾几次在会议上讲过关于领导各项工作要采取又多又快又好的方法问题。1955年冬，在毛泽东同志听取财经34个部门工作汇报时，周恩来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富春同志补充说还要省。他们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同。

周恩来同志在1956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都讲到了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便使各项事业的发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

怎样才能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党努力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党的“八大”总结了我们党进行一五计划的建设经验，体现了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集体努力。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党探索建设新道路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问题，提出了必须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问题。毛主席批评了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太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坏，因而提出了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问题。又鉴于苏联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地，一点机动权力也没有，毛主席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毛主席说：“有成绩和缺点的比较，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有苏联和中国的比较，促使我们在1956年提出了十大关系。”（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第8页）毛主席论证了正确处理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我党又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报告。《正处》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明确地指出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它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便团结人民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向地球开战的重要思想。它提出了工业要和农业并举，并把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宝贵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如果在实践上谨慎从事，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可以较快地发展生产力，较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问题是我们在探索的实践中，出现了“左”倾错误。“大跃进”就是这种“左”倾指导的直接产物。

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挫折和失误，革命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但象1958年那样大错误，那是同主观指导上的“左”倾错误直接有关。195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一年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的反右派斗争，犯了“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开始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也是犯了“左”的错误。这两件事，对1958年的大跃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7年，党对极少数右派的进攻，进行反击和批判，在广大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教育，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对当时的敌情估计过大，采取了“四大”的形式，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和划右派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则是错误的。反

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使党内外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长期蒙受冤屈，使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受到挫折，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了损害。

在反右派斗争中，开始形成了对以后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反右派斗争以后，党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和《正处》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认为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表现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因而特别强调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提出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概念。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意义不可低估，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一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提法。“政治战线革命”只能理解为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再这样提问题是完全不对的。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经济革命（就是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外，孤立地进行思想革命，也是不妥的。群众中的思想问题不能靠开展大规模的批判，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解决。象1957年反右派斗争那样的所谓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证明了这是一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作法。

(三)把“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群众斗争形式肯定为一种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式。认为“四大”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四大”被运用到1958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中，实际上成为压服群众推行人民公社化和高指标、瞎指挥的手段。

这些观点的指出，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又回到过去用阶级观点观察一切问题，用阶级斗争推动一切工作的旧的思想轨道上。1958年，在实践上，我们还不象十年动乱时期那样把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重点还是放在经济建设上。但是，我们推动经济建设的方法，是用“四大”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推动“大跃进”。“大跃进”就是在反右派斗争和全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1958年初，在企业和国家机关中展开了一个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的双反运动，新的整改高潮。《人民日报》1958年2月18日《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的社论中曾指出：“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们全民性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并认为“灿烂的思想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在三月三日中央公开发布的《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中又说，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指示认为，只要我们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个纲，打掉三风（官僚主义、主观主

义和宗派主义)和五气(官、暮、阔、骄、娇气),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先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用全民整风运动的方法,通过“四大”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推动生产和建设的高潮,发动大跃进。

继反右派斗争之后,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又对1956年党中央决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正确方针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使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的“左”倾情绪得到发展。

1956年的经济工作,由于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提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由于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又由于1956年是一五计划的第四年,因此,国民经济的步子迈得大了一点,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这一年基本建设的规模比1955年有大幅度的增长,投资从1955年的86亿猛增到1956年的142亿。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又提高了职工工资标准,使工资开支总额和福利开支过多过急。农贷也发放得多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当年财政支出超过收入,有了赤字。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动用了库存。

由于基建投资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在1956年第二、三季度已经开始察觉,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及时发现了问题。一方面从思想上提出,要防止急躁冒进的偏向,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另一方面又采取积极措施调整、压缩了1957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并总结了1956年冒进的教训。周恩来同志在1956年9月,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头几年的经验包括1956年冒进的教训,特别强调要遵照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办事。他在关于“二五”计划的报告中,全面地总结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四条经验:第一,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制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第二,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以保证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应付遇到意外困难;第四,应该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

陈云同志在1957年1月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也着重总结了1956年冒进的教训。他指出: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基本建设规模,购买力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有当年的平衡,而且必须要有瞻前顾后的平衡。

正是在总结1956年犯有急躁冒进的缺点错误的基础上,当年十一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就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问题作报告时指出:明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作适当的压缩。全会当时是一致同意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意见的。

1957年2月,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也指出:1956年度计划有进展过快的缺点,为了缓和目前经济生活和财政收支的紧张局面,必须适当地调整1957年度基本建设的规模,并且根据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照顾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等方面的要求,具体安排1957年度的基

建计划。

根据党中央一致同意的上述方针，由于1956年这一年冒进了一些，有了赤字，1957年就适当作了调整，基建规模压缩了，弥补了1956年的差额，这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起了良好的积极作用。1956年的反冒进是完全正确的，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效果也是好的。

但是，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就不断地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指责它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实质上就是批掉了实事求是，批掉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使党在指导思想开始滋长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情绪。批判了反冒进，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大冒进。“大跃进”的发动，就是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的。

第三，“大跃进”的发动。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这是“大跃进”的发动时期。“大跃进”的发动是在不断地批右、不断地批反冒进的过程中进行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提出来的。

下面，按照历史顺序讲讲有关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要讲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八届三中全会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会议对前一段的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对全民整风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会议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重申1956年党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同时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它扫掉了几个东西：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发动1958年“大跃进”的会议。毛主席后来在成都会议上说，1958年的劲儿开始于八届三中全会。从这个会议以后，就不断地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片面的反右倾，鼓干劲，强调多快，实际是不顾好省。

第二件大事即十一月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了要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对“大跃进”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当时英国的钢是2200万吨。这个口号提出以后，薄一波同志说，从此转上以钢为纲的道路。老是想赶超2000万吨。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三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针对1956年6月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批评说：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或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要求各级党委抓紧目前的时机，发动广大群众认真讨论农业纲要四十条的修正草案，振作精神，鼓起一把劲，必须向右倾消极情绪作斗争。要求展开全民大讨论，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建设的高潮。

当时各省纷纷召开各种会议，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用“四

大”的办法开展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这时已出现了“大跃进”的口号。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全国广大农村掀起了大兴水利、积肥等农业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

第三件大事即南宁会议的召开。1958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在南宁召开了九省二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是继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又一次关键会议。会议内容是总结“一五”计划，并对“二五”计划甚至更远的时期作了规划。并且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问题。毛主席集中与会同志意见，拟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但是，会议又着重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差五十米，并提出以后永远不许反冒进。南宁会议后，反右倾的空气更加紧张，反右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加紧了“大跃进”的发动。

二月中旬（13~23日），中央又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一百多人参加，这个会议主要是传达南宁会议的精神，是南宁会议的继续。会议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

在这期间，《人民月报》发表了两篇重要社论，一篇是1958年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一篇是二月三日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社论号召大家要“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苦战三年”的口号，说“全国大部分应当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的面貌基本改变。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时候，形成总路线的几句话差不多都有了。

第四件大事，三月党中央在成都开会。会上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会议又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成都会议后，又不断地批判经济建设中的所谓“稳妥派”、“观潮派”、“促退派”。在不断的反右声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激励下，各地区各部门都在考虑如何加快速度，提高指标，实现“大跃进”。这时，高指标已经开始出现。有的省提出要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除文盲等。

第五件大事，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并正式制定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党的这条总路线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因为它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主要任务突出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这是正确地适应了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从这方面来说，是八大正确路线的继续发展。因为它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规定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这些都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是正确的。因此，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1958年，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在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开辟了新的局面。

但是，总路线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党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是在错误地批判了1958年的反冒进的过程中，在党的经济工作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左倾情绪下形成的。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主观主义和左倾成分。它没有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践证明，光提多快好省，解决不了按比例的问题，用多快来制约好省，

一向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制约不住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是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提出后不久，周恩来同志就表示了一个意见，说这四个字不够科学，就是没有把有计划、按比例这个意思包括进去。1956年提出这个方针后，就出现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问题。1958年总路线提出后，出现了更大的冒进，就是一个证明。它又是同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分析、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用进行阶级斗争和搞政治运动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这就使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态，影响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就必然要影响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由于总路线本身存在上述问题，在执行过程中，左倾情绪又有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就发生了“左”的全局性的错误。

以上说明“大跃进”出现的历史背景。“大跃进”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一五”计划完成的基础上出现的，这是“大跃进”的客观历史背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中出现了“左”倾错误，这是“大跃进”出现的直接原因。大跃进的发动，就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在错误地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

二、“大跃进”的出现，左的全局性的错误

上面讲了“大跃进”出现的历史背景，下面讲讲“大跃进”的本身，“大跃进”出现的这一段历史情况以及对“大跃进”错误性质的看法。这个问题也想讲三点：

一、党的北戴河会议

要讲“大跃进”，人们首先就会想到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先讲讲北戴河会议前的形势，即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到八月党的北戴河会议这段情况。这段情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出现了“大跃进”。什么叫“大跃进”，“大跃进”的原意是超乎常规的高速度。当时有种说法，工业每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1958年“大跃进”的主要内容就是以钢的翻番为主要标志的高速度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现在概括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往往用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三句话，高指标的代表就是钢的翻番，共产风刮来了人民公社。钢的翻番和人民公社在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后，就开始出现了。所以说总路线带来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有道理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总的形势就出现了“大跃进”。现在介绍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首先讲钢的翻番。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以后，就开始酝酿并且不久就确定了钢要翻一番。1958年钢的指标是一点一点加高的，热度也是逐步上升的。原来1956年9月，八大提出的“二五”计划的建议中，钢的指标到1962年计划达到1050~2000万吨，这个数字比“一五”计划原规定的1957年完成412万吨钢比较，将增产1.5倍到1.9倍。如果同1957年的预计产量550万吨作比较，那么将增长到将近一倍到一点二倍。农业的指标，计划粮食1962年达到5000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800万担。也就是说当时设想差不多要用将近五年的时间

达到翻一番的任务。

1957年我国钢产量实际完成数是535万吨。国家经委在制定1958年年度计划时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是620万吨，这个数字经1958年2月一届五次人大通过，如果按这个速度前进，也是很快的，到1966年就可以达到2000万吨左右。

三月，成都会议通过《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中，提出了钢第二本帐的数字是700万吨。这个数字经四月五日政治局会议批准。同月，中央又批发了冶金部负责同志《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报告。报告设想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就是说，1962年钢要达到2000万吨左右，1967年达到4000万吨左右，1972年要达到7000万吨，1977年要超过1亿吨。根据是什么呢？报告说：“最主要的根据是主席所指示的总路线。”“目前全国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之下，已经完全证明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

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总路线后，钢产量就酝酿并确定要翻番。五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建议把钢产量增加到800~350万吨。六月，各大协作区召开钢铁规划会议。会议热度很高。首先是华东区在五月底就提出争取明年华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在华东区这一带头下，各大区纷纷提出明年规划。会议估计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可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在这种高温下面，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钢翻番的任务，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同钢翻番联系着的是地方工业的大发展。1958年1月，党中央就提出地方工业争取在五年到十年内超过农业产值的号召。成都会议时，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要求各省、自治区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八大二次会议后，随着钢的翻番，地方工业也得到了大发展。据甘肃省的情况，1958年上半年地方工业发展有三个阶段：

（一）从一月南宁会议到三月成都会议，建厂一千多个，这时只有专县办厂，乡社未动。

（二）三月成都会议到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建厂3500个，由专县普及到乡社办，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全民大办工业的高潮。

（三）从八大二次会议到六月底，厂矿数目猛增到22万多个。在短时间里，掀起了一个县县、乡乡、社社、队队、各机关、各学校、各行业大办快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叫做波澜壮阔、声势浩大、万马奔腾、势如破竹地大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参见《新华月报》1958年18期中共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全民大办地方工业的基本总结》）

人民公社出现的情况。农业合作化开始的几年，比较慎重，比较稳当。1955年冬，农业合作化高潮兴起以后，合作化的步子就快了，工作粗糙了。1956年高级社以后，社的规模一下子从初级社的几十户发展到上百户，一、二百到二、三百户，经营管理和经济政策中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未能引起我们党足够的重视。相反，由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农村兴修水利和积肥等群众运动兴起后，又片面地认为原有社规模过小。

不利于大办，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主观指导思想，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喜欢办大社，提高公有化程度，以为这样可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又酝酿着变革生产关系。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主观上急于过渡的“左”倾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

早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关于“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里面，毛主席就讲了办大社的优越性，他说：“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在农业生产高潮中，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各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情况。

在河南，一九五八年春季即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现象。到麦收时已由原有五万四千多个高级社合并为三万多个。各级党委还有重点地试验建立几千户以上的大社。如遂平县的嵇山卫星社，就是四月间由27个小社合并为9369户的大社。麦收后，建立这样的大社，已由重点试验变为遍地开花的群众性行动。同小社并大社同时，大办工业，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集体福利事业。

在辽宁，五月间也进行了一次并大社工作。全省由9600个社并成1461个社，平均每社二千户左右，其中九个是万户以上的大社，最大的一个是一万八千户。同时调整乡的规模，基本上一乡一社。

在山东，到六、七月间，也有很多地方酝酿办大社。在办大社的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大社应当转为全民所有制，叫国营农场，有的认为可以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共产主义公社，等等。

七月间，《红旗》杂志上出现了“人民公社”的提法。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第三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讲到湖北一个合作社办工业以后，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第四期《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这时，河南新乡七里营办了一个人民公社。八月六日，毛主席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讲了“人民公社好”。八月九日，毛主席到了山东，又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在北戴河会议以前，虽然已确定要钢翻番和成立人民公社，但没有成为全民的运动。党的北戴河会议以后，迅速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左”的全局性的错误，北戴河会议是个重要转折。

党中央政治局是八月十七日到八月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有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和其他问题。

会议分别在工业和农业两个方面，发表了两个公开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有关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性的错误决策。这两个历史文件表明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离开科学社会主义轨道，陷入“左”倾空想之中。原来在工作中存在着的个别的局部性的“左”倾错误，这时发展成为“左”的全局性错误。

会议文件表明，党从对形势的估量到提出任务，到完成任务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离开实际的“左”的错误主张。决议号召首先对国内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一千斤左右；棉将达到七千万担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以上。”“……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由于对形势不切实际的估量，在提出任务上，就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会议要求一九五八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一九五七年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要求在一九五九年“继续用一九五八年的速度或者比一九五八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期间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且在最短期间根本改变我国的工业落后状态。”

会议在内部确定1959年钢要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要求一九五八年农业过关，一九五九年工业过关。一九五九年就要在若干项基本工业指标上超过英国。北戴河会议的热度是达到了最高点。

工业上的高指标，农业上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认为：“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决议虽然指出“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建成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但决议认为集体所有制很快就可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并且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些估计，离开中国的实际有多么“遥远”是显而易见的。

在完成任务的方法上，北戴河会议强调了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大鸣大放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北戴河会议决议上明确写道，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须通过群众的鸣放辩论。”会议还强调用鸣放辩论的方法搞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当时就是把不断地拔白旗、插红旗，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作是推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重要

保证。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变相压服的方法。会议强调的政治挂帅，实际上否定了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强调的群众运动，是把过去党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打仗、搞土改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来，实践证明这也是不适合经济工作特点的。一切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并不等于一切工作都要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靠大轰大嗡搞群众运动的方法领导经常性的生产运动是不适宜的。总之，一九五八年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也是左的，是不符合经济工作的特点的。

历史已经证明，北戴河会议所轻率决定的当年的钢铁生产要比前一年翻一番，以此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主要步骤，并且决定把全国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人民公社，以为这样可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一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左”的全局性的错误决策。这种单凭政治热情、主观愿望，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客观条件的左倾空想和蛮干作风，使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北戴河会议以后，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紧张而又混乱的局面。

二、北戴河会议后的形势，党的一系列纠正“左”倾错误的会议

北戴河会议后，迅速出现了全民炼钢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形势搞得十分紧张混乱。

截至八月底，全国钢产量可达到450万吨，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还要完成650万吨。就是说要用1/3的时间完成2/3的任务。因此任务十分紧迫。毛主席当时也怀疑过，他引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当时报上已公布，拼命也得完成。那么，怎么办呢？靠什么来完成任务呢？就是靠大搞群众运动，动员全民炼钢，使小高炉遍地开花。当时钢铁战线上劳力猛增的情况如下：

七月底，用在钢铁战线劳力才几十万人。

八月底，增至几百万人。

九月底，猛增到五千万人，加上其他战线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大致有一亿上下。

十月，增至六千万人。

年底，上到九千万人。

小土群增加情况：

七月间，全国农村城镇新建炼铁土高炉才三万多座。

八月间，增至17万多座。

九月间，增至60万座。

十月间，全国有数百万新建炼铁炼钢土炉及其他小型企业和手工工厂星罗棋布，遍及全国大小城镇乡村。

特别是国庆节前后，全国一片热气腾腾。国庆节前，报道了一批钢铁高产卫星。十·一社论的题目是《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十月七日到九日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促进会。十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河南商城举行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议。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钢铁生产周”（这使人想起十年内战时期的扩红周）。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总结了一条经验：不管是小土群大洋群都要搞群

众运动。并说：在大型现代化企业搞群众运动，已有一些好的经验。两参一改三结合“四大”是有普遍意义的，应该大力推行。到十一月上旬，全国生产钢820万吨，铁1770万吨。

这种蛮干的办法，当时已遭到许多同志的反对。从当时报纸上大批观潮派，可以看出反对的人是不不少的。当时批判所谓“观潮派”的就是这样一些正确观点：

(1)认为钢铁战线上劳力上多了，妨碍了农业生产，影响秋收秋种。

(2)经济上搞乱了生产秩序，破坏了比例和平衡，造成紧张局面。

(3)浪费很大，得不偿失，全民工业化运动造成了“天下大乱”等等。

无疑，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但是，《红旗》评论员却批评说：这种天下大乱，实际是天下大治。有了乱才有治。这种“乱”是革命人民欢迎的，只有厌倦革命的人才对“乱”害怕和不满，等等（参见《新华月报》1958年22期；《驳工业战线上群众路线怀疑派》）。这里明目张胆地鼓吹“乱”。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鼓吹不怕乱，结果生产上不去，人民遭了殃。当革命打乱旧秩序的时候，当然需要乱，不乱不行。可是，当革命进入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就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常的生产秩序，否则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用这样一种“大跃进”的方法，搞得“天下大乱”，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邓小平同志也说今后再也不能这样搞了。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村搞得很乱。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共产风的内容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随意平调，自留地、鸡鸭猪等猛割私有制尾巴。

其次是带来了浮夸风、高产风。什么成倍、成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产风带来了高征购，大浪费，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等等。

第三，还有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农田基本建设，抽调了过多的劳力，超出了当时的生产能力。

第四，命令主义作风，特别是那个拔白旗运动，压力很大，形成强迫命令，使人们不敢讲真话。

公社化把人们的思想也搞得十分混乱。公社统一分配，搞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等，使人们分不清现在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共产主义。表现在各级领导上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说，这地方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的说三年。当时报刊上，有的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有的说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有的说要过共产主义关等等，极不一致。当时陈伯达鼓吹可以不要商品生产，直接进行调拨；张春桥鼓吹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要搞供给制，反对按劳分配，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因此，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共产主义是否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毛泽东同志很快察觉了“大跃进”中的问题，于是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进行研究，纠正“左”的错误。当时纠“左”的主要内容：一是解决人民公社的共产风问题，一是压低高指标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的前期，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为纠正自己的错误，从理论上到政策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连召开了六个重要会

议。六个会议可分作两段来讲。一段是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这几次会议主要解决的是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明确现在仍然搞的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且压低了一九五九年的经济指标。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十一月二日到十日，在郑州的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部分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重要会议。由于人民公社建立后分不清搞的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所以会议首先讨论了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是否划一条线的问题。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的建成应当是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建成后，再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提出了两个过渡的问题，即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然后再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会议认为，现在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郑州会议肯定了两个过渡，澄清了许多混乱思想。会上，毛泽东同志领导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反复说明在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等价交换极端重要，批判了陈伯达等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实质上是剥夺农民的荒谬主张。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12页）又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同上书13页）

郑州会议以后不久，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在这两次会议作了准备的基础上，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党中央在武昌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有关人民公社的一系列问题。决议针对“把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至实现共产主义看得非常容易”的左倾思想，强调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决议并指出：“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决议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指出：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决议对于公社的生产方针，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等问题都作了规定，并要求各级党委密切结合冬春的生产任务，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和巩固工作。

这个决议的贯彻对于澄清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出现的混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于公社所有制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问题，对于公社的分配制度（仍保留供给制部分）等问题，则没有认识和解决。

全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冷热结合的精神，鉴于一九五八年比例失调所产生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协调，降低了基本建设投资。1959年钢的指标原定3000万吨，压到了1800万吨，内部一本账是2000万吨。调整后的这个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仍然过高，缺乏完成的实际可能。粮食指标仍没调下来。

八届六中全会后，农村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并没有停止，加之对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缺乏认识，在整社过程中不适当开展反对本位主义和反对瞒产私分的斗争，使农民严重不满，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继续纠左，这就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这几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并继续压低指标。

二月七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央有20人参加，各省市有27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他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各条战线上的伟大成绩，肯定“大跃进”，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批评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他指出人民公社现在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被许多同志所认识。什么矛盾呢？他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完不成任务。再则，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原因何在？他正确地指出，当前发生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认识。毛泽东同志指出了公社所有制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

他指出，公社化以后，刮起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引起农民很大的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造成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剥夺农民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倾向。因此要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要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要实行等价交换，等等。他承认“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

没有掌握好分寸。”会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仍是大队）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解决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问题。但是，当中还规定旧账一般的不应再算。第二次郑州会议同第一次郑州会议一样在历史上起了纠“左”的积极的作用。第二次郑州会议比第一次郑州会议在纠“左”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明确了公社所有制也要有个发展过程，规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是它的正确的方面。但同时也要看到当时纠“左”是不彻底的。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省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迅速贯彻郑州会议精神。这种从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入手解决共产风的作法，受到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欢迎。

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作准备。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全会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是根据中央政治局指示“既要保证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又要使各项指标落实”的精神。调整后的指标是：钢：武昌会议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现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煤：武昌会议定为4亿吨，对外公布为38000万吨，现定为38000万吨。根据钢、煤数字的变动，相应地变动了一些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基建投资由360亿降为260—280亿，项目由1500个减为1000个左右。粮棉已公布数字不变，粮为10500亿斤，棉1亿担。粮棉以外的其它一些农产品指标，都有一些降低。

全会检查了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对于整社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规定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提出不仅要算而且要退赔。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对《陶鲁茄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作了一个著名的批注：“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上述情况可见，不到半年时间，中央连续召开了六次重要的中央会议，纠正“左”的倾向，解决人民公社问题和降低指标问题。直到庐山会议召开，中央还是纠“左”的精神。六月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决定钢的指标要压到1300万吨，粮食要压到5000亿斤，

认为10500亿斤是一九六四年以后的事情，今年有五千亿斤已经很好了。但是，七月庐山会议后，形势大变。从纠“左”又一变而为反右。

三、庐山会议和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继续纠“左”和总结经验。

庐山会议包括两个阶段：七月二日至八月二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是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是准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十九个问题，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还准备学一学政治经济学。会议“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毛主席八月二日在八中全会上讲话）。当时并已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准备搞个会议文件后即散会。七月中旬在讨论会议文件时，出现了分歧，有些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否认党在一九五八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认为对形势的估计右倾，没有轰轰烈烈，引起了争论。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同志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个意见书，陈述了他对“大跃进”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及其教训的意见。七月十六日，毛主席批发给大家，在各小组内展开讨论。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公布批判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长，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是指出要从党的领导上总结经验教训。他指出，一九五八年犯“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彭德怀同志这个意见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提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正确的。他如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分析总结了它的经验教训。他遵照党规党法，在会议上，正式向党的领袖提出书面的发言。他的这种意见也并不是个别的，代表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的看法。

但是，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进攻。因此，使会议由对于左倾错误的纠正变为对于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变为对于彭德怀同志和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批判。在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庐山会议为什么能从纠“左”突然又转为反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当时党内“左”的思潮仍然浓厚的存在着。虽然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一直在纠“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因此，当彭德怀同志提出要从指导思想进一步清算“左”的错误时，就遇到了阻力，一下子又从纠“左”转为批右。

庐山这场斗争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就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应用到党内来了，并且将它进一步发展了。会议把同彭德怀同志的争论，说成是“过去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并说：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并且开始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在庐山会议后，中央批的一个文件中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虽然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因此，在革命发展到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第二，康生就在同路人问题上大写批判文章。这些错误观点的继续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第三，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情况和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使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民主集中制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逐渐盛行。

第四，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还有一些坏人如康生之流也在党内得了势。林彪当了国防部长后，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片言只语，在竭力煽动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他在军队内部拉帮结伙，大搞个人迷信。后来全国学解放军，又把个人迷信推向全国，这也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准备了一个条件。

第五，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打断了正在纠“左”的健康进程，并使“左”倾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以致对整个国民经济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

庐山会议还未结束，八月七日，中央就发出了一个《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开展反右倾、鼓干劲的群众增产节约运动，以新的辉煌的劳动成果，迎接国庆十周年。会议还未结束，反右倾的精神即已传遍各地区各部门。

八月十六日通过《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后，反右倾运动立即在全国各地区展开。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运动从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开始一直搞到一九六〇年一、二月，搞了近半年。在各地机关进行反右整风运动，在农村进行整党运动。这场运动当作一场严重的深刻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在省地县社各级领导骨干和县以上各级部门党员干部中，但斗争一直搞到基层国家干部，只是规定不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一律不戴帽子。

当时，中央曾明确规定把这场斗争限制在党内，而且重点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不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进行。因为这次问题的中心不在他们，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也不是他们，而主要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并且有一部分是高级的领导干部。但后来运动实际上扩展到了党外。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左倾思潮大发展，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到来。

三、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八字方针的提出

反右倾斗争以后，“左”倾错误又得到了发展。农村中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生活特殊化风”，刮得比人民公社建立初期还大。有的地区少数社队又要过渡到全民所有或基本社有，有些地区又没收自留地，家庭猪、鸡、鸭归公。工业上原来确定缩减的基建项目又重新上马，各项指标又大为提高。1959年基建投资上升到344亿元，积累率高达43.8%。1960年基建投资高达348亿元，积累率高达39.6%。1960年钢的指标是1800万吨，实际内定第二本帐为2040万吨。

1960年年初，经委仍提出要搞“开门红”、“月月红”，要求继续“大跃进”。四月工业书记会议上，讨论工交、物资供应的主要指标时，还认为国民经济形势很好，下半年还会更好。钢的产量仍安排为2040万吨的高指标。可是第二季度，问题就严重的暴露出来了。第二季度，二十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十八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其中十一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农业方面粮食情况十分紧张。5月28日，中央发出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据粮食部报告，五月份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近两个月来，上海、北京、天津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可见情况十分严重。1958年粮食产量是4千亿斤，1959年大幅度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更下降到2800亿斤。甚至有的省，粮食产量一下倒退到建国初期。

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7月，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供应物资设备，致使我国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途停顿，给我国建设事业更增加了困难。加上国内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7月15日，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在“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中，提出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首先是保证重点突出的意见。

7月15日到8月10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国际反修问题，也研究了国内经济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同志提出了国民经济应当调整、巩固和提高。在这期间，中央连续发出了一系列有关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要指示和批示，如：

8月5日中央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同志提出的上述报告。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所提的压基建、保生产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执行。

8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8月14日，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8月19日，中央又批准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党组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

8月20日，发出《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

示》。

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时，恩来同志认为富春同志提出的调整、巩固和提高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完整地概括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在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提出八字方针的基础上，1960年11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紧急指示，开始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信中重申了党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陆续公布的农村经济政策，并作了补充规定。强调要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彻底纠正“五风”。十二条的贯彻对扭转当时农村形势起了重大作用。

1961年1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贯彻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农村整风整社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

1月14日，李富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报告》。指出：“根据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重点是调整。

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这些正确决定，在重新纠正“左”倾错误方面起了重要的转折作用。从1961年开始到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整整五年的调整，才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三年“大跃进”，五年大调整，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四、“大跃进”失误的经验教训的探讨

从党的历史看，从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的领导下，我们党顺利地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转折，特别是在建国以后，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后，我们党面临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又一次伟大的战略转变，这次转变比历史上历次转变，包括建国初期的那次转变更伟大、更深刻。建党以来，我们党就以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建国以后，我们实行了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但是，那时繁重的革命任务毕竟不能不占去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的很大精力。党的工作重点实际上仍放在抓革命方面。1956年以后，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全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进一步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正是对这个从革命到建设，从阶级斗争为主到生产斗争、科学

实验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伟大战略转变，我们党没有转好，遭到了严重的失误。这次转折的失误是在十年中，党连续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后发生的，从巨大的胜利转化为严重的失误，是有它因果规律可寻的，是有客观和主观方面原因的。

从客观方面看，同建国初期有明显的不同。在建国初期，即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不仅有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作指导，有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实践经验作参考，并且得到了当时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人力、物力、财力上的直接援助。这是个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这个条件到1956年以后起了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一方面明显地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我们党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突破苏联的框框，不能照搬它的模式；另一方面，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同苏联党发生了分歧，暴露了他们企图控制我国的大国霸权主义野心。这些状况，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应当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这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国际条件这种变化，对我国转折发生了重大的不利的影响。

从主观方面看，同建国初期也有变化，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是有长期思想准备的。从建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伟大目标。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们党也有领导小农经济互助合作的经验，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经验。党在思想上又十分谨慎，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反复进行戒骄戒躁的思想教育。但是在三大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主观方面的这些条件都起了变化。首先对于这个新的伟大战略转变，全党思想准备不够。三大改造的胜利来得十分迅速，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计。原来预计要用十八年的时间也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要走十八步，即不算恢复时期的三年。还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一共是十八年的时间，走十八步，才能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任务。可是，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来，三步两步就赶忙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因此党在思想上对这个时期的迅速到来准备是不足的，同时，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科学都极端落后的大国里，怎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管理整个国民经济，领导现代化的大生产，我们党是很缺乏经验的。这些都是主观上的不利条件。但是，我们党却看不到这些不利条件，相反，被十多年来，一帆风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头脑，陷入了盲目性。

在思想上产生了主观片面性。例如片面地强调所有制改造取得胜利后生产大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对于客观困难和不利的方面则估计不足；片面地强调反右倾保守，不允许反冒进，不是实事求是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片面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夸大了政治思想的作用，忽视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客观的规律性；片面地强调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注意同实事求是相结合，结果是浪漫主义大发展，现实主义受损害。主观片面性的发展，使党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从而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

在政治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由于我们党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诞生和发展壮大起来的，比较善于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处

理问题，由于我们党对新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范围、内容、形式、作用及总趋势等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当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上出现反共逆流，国内出现右派进攻的形势下，党的指导思想，又回到了过去的观点，仍然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用阶级观点观察一切问题，用阶级斗争推动一切工作。这就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不仅把阶级斗争作为夺取政权“打天下”的手段，还要把阶级斗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全力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来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建国以后，我们又着重抓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又强调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企图以此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的髙速度发展。我们总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靠搞群众运动做一切工作，不懂得适应经济的特点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

列宁曾十分强调经济工作同政治和军事斗争不同。列宁认为“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然是比较困难的、缓慢的、渐进的，这是由于经济工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这是由于经济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和需要更深厚的根基”。（列宁全集33卷第8页）

列宁认为我们不能用昨天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建设任务，他说过去我们是依靠英勇精神“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光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我们要解决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任务了，在这里不能向后看，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任务了。”必须“学会用另一种速度来工作，把工作看作是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的事情”，“这件工作要作好几十年，要花极大的气力，决不能用我们进行军事工作的速度和条件来进行这项工作”。（《列宁全集》第33卷145—147页）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经济核算。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设）直接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的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能，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列宁选集》第4卷572页）

我们一九五八年的作法，恰恰都违反了列宁的这些教导。我们把经济建设工作混同于政治和军事斗争，企图依靠昨天的方法解决今天的任务，企图依靠阶级斗争，依靠政治运动激发革命热情，发动“大跃进”，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高速度，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曲折历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才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错误，认识到不能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严重错误。在生产的发展上，我们盲目追求髙速度，急于求成，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经过了严重的挫折之后，才使我们懂得了客观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

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国民经济要高速发展，一定要有计划按比例，搞好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就是要使计划中的比例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没有综合平衡，就没有按比例，也就没有高速度。高速度是寓于有计划按比例搞好综合平衡之中。但是一九五八年我们全党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深刻认识。我们错误地把高速度同有计划按比例和搞好综合平衡分开。我们错误地批评苏联，过分地强调平衡，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不首先强调高速度发展。我们批评苏联把计划订得平平稳稳，不是高速度发展。批判所谓“消极平衡”，大讲所谓“积极平衡”。“积极平衡”实际就是主观主义的以钢为纲的高指标平衡方法。即先订好了钢的高指标，然后各部门向它看齐。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我们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调整过来，这个教训是不能忘的。由于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也就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生产上的高指标，必然迫使提高积累率，提高积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现在从30年的经验中得出的一条，即积累率占国民收入25%左右为好。可是三年“大跃进”时期积累率高达40%以上，这就必然影响到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形成只重视生产不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偏向，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民主革命时期，“左”倾冒险主义者不知道路是要用脚走的，社会主义时期，“左”倾冒进者不知道人是吃饭的。当然这不是说人们连普通常识都不知道，不是的，这是因为违反了客观规律，陷入了主观主义，结果就连普通常识也忘掉了。

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我们急于过渡，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能超越它，不能任凭主观意志随意变革生产关系。在建国初期，我们是比较慎重地对待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但是，在农业合作化顺利完成之后，我们党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老是热衷于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在农业合作化后期变革速度已经过快的条件下，又要急于过渡，向人民公社前进，企图用这种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办法，在短时间里创造出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奇迹，甚至还以为不久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懂得，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主观主义地人为地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会导致生产力的破坏。斯大林说：规律平时是看不见的，当我们违背了它们，它们就要无情地惩罚我们。最后生产关系还是不得不退回去。实践充分证明：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极端重要性。无论革命同建设都来不得半点主观随意性。

在组织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们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应当更加完善，应当制度化法律化。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强调民主是手段，民主是作风，而没有抓住民主的实质加以宣传和贯彻。什么是民主的实质？列宁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选集》第3卷257页）列宁说的“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就是指的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国体是说无产阶级和其它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政体是指的管理国家的形式。因此，我们讲民主的实质就应当是人民在

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以及人民采取什么形式管理国家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在建国以后，特别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我们就应当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逐步完善国家的民主制度，真正使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这一意义上说，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我们的政治目的。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不正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而英勇牺牲的一个崇高目标吗？可是，自从一九五七年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民主生活却越来越不健全，范围越来越小。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使社会上许多人不敢讲话，一九五八年批判反冒进，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以后，党内生活很不正常。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强调了发扬民主，局面有所好转，但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更加系统化，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万马齐喑局面的到来。

痛苦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如果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必然蜕变为极端残暴的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次新党章的修改中，在社会主义强国的内容中加进了“高度民主”这四个字，这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来的宝贵认识啊！这次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召开是以民主的大会和改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这次大会讨论要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就是要完善民主制度，实现民主化，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损害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损害集体领导，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造成官僚主义，甚至发展成个人专断的问题，是为了避免林彪、“四人帮”一类野心家、阴谋家重新出现，改变党和国家颜色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有政治民主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必须发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依靠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能发动人民去自己斗争自己，用抓革命的方法去促建设，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方法去促生产。而是要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真正发扬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的权力，按照人民的愿望，遵照客观经济规律，去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

总之，这次转折的失误，是由于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离开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造成的，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我们党是生长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影响，受着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气的严重包围。封建主义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我们党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从党的历史上看，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成份大量存在，党的指导上容易出现左右倾的错误，特别是“左”倾错误，对党的危害更大。在十年内战时期，党犯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党吃够了“左”倾错误的苦头，才从痛苦的教训中，认识到并找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却忘掉了这个深刻的教训，竟然片面地提出了只许反右，不许反“左”，并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完全等同起来，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

想，结果在片面反右的情况下，“左”倾思想得到极大的发展。这种“左”倾思想的阶级根源，仍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急性病的表现。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发展，使我们在一九五八年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陷入了“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又一次吃了大苦头。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基础上面，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的基础上面，我们却以为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条件下，在农村中基本上还是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就可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曾多次讨论过越是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越是困难，过渡的环节要多，过渡的时间要长。可是，我们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同列宁的论断相反，认为越穷越革命，越容易过渡。我们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强调要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孕育着共产主义因素，在分配上搞供给制，在文化上搞白拉平，企图用穷过渡白拉平的办法，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消灭三大差别，实际上搞的是小资产阶级平均共产主义。

由于我们国家封建传统影响很深，党的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贯彻，就必然出现家长制作风，个人独断专行，出现神化个人、个人崇拜等现象。所以总结历史方面的经验，我们在思想战线上，不仅要注意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还必须注意反对封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人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自然科学一样，必须通过人们无数次失败和成功的试验，才能认识其规律，得到最后的成功。经过三年困难、十年浩劫，这两次严重的挫折，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所规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就是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拨乱反正的结果。因此，通过党的历史学习，必将加深我们对当前党的路线的正确性的认识。让我们更自觉地团结在党的路线周围，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关于庐山会议的几个问题

陈诗惠

(一) 庐山会议前的情况

1958年，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了“左”的错误。八月，北戴河会议把这些“左”的东西向前发展了。北戴河会议决定钢翻番，要生产一〇七〇万吨；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宣布过渡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主张废除工资制实行供给制。这不仅表明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陷入了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倾空想，即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思想，而且为在实际工作中大刮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性。为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使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近一倍，积累率猛增到33.9%，职工人数增加两千万；几千万人上山炼钢，农业丰产不能丰收，加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吃饭不要钱，农村问题开始严重，市场供应出现紧张。这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需要进行调整。但对此并未很好认识，1958年10月还提出1959年工业生产的中心任务是为完成三千万吨钢而奋斗。

党中央、毛主席在1958年冬发现有“左”的错误后，开始采取措施限制其发展并想加以改正，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上半年开了一系列会议在纠“左”。的确从理论上、政策上做了大量工作，强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要搞综合平衡，但由于坚持“以钢为纲”，1959年还要持续“跃进”，因此，不可能进行根本调整。钢从2000万吨（1958年11月武昌会议决定）降到1650万吨（1959年四月上海会议决定），仍不可能完成，粮从10500亿斤减到5500亿斤也还是办不到的。由于高指标未纠正，因此不可能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来克服实际中存在的“左”的偏向。农村人民公社虽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仍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平二调的矛盾并未消除；高估产、虚报产量、强迫命令等歪风没有完全刹住。当时城市明显的问题是市场供应不足；农村突出的基本问题是粮食紧张，有的地方已发生浮肿、停火、逃荒、饿肚子的现象。

以上说明，1959年上半年虽在纠“左”，也有一定成效，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还相当严重，党内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党中央决定六月底七月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

(二) 庐山会议的概况

庐山会议开始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是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前期正确，基本上是反“左”的，后期有问题，逐渐转向反右倾。八中全会主要是反右倾。

庐山会议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半个月：

1. 第一个半个月：七月一日至十六日，是“神仙会”阶段，会议基本上是反“左”的，但反“左”遇到了阻力，两种思潮的分歧日益明显。

会议原来意图是继续纠正“左”，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把国民经济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这段时间里，曾指出了1958年以来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要搞好综合平衡，讨论了一些指标的调整，安排了1959年至1960年的一些任务。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十九个问题请大家议论，他指出当时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强调要把农业搞好，按照农、轻、重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出要搞好综合平衡，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出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总结经验，认识经济发展规律。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七月三日至十日会议分小组进行讨论，在议论上述问题时，反映出对国内形势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认为虽然前阶段到了“左”，但实际上“左”的倾向仍是主要问题，要继续反“左”纠“左”；另一种持相反意见，即有些头脑较热的同志，不愿听对“左”的倾向的批评。这样，持前者观点的部分同志，感到会议有压力，说会议民主气氛不够。有些同志亲自找毛泽东同志反映情况、谈问题。毛泽东同志鼓励他们讲话，因为他一直主张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的前提下来谈论和纠正缺点错误，并很注意改正缺点的方法，强调不能泼冷水，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七月十日，毛泽东同志讲话时谈到会议初步安排至十五、六日结束。并组织一些同志整理会议“纪要”和起草有关文件。他还指出总路线根本不会错，缺点从全局讲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取得经验要付学费，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

会议“纪要”（即《关于形势和任务——庐山会议的议定记录》）很快印出，“纪要”谈到要记取苏联的教训，“综合平衡”部分谈得比较深，这就刺激了头脑发热的一些同志，他们认为“纪要”没有反映出鼓干劲的面貌。问题讲得太多，这不是“气可鼓而不可泄”，从而，使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明朗化了。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同志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明确地讲述了他对大跃进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他提出要从党的领导的指导思想上来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左”；指出产生错误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从此引起了一场大风波。使会议逐渐转了风向。

2. 第二个半个月：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一日，从两种思潮的对立转到反右倾，从对彭德怀同志“信”的无限上纲到清算彭德怀等同志的历史旧帐。

七月二十三日前，在讨论彭“信”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基本上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只是认为在有些提法上欠妥，在个别文字上值得斟酌，有的说成绩部分是讲够了的，问题部分说得严重了些。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在小组发言支持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甚至反对彭的信，认为成绩肯定太少，问题说得太过分。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进攻，决定亲自讲话批彭。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对形势作了分析，他指出：“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降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其次，他讲到自己的责任时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建设一点不懂。但是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我们检查多次，你们没听到？”第三，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信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说法。“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说“有失有得”，“得”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了。“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右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讲话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批彭的人渐渐增多。原来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因得到支持而更理直气壮，有的同志认为主席辛辛苦苦领导我们革命，对建设中出现的偏差也在纠正，埋怨彭不该逼迫他检讨，让他生这么大的气，因此也批评彭并好心劝彭作检讨。这时，仍有部分同志认为彭的“意见书”不是反总路线性质的。于是会议决定整理印发彭德怀同志在西北小组会上的部分发言记录稿，借以证明彭写信的动机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党中央的。而为了说明彭德怀同志问题的严重性，又采取了算旧帐的办法。

彭德怀同志在过去工作中有一些错误，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能成为这次批判的理由，但当时认为讨论彭“信”要联系他的历史才能讨论透。不但算旧帐，还要联系国际背景，说彭德怀同志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受了国外的影响。二十三日后，除了批判彭德怀同志外，同时还批判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并进而批判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会议还发出了一系列文件，错误地指出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3. 第三个半个月：八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大反“右倾机会主义”。

出席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列席14人。全会的主要议程是：

（1）检查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的任务；（2）继续揭发批判所谓“以

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八月二日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简要地说道：“高指标是自己立了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不符合实际的指标”，提出要经过人大常委会去改正。他着重讲了路线问题，说上山后有人攻击总路线。对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要求重新议过，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抓住已经改了的缺点来攻击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

这时会议不谈经济问题，转到专门谈政治问题，以至历史问题。会议不再纠“左”，专门反右，大反特反其右。这半个月会议有三个“结合”：一是大会与小会结合，二是批判与检讨结合，三是会内与会外结合。与全会反右倾同时，会外也开展了反右倾，相互促进反右。有的同志是带着纠“左”材料上山的，因会议风向变了，马上与原单位打电话、电报、通信，传达反右精神。八月七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干劲、反右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八月十四日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指出“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注意”。

八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等文件，并发表了公报。此后，在全国范围内不适当地掀起了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热潮。

（三）庐山会议转向原因的初探

研究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应当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历史环境、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对全党的认识水平也需作些具体分析，而不应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这样才能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来。

目前，因了解的情况不多，水平有限，仅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研究时参考。

1. 庐山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是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着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从全党的思想状况、从上层的指导思想上看，“左”的倾向仍占上风。也就是说，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当时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比较谅解，强调主观愿望是好的，强调缺乏经验，而且认为已经采取办法在纠“左”，因此未能深刻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教训。那个时候，人们大多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成绩、肯定中央正确领导的前提下强调是在前进中出现的问题，是工作方法上的缺点，主要又是下面发生的问题。这从当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可看出。例如

说：“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走路，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没有很好执行”。“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了一些，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经验证明：公社化不减产，问题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又例如说：“去年工作中的错误是由于缺乏经验，根本没有任何路线性的错误，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

基于这种认识，要纠正具体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是较容易的，如果要触动“旗帜”，要查根源，要挖指导思想就比较难了。

另外，当时把纠“左”看得比较容易，对前阶段纠“左”的成绩估计过高。头脑发热的同志认为，中央纠“左”已经抓得很紧，效果也好，“左”的东西已经纠正或基本解决了。他们说纠“左”已八九个月了，已从理论上讲了要划清三个界限，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利用价值法则，工业方面已压了指标，钢从1800万吨降为1300万吨；农村已解决所有制、按劳分配、共产风等问题（事实上，当时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平调等问题并未解决）。他们认为纠“左”时把鼓劲与改错结合起来，方法也是对头的。当然，我们应注意方式方法，但更应注意从思想上根本解决问题才对。同时，把纠“左”看得太简单了，认为“公社问题也好，指标问题也好，过去八九个月以来，部分工作中所发生的“左”的现象已经纠正了，而且是纠正够了”。

因此，当部分同志把缺点讲得明确些，把问题分析得深一些，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找原因时，就引起了另一部分同志的反对，就被看作是反党，是反对总路线。

2.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和当时国际上帝、修、反的攻击联系起来，因此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当时人们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作是“三面红旗”，被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新创造和马列主义的最新原则。在国际上帝、修、反又抓住大跃进、公社化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恶意地讥笑、谩骂、攻击我们。所以就把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衡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标准。谁对这些问题有看法、有保留、有怀疑，谁的立场就有问题。彭德怀等同志客观地如实地反映情况，直言不讳地、明确地指出了缺点错误，就被视为配合帝、修、反向党进攻，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八中全会会有个文件说，要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他们是处于被动的了，我们非常主动。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后来，毛泽东同志给《诗刊》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指出：“近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大骂

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个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这说明：谁要是指出“三面红旗”有缺点，谁就是与敌人里应外合、猖狂向党进攻。

3.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在社会上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庐山会议时又进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把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说庐山出现的党内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八中全会一文件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过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改变了“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又发展成为“党内有资产阶级”的错误结论。

由于把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等同，把所谓右倾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相联系，所以把提批评意见的同志就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当时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同志因为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就把他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给予打击，还说：“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实践已充分证明，张凯帆同志当时的主张、措施是正确的，把他视为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是完全错误的。

在理论上还提出了民主派、同路人的口号，并进而论证了过渡时期所谓“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当时指责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们“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这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清楚地证明，过渡时期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确实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

由于上述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把彭德怀等问题看得很严重就是自然的了。这些错误理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发展成为民主派等于走资派，每隔七八年就要搞一次革命等等荒谬论断。

4. 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受家长制、一言堂等流毒的影响，缺乏民主，党内生活不正常；由于1956年后在巨大胜利面前不谨慎了，骄傲了，听不进批评意见，助长了个人独断专行作风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一些具体因素就促使问题复杂化了。

彭总这个人有历史原因，他为人耿直，说话不大注意方式，有时有不同意见也不大好商量，因此和某些同志关系不十分融洽。在庐山会议期间，尖锐的批评较多，使一些人听了不大高兴。如果党内民主生活健全，是不应计较批评者态度的，当然从提意见的人来说，应该注意方式，党内也要和睦相处，互相支持。从彭德怀同志在小组的发言看，

内容是正确的，但有的人听了不舒服，不易接受。

在彭德怀同志的讲话和议论中，有些是批评中央或直接谈到毛泽东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听了很不高兴，不能接受，并认为他们是反对“三面红旗”的，是针对他的。他曾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说：“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从当时我们党的思想状况和认识水平来看，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家都很尊敬他；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和民主习惯，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风气，只要对领袖有意见就是反党，议论领袖就是非法的，有罪的，所以别的同志听到彭德怀同志批评了毛泽东同志，也就认为是反对和攻击了党和领袖，这样当然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了。加上彭、黄、张、周等同志彼此有些往来，交换过意见又被误认为他们在进行非法的有组织的活动，促使问题升了级，被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总之，庐山会议转向的因原比较复杂，下决心，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一点可以肯定。我认为，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并不是不分析、研究个人的错误，更不是为个人的错误推卸责任，不是否认个人对于造成错误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但确实又不能怪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把责任全推在他老人家身上也是不公道的。要着重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思想水平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环境来作些具体的分析，才能真正吸取教训。

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四) 庐山会议错误地加给彭、黄、张、周等同志的罪名应予推翻

历史是公正的裁判者。实践证明：1959年庐山开展的那一场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加给彭、黄、张、周等同志的罪名是不公正的。从政治上看，彭德怀同志的信和他的发言，没有什么原则错误，他所讲的缺点和问题都是实际存在的。从组织上看，一个政治局委员和到会成员交换意见，向中央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意见，也是党章许可的、完全正常的事，也没有错误。

可是，当时对彭德怀等同志批判得很厉害，上纲上线到了惊人的高度，硬说在庐山会议以前和会议期间，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是在国内外敌人夹攻的紧急关头发生的，而来自党内的进攻更为危险。说彭德怀同志的信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是站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中央领导和毛主席，因此又是“野心家”、“阴谋家”，是什么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是高饶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等等，此外，还采取了算旧帐的办法给予打击。现在看来，这

些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所谓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和作出的决议都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事实根据。下面仅举几件事来说明：

1. 彭德怀同志对形势的看法

彭德怀同志根据他看的各种文字材料和听别人反映的情况，根据他亲自到湖南、甘肃、安徽等省的调查研究，认为我国自一九五八年执行总路线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大跃进的方法，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合适的。但他认为总路线本身还要发展和不断完善，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的速度太快了。他主张总路线应加进“有计划、按比例”的内容，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主张先巩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充分发挥其优越性，而后经过典型试验，条件具备时，再建立人民公社，这是符合实际的。他根据苏联五年计划的经验和我国“一五”计划、一九五八年的实践，证明一年翻一番是绝对不可能的，两年翻一番也有严重困难，主张四年翻番，争取提前完成，留有余地，这是比较客观的。他对实际中存在的“左”的偏向深深忧虑，因此决定给主席写信，请主席在散会前着重讲一讲，对克服缺点，效果会更好。彭德怀同志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表明他是光明磊落的，无可厚非。当时会议也提倡海瑞精神，倡导发扬敢想、敢说和“五不怕”的精神，但他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教训是深刻的。

2. 关于“发难”问题

过去批判彭德怀同志时，说他以前不吭声，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初期他都不讲，看到会议快结束了，拿出信来，“急于发难”。事实上两次郑州会议，他参加了一次，同意主席讲的，要反对“共产风”。武昌会议上表明了他对虚报浮夸风的怀疑；上海会议也提了意见；庐山会议初期在七月三日至十日的八天中有七次发言和插话，常委会上有两次插话，以简报为证。在这些发言中，他批评了浮夸风、共产风、官僚主义等错误；指出了全民炼钢中的缺点；也谈了党的集体领导不够、党内缺乏民主和对主席的意见。

为了批判一个同志，就不顾事实，主观随意论断“急于发难”，这是不公正的。

3. 关于“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问题

我们仅剖析一例。批判彭德怀同志时，说他在“意见书”中安了几根“刺”，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刺”是指：（1）对一九五八年的缺点、错误，“体会不深，认识过迟”；（2）国家计委对调整计划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3）处理经济问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4）“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等等”。

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上述几方面的问题，在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可以说是程度不同的存在着的，在研究、总结前阶段工作时，作为中央领导同志之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把自己也摆进去了，这应该是允许的。即使说，这些意见都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谈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见，这应该是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如果“信”中有些意见不够妥当或者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充分讨论或批评，也完全不应该扣上反对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大帽子给以严厉的斥责、打击。

4.所谓“反党集团”问题

在庐山会议期间，因为彭、黄、张、周等同志观点一致，彼此有些往来，历史上因工作关系有不少接触，就被认为有一个“反党集团”，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实践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会议成员之间交换意见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把他们当“反党集团”来批判是一起“冤案”。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已为他们平反昭雪。

5.关于“里通外国”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明确的结论：“经过审查，怀疑彭德怀同志‘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党中央为彭德怀同志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小平同志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杰出的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与爱戴”。“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彭总，你为之奋斗终身的我们的共同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

(五)庐山会议的后果与教训

1.严重的后果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党面临的任务是继续纠“左”，而庐山会议却错误地宣布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反右倾斗争的高潮。这就中断了原来纠“左”的过程，并使“左”倾错误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发展得更严重，更加系统了。

开展反右倾的斗争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进一步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造成党员不敢讲话或不敢讲真话的不正常现象，正气下降，邪气上升，勇于批评党的缺点错误的人愈来愈少，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风气逐渐盛行。

反右倾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仅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上广泛的运用，而且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错误论断奠定了基础。

反右倾斗争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重复了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株连了相当多的人，许多同志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或受到严厉的批斗，伤害了很大一批人。

林彪接替彭德怀同志的工作后，他在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一些只言片语，在煽动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方面起了极恶劣的作用。

反右倾斗争的直接恶果是带来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加上自然灾害和苏修的破坏，使我国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阶段）。反右倾斗争把原来纠“左”的一些措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原来那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左”的错误又被当成了“正确”的东西完全肯定下来，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比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更大的思想混乱和比例严重失调，一九五九年继续猛攻钢，经过蛮干，年终达到1387万吨，积累率高达43·8%，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而一九六〇年还规定要搞2000万吨钢，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这时，除了调整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总之，庐山会议决定反右倾，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错误，它导致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不适当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从一定意义上说，庐山会议是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向前推进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一个带关键性的会议。

2. 深刻的教训

(1) 必须真正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多次吃过“左”倾错误的亏，给革命事业带来过严重损失。建国后的历史同样说明这个问题，过去的二十多年主要是不断地批右、反右；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在经济建设中又发生“冒进”问题，为什么？值得深思。彭德怀同志说“纠‘左’比纠右难”，这话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吃了这么大的苦头？怎样才能避免再摔跤？这就要充分认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历史、思想、认识根源和它的危害性，认真吸取教训，肃清“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恐右症的流毒，真正做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否则遇到适当气候，“左”的东西就会冒头，党和人民就会遭殃，倒霉。我们一定要牢记！

(2)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已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优良传统载入《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发扬它。

庐山会议错误地反右倾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实事求是，它告诉我们：

离开实事求是，主观唯心的分析形势，就必然在反倾向问题上发生错误。

对经济工作中问题的争论，不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深入调查研究后作结论的办法，就会发展主观武断作风。硬把正确的批评意见当作反党纲领来批判，从而使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但不能及早纠正，反而会进一步发展，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离开对现实问题争论的本身，去清算历史旧帐，毫无事实根据、凭空推测动机，甚至抓“反党集团”，就必然会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3) 必须健全、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深刻认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带来的恶果。

长时期以来，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大正常。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影响，残酷的武装斗争等国情、实情，以致家长制、一言堂、等级观念这些封建思想严重地影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执政后，从党的领导机关来说，主动的自觉的充分创造条件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不够。加上一九五六年后，在巨大胜利面前骄傲了，在不少领导同志中不同程度的

存在着听不进批评意见的情况。反右派斗争后，顺着领导意图行事的风气有所滋长。庐山会议前在组织原则上又过分强调第一书记挂帅，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庐山会议决定反右倾，同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有很大关系。在中央会议上，不让党的高级干部批评，议论中央领导同志，一有议论就扣上“有野心”，要“篡党”的帽子，给以无情打击，这就严重的践踏了党内民主生活，助长了个人专断作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我们党的状况、党的水平，大家都习惯于不能批评领袖的状况。以后，加上林彪、“四人帮”神化领袖的结果，只要对上面有意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现行反革命”，人民的民主生活都被窒息了。教训是深刻的。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必须自觉肃清封建思想在党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同时，还应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逐步解决委任制、等级制、家长制、终身制等等弊病，下决心不断改革，完善我们的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八字方针的贯彻和党的“十中”全会

滑 隆

一、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七千人大会是在广大干部和党员迫切要求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党内民主，以便迅速扭转经济困难局面的情况下召开的。

九中全会以后，中央以及各级领导下去调查研究，了解了一些情况，看到了“五风”对生产破坏的情景。严重的经济困难教育了我们党，需要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再犯这样的错误。同时，广大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对这几年来党的领导是有意见的，要求发扬党内民主。因为五八年以来“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破坏，首先是中央指导上的错误造成的。“高指标”、“高征购”从上往下压。而抵制这种错误政策，如实反映情况的同志都挨了整。现在大家迫切要求发扬党内民主，上下通气，把五风破坏的情况捅开。客观形势要求党召开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民主，以便团结全党，为战胜经济困难而斗争。

六二年一月中旬到二月上旬，党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外，还有各地、县、重要的厂矿企业和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参加，共七千余人。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讲了话。

七千人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有功绩的：

1.大会初步总结了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

关于五八年以来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错误，“报告”指出：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的现象；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曾经混淆了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急的变动，刮了共产风；不适当地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有了增长；有一个时期我们对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估计过高了，对建设的发展要求过急了，因而城市人口就增加过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跟我们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关于基本经验，“报告”指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是我们的

一个根本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2〉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3〉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做好计划工作，必须注意综合平衡，恰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部门的比例关系。〈4〉必须发展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商业除国营商业外，还应当有集体所有制商业。在农村中还应该保持农村集市贸易作为补充。〈5〉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基本经验“报告”总结了十六条，这里不一一摘引了）。

少奇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有的地方如农民所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少奇同志说：全国总的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几年工作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我们在工作中所以犯了错误，“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少奇同志对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估计和分析，今天看来还有不够的地方，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如在对彭德怀同志问题的判断上），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了敢于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基本上反映了到会同志的意愿和要求。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要努力克服盲目性，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阐明的这些思想是正确的，对今天指导我们的工作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会议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号召大家畅所欲言，活跃了党内的民主空气。人们形容这次会议的情况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

2.会议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报告”指出：从农业开始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报告”强调指出：“一九六二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如果这一点工作再放松了，或者做得不好，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长时间的被动”。“报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经济建设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它经济作物。（2）积极的增加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的生产指标。（3）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4）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5）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生产，使那

些原料、材料消耗少和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尽可能增加生产。（6）认真地做好商业工作，改善市场状况，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7）所有企业，都必须切实地改进管理工作，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当成首要任务，坚决扭转某些企业亏本赔钱的状况。“报告”号召全党“必须统一认识，动员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这次大会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团结，坚决贯彻“八字”方针，战胜困难，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七千人大会也有不够的地方。会议对五八年以来的错误还没有从思想理论上加以认真的总结。也没有对五七年以来党内日益增加的“左”的错误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三面红旗”更不敢有丝毫的触动。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例如：会议认为五八年以来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是在某些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并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错误是全局性的左倾冒进的错误。再如，会议要求对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但对彭德怀等少数同志除外，给彭德怀等同志没有平反。由于会议对五八年以来所犯错误的性质，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没有进行认真的总结，因而党内存在的“左”的思潮不可能得到彻底的纠正。

在七千人大会上，当人们都在总结这几年的错误的时候，林彪却别有用心地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他说：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毛主席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他还说：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讲的这些，完全是一套奉承之词，他是在继续制造个人迷信，粉饰错误，抵制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他是别有用心。然而他的讲话却受到了赞赏。这件事说明党内对五八年以来的错误的认识还存在着不一致。

党内“左”的思潮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这种情况的存在，预伏着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在对形势的估计上还会出现失误。原有的“左”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结合新的情况还会更加系统化。

总的来说，七千人大会开的是很好的，它是个总结经验的会，是个动员贯彻八字方针的会。经验一定程度上总结了，许多同志也把意见讲了。团结起来，调整国民经济。

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党为全面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了紧张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认为形势困难，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对困难的严重程度，恢复的快慢，看法就不一致。又如，对已经摆开的经济建设的规模，是过大了，还是基本合适？有的同志认为，工业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吃了农业减产之亏，吃了天灾之亏。这就是说在“大跃进”中如果三年连续丰收，工业的规模就不算过大。换一种说法，这也可以说，如果一旦饿肚子的问题解决了，又可以

象五八年那样大干了。这种看法，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否认了调整的必要性。

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会议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当时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陈云同志作了系统的发言。会后，由陈云、富春、先念三同志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陈云同志作了《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中央同意并批转了这个讲话。

“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财政经济的重要情况，提醒全党要足够地估计困难，要下定决心搞调整。陈云同志关于当时的困难情况讲了五点，最根本的是以下两点：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对于农业恢复的速度，我们要争取快、准备慢。农业，首先是粮食的增产速度是安排各项事业的出发点。二、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超过了经济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他说，我们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五八年生产七千亿斤粮食、七千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此外，又是根据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钢的设想来布置的。因此，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也是不相适应的。

陈云同志关于克服困难的办法，提出了六点意见：一、把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恢复经济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农业的恢复要三至五年。在这一阶段工业要放慢速度，投资要减少。陈云同志关于十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设想是很重要的。对我们财经各部门的工作部署很有好处。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每人每月供应三斤黄豆，范围由小到大。要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搞吃山珍海味，扩大高价饭馆。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委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把这种精神真正体现到国家计划里面。陈云同志最后说：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全国全党第一位的问题。年产七百五十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煤，也是重要的，但是，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西楼会议和陈云同志的讲话，对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月七日到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是一个就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向中央提出的一个系统的报告。会后中央批发了这个报告。

《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克服困难的快慢，作出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报告》说，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表现是：工业和农业之间、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很不适应；文教事业的规模，行政管理的机构同目前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适应。就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来

说，一九六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五；农业不但没有改变一九五七年落后于工业的情况，它的总产值反而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就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来说，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七年，重工业产值上升了百分之七十九，轻工业产值只上升了百分之十六。就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来说，一九六一年的城镇人口虽然减少了一千多万，但仍然比一九五七年多二千多万人。职工总数虽然减少了八百七十万人，但是仍然比一九五七年多一千七百二十四万人。城镇人口过多，职工人数过多，在农业大减产的情况下，一方面加重了农村的负担，多挤了农民的口粮，另一方面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大大降低了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还着重具体地分析了国民经济八个方面的困难情况。

在全面具体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报告”提出，整个国民经济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这就是说，要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的方针，把建设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付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象现在绷得这样紧。

“报告”认为缩短工业生产战线，缩小文教事业的规模，精减行政管理机构，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从而真正加强农业生产力量，真正保证市场供应的最迫切需要，这是在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全党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实行这项措施。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提醒全党，要充分估计困难，毫不动摇地去调整国民经济。他说：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人都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还挺起胸膛前进，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这次工作会议和财经小组提出的报告，对彻底地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之后，经过西楼会议和五月工作会议，党对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从总的方面来说是认识清楚了。情况明，就决心大。党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归纳起来，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 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

1961年减少职工87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

1962年中央决定再减少职工一千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人。因此，中央曾经指出，必须主动地、坚决地、有秩序地减人，并且必须力争多减、早减。在这方面的任何犹豫观点，都是有害的。

2. 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止一系列工程。

1960年，基建投资完成384亿元；1961年，基建投资完成123亿元；1962年，基建投资完成67亿元。

1960年，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是1,815个；1961年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是1,409个；1962年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是1,000个。

3. 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

压缩钢的指标：1960年钢产量1,866万吨，1961年钢产量压到870万吨，1962年原计划钢250万吨，后改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

全民所有制企业：1960年共有9.6万个，1961年、1962年两年合计减少了4.37万个，相当于1960年的44.8%。

4. 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

由于我们采取了上述三项措施，我们才有可能腾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支援农业战线。精减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使大批的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国家增拨一部分材料生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增加农药、化肥的生产和供应。减少粮食征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及向农民退赔等，使农民休养生息。

5. 保证重点项目、弥补重要缺口。在轻工业方面，发展了塑料、化纤工业。在重工业方面，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等。

6. 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赤字。

为此，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领导，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六条。《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即财政六条。关于彻底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潜力的指示，以及采取扩大高价饭馆的营业额，扩大高价糖的供应范围等等。

党在经济上的许多重大措施的贯彻，见效很快，成绩很大。

一九六二年底，农业劳动力和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粮食比六一年增产200亿斤。一九六二年一月至八月，国家实发工资比上年同期少支二十六亿元。城镇商品粮销量比上年同期少销三十二亿三千万斤，全国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五十三亿元。八月底，比年初多回笼货币四十亿零九千万元。一至七月的工业生产中，支援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产品，以及当前最急需的重工业产品，多数比去年同期增产。其中化肥增长百分之三十八，铝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石油增长百分之十七，硫酸增长百分之五，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日用品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七。在多数城市里，付食品和若干日用品的供应也有了一些增加。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到了九、十月份，国民经济的形势就明显的好转了。十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总结了六二年上半年调整国民经济的成就后提出：“所有这些情况有力地证明，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所规定的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和这次会议以后，中央为贯彻实现这个方针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正确的、及时的”。“我们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

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毛主席在农业方面，少奇同志、总理、陈云、小平同志在其它方面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是，在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段历史却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少奇同志等也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说西楼会议对形势

估计得“一片漆黑”。特别是当看到形势很快好转，就以此为理由，指责西楼会议对形势估计右了。其实，这种指责是不能服人的。

人们知道，三年大跃进，使我们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困难的确是严重的。而当时我们党内有些人好讲大话，对缺点错误总是轻描淡写。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主张充分注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宁肯把困难估计过高点，不要估计不足。提醒全党对困难要有足够的认识，从而下定决心克服困难，这怎么能说是“一片黑暗论”呢？形势好转比原来预料的要快，不能因此就证明原来的估计错了、“右了”。例如毛主席首先估计解放战争五年胜利，结果只用了三年，能不能说原来的估计右了呢，不能这样说。在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上，中央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争取快，准备慢。经济形势很快的好转，正是充分估计困难，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努力争取的结果。这恰巧说明我们采取的措施、方针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人大肆攻击陈云、刘少奇同志，把调整说成是“下马风”。说陈云同志“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搞什么“炒肉片、高价商品，多赚钱”，说陈云同志的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等等。

人们知道，那个时候不下决心调整，不大量下马，我们的国民经济就要继续恶化。坚决下马，就是最大的政治。对陈云同志的上述指责，正说明那个理论家对理论是一窍不通的。当然，那时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个别企业，下多了的情况也会有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对国民经济的坚定的调整方针。

今年五月，党中央在致少奇同志的悼词中说：“在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深切关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痛苦，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并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二、八 届 十 中 全 会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全会前在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十中全会前夕，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还没有全面好转。在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已经下放到生产小队了，但是经营管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在工业中，关、停、并、转取得显著成果，但品种质量、成龙配套、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大力解决。因此，摆在党面前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十中全会前夕，在国际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例如：在农村，61年和62年春天，在全国相当一部分省区的生产队出现了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和包产到户，也出现了一些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62年6月到7月，邓子恢同志在高级党校等几个干部学校先后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并支持田间管理可以包产到户的问题。再如：6月彭德怀同志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后被称为万言书）。接

着8月又写了一封短信。申明他“在党内没有‘小集团’和企图篡党的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要求组织审查，做出相应的结论。”在基层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着多吃多占，少数人有贪污盗窃行为等情况。在意识形态方面，如在戏剧舞台上，上演了某些有鬼魂形象的剧目。孟超同志的新编“李慧娘”就是在这一时期上演的。另外，当时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并派遣武装特务潜入大陆活动。对以上这些情况究竟怎么看，能否正确分析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能否正确估计形势关系很大。在国际上，苏修的霸权主义日益嚣张。62年4、5月，发生了新疆伊犁地区我几万农民在苏方煽动下跑到苏联境内的事件。同年秋，中印边界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在宣传上、物资上、武器上公开支持印度。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和苏修作坚决的斗争，又不要因反修斗争影响我们对国内形势的正确的分析。

北戴河会议在八月六日正式开始。会议期间，中央通知，九月在北京召开十中全会。北戴河会议为全会作了准备。

十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主要文件有：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

《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工作会议和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先后两次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

八届十中全会要求全党继续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斗争，这是全会的正确的方面。

1.全会肯定了当时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2.十中全会强调在农业方面要继续认真地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中规定的各项政策，号召全党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十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修正草案，是公社化以后，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情况的工作条例。其中关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十年不变的规定；关于执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规定；关于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规定；关于把征购任务减到适当水平，在一定时期稳定下来的规定；关于减少干部补贴工分，少留公积金、公益金，以便减轻社员负担的规定等等，都是正确的。“六十条”的有关规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曾经遭到批判和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关于农业的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六十条”中有些规定还有值得研究之处。但“六十条”中的一些重要规定，对当时稳定农民的情绪，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改善农民的生活，是起了重要作

用的。

3.全会通过的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要求商业工作要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要求以国营商业为主体和领导力量，以合作社商业为有力助手，以集市贸易为必要补充，更好地发挥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三条流通渠道的作用。这些规定不仅在当时为活跃城乡经济，方便群众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今天的商业工作仍然有指导意义。

4.全会号召，对国民经济进一步的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十中全会有错误的方面。

在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阶级斗争问题特别严重地提了出来。认为对抗的阶级、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并且对国家的命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他一九五七年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延伸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其具体提法是，“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为十中全会所接受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是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这种提法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一定时期中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夸大为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拿我国情况来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大致要经过三个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无疑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即当前的我国社会，地主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阶级的残余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时，除了国际上的原因外，就国内来说，阶级斗争可以预计最终是会消灭的。这种估计是否准确尚待实践来检验。但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会越来越缓和，不会原封不动，更不会越来越尖锐，这是可以肯定的。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把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再延伸到发达的社会主义，那就更不能说是正确的了。

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种提法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绝对的割裂开来了。科学社会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如果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就不可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么，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还要有一个消灭阶级的阶段。要么，就是有一天早晨阶级和阶级斗争突然就消失了，突然进入共产主义了。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毛泽东同志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斗争，连消灭阶级的任务都没有提出来，这种提法是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想法的。

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使原来的左的阶级斗争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为“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是不对的。一九六二年春，或者更早些时候，在全国相当一部分省区的生产队里，出现了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和包产到户的情

况，也出现了一些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会议认为当时有一股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并且说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批判是不对的。那时在“五风”破坏严重的地区，叫做饿、病、逃、荒、死。比现在一些困难地区还要困难的多。包产到户是当时群众发展生产，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的措施。实践证明，那时在“五风”破坏严重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对克服困难，恢复元气是有作用的，它是符合群众利益的。至于当时有少数群众要求或实行了单干，也不应该把它看成是群众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去加以批判，而是应该加以引导。因为少数群众要求单干，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几年以来执行左倾政策的结果。同时，还应该看到，我国由于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应该允许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者存在。因此，一般地批判单干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不利。

十中全会在批判单干风时，是批判邓子恢同志的。这里想简要的介绍一下邓子恢同志在高级党校的讲话，说明当时对他的批判是不对的。

62年7月9、11两天，邓子恢同志为高级党校学员和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作了题为“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还在62年春，当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再次遇到困难，有些地方发生单干和包产到户时，邓子恢同志从巩固集体经济出发，积极寻找适合群众文化水平、觉悟程度的组织劳动、收入分配的方法。为此，他先后在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区作了调查。不久他听到安徽省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由于推广“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就引起了他的极大的重视。不过他也怀疑实行这种责任制能否保证集体经营的“五统一”，而不致于滑向单干。因此他曾派人去安徽调查。据反映，有的责任田保证了“五统一”，而且生产搞得很好。有的就保证不了，形成了包产到户或单干。七月初，他在党校的报告，就是他经过前一段调查研究得出的如何巩固集体经济所应采取的措施和看法。八月十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实行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他基本上又重述了他在高级党校报告中的意见。邓子恢同志在党校的报告中，首先对前几年的工作做了回顾。一方面肯定了成绩，另一方面严厉地批评了刮“五风”和高估产、高征购给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农业带来的严重破坏。然后对今后农村工作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其中对如何巩固集体经济，着重讲了三个方面：第一，要贯彻执行有关的各项政策；固定集体所有制不变，特别是要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执行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固定社员个人的小自由不变；规定合理的基层干部报酬，克服干部特殊化。第二，生产队的征购任务几年内固定不变动。第三，加强经营管理，其中特别着重阐述了生产队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问题。邓子恢同志说，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要有严格的责任制，要分工合作。农业方面的责任制，首先要包工。一个生产队下面分几个作业组，按季节包工。作业组包工下来，大活集体干，小活个人干。他又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的要超产奖励。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他认为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的责任制的包工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大活集体做。他还说，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许的。但是要领导好，领导不好可能走到个体。由以上我们引的几段话可以看出，邓老所主张的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是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实行包

工，大活分地片包到组，零星小活可以包到人。其次，才提到了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但他明确指出这种责任制只限于田间管理和一些特殊的、集体不易进行的技术活。并且特别强调要加强领导，防止滑向单干。

但是，在十中全会上，说他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鼓吹单干等等。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如前所述，邓老是积极为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工作的，不是“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他提倡的是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不是提倡包产到户，鼓吹单干。其实，在困难地区62年和今天都是应该允许包产到户的，它是符合群众利益的。他对五风造成的破坏给以严厉的批评，当然不是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

十中全会对“单干风”的批判，给农村工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这次会议后，在全国部分省、区内的农村曾经出现了大反包产到户和反单干风。所造成的后果是，使早在初级社时已经行之有效的大小段包工责任制，和以后群众自发实行的包工包产到作业组超产奖励制都被废止了。在农村只要一听到一个包字，就说是搞单干，就和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加以批判。这就长期使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会议批判了所谓“翻案风”。说：“近来平反之风，不对”。会议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是为自己“翻案”，认为习仲勋同志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决定设立专案，对彭德怀、习仲勋同志进行审查。其实，所谓“翻案风”是不存在的。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和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对彭德怀同志问题的判断上有其正确的地方。他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但是又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反党联盟的余孽。他们的反党活动与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他背着党中央阴谋夺权等。彭德怀同志于62年6月，写信给毛主席，主要说明上述罪名是硬加在他的头上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彭德怀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向党中央如实地说明自己的情况，这是党员的责任和民主权利，说成是翻案，并立案审查是站不住脚的。

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李建彤同志创作一部描写刘志丹生平的长篇小说。创作过程中，曾向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征求过意见。1962年夏，该书上半部写成，工人出版社准备出版，遂印成送审样书，送一些领导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审查。作者同意一些报刊先选登部分章节。

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人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发表了该书部分章节，报告康生说这部小说是借宣传刘志丹为高岗作宣传的。康生得知这个情况后，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要中央宣传部通知各报刊不得发表《刘志丹》。武断地认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由于康生的发动，把这部小说当作反党活动进行批判，并联系批判了习仲勋同志，成立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由康生负责。可

见，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一件冤案。今年(80年)上半年中央已发出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为习仲勋等同志平反。

对“翻案风”的批判，使正在对反右倾的平反工作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使曾经提出的给错定右派的改正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始进行。这些问题只是在今天才彻底的解决了。耽误了近二十年。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醒与会同志，会后要把做好当前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这对当时继续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没有受到过多的干扰起了好的作用。

三、“四清”运动，调整国民经济的胜利完成

1.关于“四清”运动，

十中全会以后，许多地方陆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四清”这个提法就其包含的内容，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最初是63年初河北保定地委在关于整风整社的经验中提出的（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64年秋，少奇同志在关于四清的讲话中曾说：现在的四清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仅清经济，还有清政治的问题。65年1月在中央发布的“二十三条”中，正式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在城市和农村的基层单位里，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济管理方面，有些社队存在着帐目不清、财物不清、仓库不清等。在干部作风方面，有些干部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个别甚至贪污腐化等。在组织建设方面，由于审查不严，个别组织混有个别坏人等。这样情况不仅62年前后有，今天也还存在。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极少数带有阶级斗争的成分，因此，按照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清理和整顿是必要的。如果把这些问题一概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说成是地主富农复辟，或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了。

63年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是关于城市“五反”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会议制定了关于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文件。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没有形成文件。会上介绍了河北省关于“四清”的经验和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63年5月，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前十条”重申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提法，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要求各级党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

9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

《后十条》着重指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的重要。并为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制定了若干具体的政策界限。这些政策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是正确的。但是“后十条”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因此，总的指导思想和“前十条”是一致的。

63年秋到64年冬，各省经过试点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在工作指导上“左”的错误表现得更为明显。〈1〉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三分之一生产队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2〉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以神秘的工作方式进行扎根串连。〈3〉强调反右倾。九月在中央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中说，对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倾向。〈4〉在此期间，中央不适当地批转了一些关于社教运动的经验。有的经验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63年特别是64年下半年的社教运动，由于党对国内形势又一次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运动中伤害了许多好的或基本好的基层干部。64年这一段，刘少奇同志抓“四清”运动是比较多的。应该说少奇同志在这一段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是左的错误。

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后发布了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指出，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在工作方法上强调不要搞神秘化，反对烦琐哲学。这在纠正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和稳定农村形势方面，暂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文件包含着严重的错误：一、认为全国城乡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文件说：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并且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下面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上面的。这就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二、把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规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这种规定显然是不适当的。三、文件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为后来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领导核心提供了根据。并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

63年特别是64年下半年的社教运动，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伤害了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基层干部，我们党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四清”运动又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尽管如此，四清运动所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仍属局部性质的。因为农村的四清运动就全国来讲只在大约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城市社教运动只在一些单位试点。

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我们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也作了错误的估计。甚至说文化系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错误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阶级斗争。从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小说《刘志丹》开始，这种斗争逐步扩大到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艺术等部门。错误地批判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打击了许多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并且往往无限上纲，硬说他们的作品是服务于某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例如对“合二而一”的所谓批判，给杨献珍同志扣上了吓人的政治帽子。六四年《红旗》杂志报导员的文章说：杨献珍同志“大肆宣扬

‘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合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再如，六五年三月，《人民日报》在发表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一文时在编者按中说：孟超通过李慧娘这个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者进行复仇斗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策划的1965年底全国范围内进行对剧本《海瑞罢官》的所谓批判，完全是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并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2. 调整国民经济的胜利完成。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仍然以主要力量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到1963年冬，在讨论64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调整完成了没有？要不要继续调整？当时有两种意见。有的同志提出，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有的同志不同意。请示总理，总理说还要继续调整。根据总理的意见，中央决定，从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今后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今后三年的调整中，我们党强调以下三点：一、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因为农业不过关，工业的后方就不巩固。二、贯彻执行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三、63年以后的调整工作和前两年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把侧重点由“大下”转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改善经营管理，加强专业协作等方面。并且继续调整工业内部和农业内部的关系，工农业之间以及工农业和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农业中，我们继续认真的贯彻“六十条”，在工业中继续贯彻“七十条”。

由于党的各项政策贯彻的结果，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回升，1964年全面好转，1965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1966年国民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粮食产量：1963为3400亿斤。1964年为3850亿斤。1965为3890亿斤（接近1957年的水平）。1966年为4280亿斤。超过了57年的水平。

棉产量：1963年为2,400万担。1964年为3,325万担。1965年为4,195万担，超过了57年的水平。

钢产量：1963年为762万吨。1964年为964万吨。1965年为1223万吨。1966年达到1532万吨。

煤产量：1965年2亿3千2百万吨。1966年也达到2亿5千万吨，恢复了正常水平。现在我们常说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历史最好水平，就是指的1966年时的那个水平。

1963年—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5.7%，工业平均每年递增17.9%，农业每年递增11.1%。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0%。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城乡人民主要消费品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按全国人口平均，粮食：1957年406斤，1962年329斤，1965年368斤。猪肉：1957年10.2斤，1962年4.4斤，1965年12.6斤。棉布：1957年19.5尺，1962年10.6尺，1965年16.5尺（包括劳保用布和针织品折算）。

在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也有新的突破。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振奋了国威。在此期间，我们实现了石油自给，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顶住了苏修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欠债。在七千人大会时，周总理就斩钉截铁的说，坚决还帐。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物资、贷款和利息。到1965年全部还清了。

总之，到了65年，我们的生产欣欣向荣，市场活跃，人民高兴。

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的确是严重的。但从61年起，到65年，短短的五年时间，我们扭转了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并取得恢复和发展。原因何在？我觉得是不是有以下几条：

首先，我们党在这一段时间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工作方面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被迫的性质）。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这点。九中全会上通过了党的“八字”方针，开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七千人大会上，主要有两条：一是我党开始认识五八年以来的错误，二是动员全党全面调整国民经济。七千人大会后，党根据陈云同志提出的非常措施，迅速落实了“八字方针”。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但仍然重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要求全党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1964年底，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几年来国民经济调整所取得的成就后指出，我们的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并且响亮地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虽然在此期间，我们在部分县、社搞了四清运动，分散了我们的一部分精力，而且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更加完备，但总的来说，党仍然集中了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之中，基本上没有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其次，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党的政策的胜利，是八字方针的胜利。九中全会通过的八字方针，不是一般的方针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的基本精神在于实事求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不平衡中求得合理的平衡。

应该看到，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贯彻的比较好还是在这一段，我们从农轻重在国家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就可以看出来。“二五”时期：农业为12.3%，轻工业为5.2%，重工业为56.1%。53年—65年，国家增加了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农业为18.8%，轻工业为9.3%，重工业为49.8%，到1965年农业调整为29.8%，轻工业为35.4%，重工业为34.8%。可是到了“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又下降了。

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平衡，这一段也是做得好的。“二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30.8%，1959年高达43.8%。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严重的不平衡，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困难。63年到65年，我们降低积累，积累率平均为23.7%，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渐趋合理，生产恢复发展很快，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

再次，国民经济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结果，在



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我们党、我国人民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而是挺起腰杆来干。二千万人下乡，召之则来，挥之则去。充分显示了我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照顾大局，为党分忧，遵守纪律的革命精神。

总之，五年调整工作的巨大胜利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我们党的路线、政策正确，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团结战斗，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逐步克服的，我们是会无往而不胜的。很可惜，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刚刚恢复和发展的经济形势又一次被打断，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了又一次严重的挫折。